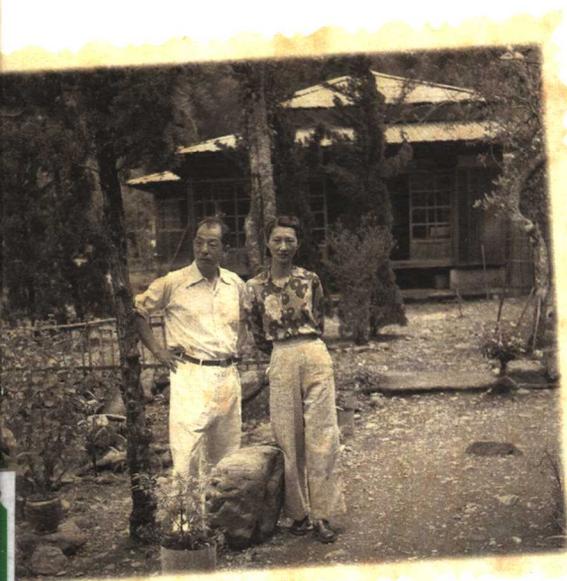


温泉幽禁岁月
一九四六—一九六〇

张学良

赵一荻

私人相册



张闾蘅 张闾芝 陈海滨 编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的记忆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释，但有些人与事却随着岁月沉淀而日益清晰，成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影响你的言行或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大伯、大妈、张学良、赵一荻。

张学良真是一个大家族，后来我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亲戚。我的奶奶是东北张家的五夫人，我父亲张学良在张家中行五。我们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一九四八年才搬到台湾。当时我尚年幼，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来，离开熟悉的环境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贫穷的小岛上。我没想到，正是因为搬到台湾，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这种互相的依持不仅仅是血缘维系，而是彼此都成了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我到台湾继续上小学，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大约是一九五四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夫给我一张纸条，说妈妈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我很高兴，因为这个中心诊所是台北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院长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卢致德，他的手下有个厨师，会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时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预订的。我以为一定是妈妈让我去开「洋荤」。

我到了诊所，寻思不对，妈妈在医学院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问才知道，不是来吃西餐，而是来看「大伯、大妈」，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看到妈妈及家人焦急的样子，同时也觉得好奇，「大伯、大妈」长什么模样？一会儿，听到楼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见了背影。妈妈说，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到台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我无法理解，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说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奶奶每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家里人时常提及大伯、大妈，好像他们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台湾当年的交通远未及今天这么便利，新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是很遥远了。大伯、大妈在烟稀少的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呀！

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作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心里甚感不平的是，这个政府真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们长辈关了那么久。见一面跟「做贼」一样，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我的记忆中。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一九六五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回台省亲，也正是这一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我家坐坐。

但是，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在家人介绍，寒暄之余，我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脸上，大伯的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地就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这次回台湾，与大伯、大妈见了两次，我又回到了纽约。现在想来，当时见面，没有好奇与激动，仿佛原本就熟悉，并无初次会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问候中，能感

ISBN 978-7-108-02623-1



9 787108 026231 >

ISBN 978-7-108-02623-1

定价：39.50 元

Copyright©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温泉幽禁岁月一九四六—一九六〇 /
张闰蘅、张闰芝、陈海滨编著.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12

ISBN 978-7-108-02623-1

I.张… II.①张… ②张… ③陈… III.①张学良(1901~2001)

—生平事迹—1946~1960—图集②赵一荻(1912~2000)—生平事迹—1946~1960—图集

IV.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42851号

责任编辑 薛松奎

特约编辑 王 联

装帧设计 朱 锆

设计制作 王 楠

责任印制 曹永平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6年12月北京第1版

2006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张17

字 数 85千字 图片197幅

印 数 00,001—10,000册

定 价 39.50元

温泉幽禁岁月

一九四六至一九六〇年

张学良

赵一荻

私人相册

张闾蘅 张闾芝 陈海滨 著



纪念一位至诚爱国的千古功臣

记载一段世人关注的情感历程

纪念一位至诚爱国的千古功臣
记载一段世人关注的情感历程

目录

- 010 前言
- 012 记忆中的大伯大妈 张间蘅
- 030 我与大伯大妈有约 张间芝
- 045 一 辗转重庆 飞越海峡
- 059 二 陈仪造访 感慨良多
- 071 三 山中困境 莫老情深
- 093 四 “两张”汇报 宽严皆到
- 103 五 “总统”下野 张赵南迁
- 115 六 重兵看守 屈居兵舍

- 125 七 “夫人”牵线 大洋家书
- 135 八 友人重逢 礼轻情重
- 145 九 互赠书画 回馈友情
- 157 十 疾病袭来 两地挂念
- 171 十一 奉命“笔耕” 夜不能寐
- 183 十二 呕心“杂忆” 告别井上
- 195 十三 “总统”召见 “管束”依旧
- 207 十四 安排家事 “夫人”操心
- 221 十五 信奉基督 教堂“亮相”
- 241 十六 台北购地 营造“新居”
- 255 张学良台湾幽禁期间读书影相

前言

这本书真实地记录了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囚禁生涯。

他是出生于绿林家族的长子，一位英气逼人、威震东三省的少帅，一位曾经厮杀疆场的年轻将军。他曾经拥有东北广袤的森林与黑土，他曾经背负“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仇家恨，让他夜不能寐。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将军一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把天捅了个窟窿”，这是需要多么大的勇气与胆识。西安事变促成了国共合作，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由此拉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

西安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张学良人生的转折点。当他“负荆请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从此，他失去了自由。他有一腔热血，却无缘再上战场，在“严加管束”下不停地迁徙与跋涉。抗战胜利后，又被送往人烟稀少的台湾井上温泉，在群山环抱中饱尝十余年与世隔绝的软禁之苦。幸好身边有一位知音相伴。张学良与赵一荻相濡以沫，携手一同度过了无数的日出日落，潮涨潮落。往昔的荣辱已渐行渐远。在台湾幽禁期间，读书成了张学良唯一的爱好，读

书之余，游历于青山绿水间。他的前半生是用刀枪书写的戎马人生，而他的后半生则是用笔记录着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喜欢拍照，用相机为自己及家人保存了一份极为珍贵的图片资料。

斯人已逝，风采依旧。这段被尘封的山中岁月，世人知之甚少。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全面地了解这段历史，本书挑选了一批张学良、赵一荻1946—1960年幽禁生活期间的珍贵图片，并根据张学良的日记、口述梳理编撰成册。本书所选用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的图片，均为首次发表。此次出版的《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仅仅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幽禁生活的一段，以后还将根据图片资料整理的情况，陆续分册出版。

谨以此书纪念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这位中国近现代的传奇人物——张学良将军。

2006年11月

记忆中的大伯大妈

张闾衡

人的记忆有时会随着时光的流逝慢慢被稀释,但有些人与事却随着岁月沉淀而日益清晰,成为生命中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并影响你的言行或改变你的人生轨迹。对于我来说,他们就是我的大伯、大妈:张学良、赵一荻。

(一)

我们张家真是一个大家族,后来我才知道,我有那么多的亲戚。我的奶奶是东北张作霖的五夫人,我父亲张学森在张家中行五。我们一家原先一直住在天津,1948年才搬到台湾。当时我尚年幼,不明白为何搬到台湾来,离开熟悉的环境到这么一个既陌生又贫穷的小岛上。我没有想到,正是因为搬到台湾,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们一家成为大伯、大妈最为亲近的人,这种互相的依持不仅仅是血缘维系,而是彼此都成了对方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到台湾继续上小学,在我上五年级的那年(大约是1954年),有一天,每天接我上下学的三轮车车夫给我一张纸条,说妈妈让我放学后直接到台北中心诊所找她。我很高兴,因为这个中心诊所是台北当时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医院,院长是我们家的远房亲戚卢致德,他的手下有个厨师,会做一手地道的西餐,平时要想吃到他做的西餐,是要提前预订的。我以为一定是妈妈让我开开“洋荤”。

我到了诊所，寻思不对，妈妈在医院楼上的病房等我，再一看，全家人都在。一问才知道，不是来吃西餐，而是来看“大伯、大妈”，失望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看到妈妈及家人焦急的样子，同时也觉得好奇，“大伯、大妈”长什么模样？一会儿，听到廊道有动静，家人都贴在门缝往外看，我呢，好不容易才看清大妈的模样，而大伯只见了背影。妈妈说，因为大妈生病要住院开刀，大伯、大妈才从山里到台北。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我的大伯、大妈。我无法理解，探视大伯、大妈干吗要这样“偷偷摸摸”，我怎么也无法将课本中的“张学良”与大伯联系在一起，为什么他们也在台湾，却不能与我们来往呢？记得，奶奶常念叨说大伯、大妈被关在山里很长时间了，不知他们过得怎么样？奶奶每每提及“大伯”总是神情忧伤。在我的印象中，那段时间，家里人时常提及大伯、大妈，好像他们住在一个很遥远的地方。后来我才知道，大伯、大妈从1946年11月被押往台湾后，一直幽禁在新竹县井上的大山中。台湾当年的交通远未及今天这么便利，新竹在我的记忆中，已经是很遥远了。大伯、大妈在人烟稀少的山里一待就是十余年呀！

我上高中时，大伯、大妈才从高雄搬回台北，但还是不允许与家人见面。记得一个星期天，迪克（卢致德）约我们一家去作客，他家隔壁住着董显光（原“驻美大使”），听说那天大伯、大妈会到董显光家作客，这次，我们是隔着大玻璃窗观望。我终于看清了大伯的模样：个不太高，有些发福，头发灰白，几乎掉光了。哦！这就是张学良？我的大伯！这就是奶奶、父母牵肠挂肚、时时念叨的大伯？我怎么也想象不出当年“英俊少帅”的样子。心里甚感不平的是，这个政府真不讲道理！为什么把我们长辈关了那么久？见一面跟“做贼”一样。太不公平！

那一天，大伯、大妈的模样，凝刻在我的记忆中。

（二）

高中毕业后，我到美国留学。1965年是我留学后第一次返台省亲，也正是这一

年，我在家中与大伯、大妈见了面。听家人说，大伯、大妈搬到台北后，在北投复兴岗建房，与过去相比，稍许自由些，大伯到台北市区总会来我家坐坐。

说是正式见面，毕竟隔了两代人。大伯是张家的长子，与我父亲为同父异母的兄弟，但年龄悬殊甚大。大伯带兵打仗时，我父亲还是一个嬉戏打闹的顽童。在家人介绍、寒暄之余，我看着两位长辈，岁月的沧桑似乎都刻在他们脸上，大伯的言语中不失机敏活泼，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一丝淡淡忧郁。他们大都与奶奶、妈妈交谈，我在旁边听着，大伯会不时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亲情与关爱……这次回台湾，与大伯、大妈见了两三次，我就又回到了纽约。现在想来，当时见面，没有好奇与激动，仿佛原本就熟悉，并无初次会面常有的陌生感。淡淡的问候中，能感受到大伯、大妈对亲情的渴望和希望同张家晚辈即我们姐妹聊聊天……大伯、大妈身边没有别的亲人，他们的子女均远在美国，只能靠书信来往。大伯知道我在美国留学，见到我是否会想起他们在美国的儿女呢？不知道。但他看似不经意的凝视眼神，却留在我的记忆中。

（三）

读完大学，自然是找份工作。我已习惯和熟悉了美国的生活节奏与环境，如果不是生了一场病，我可能会一直待在美国。在纽约期间，一入秋我就伤风，越冷越严重，并伴随着水肿，肠胃功能紊乱，吃什么药也不见好转。美国的大夫建议说，最好换个环境，到温暖的地方待上一段时间，否则很难恢复。没办法，我只好回台湾，想先回家休息一阵再说。在外一人又多病，还是家好，这样我又回台湾了。

1967年，我回到台湾，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们在台湾的亲人，大大小小好几十口，如果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热闹。最常来的总是大伯、大妈，1964年他们在台湾经历了“离婚”、“结婚”，人生对于他们来说，除了相依相伴、形影不离，已到了无欲无求的境界。每星期起码来我们家三到五次，每次来，总要弄出很大的“动

静”。一群时刻跟随的“服侍”先进家转一圈，看是否有陌生人后，便在门外警戒，有时甚至坐在屋里，面无表情地听我们家人聊天。

大伯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被人监视的生活，非常坦然，依旧与我们家人大摆“龙门阵”，聊到高兴时，笑声朗朗。有时他还拉我们一同去下馆子，边吃边聊。我就是从那时起，才真正认识了我这位“鼎鼎有名”的大伯，我与大伯的感情，也是在这段交往中，在听他的讲述中慢慢建立起来的。

大伯喜欢讲述东北的往事，讲述他童年的故事，大伯的讲述唤醒了我童年时在天津馋吃冰花的记忆，海峡那边是我们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国去看看……这一想法，彻底改变了我所有的计划，这也是后来我决定到香港发展，并在1979年冒着风险返回祖国内地的初衷。

现在想起那段与大伯、大妈在一起的时光，令人难忘。大伯家在北投，那块地皮是他买的，那栋房的格局是他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自然倾注他的情感。在他们家里，除了跟随他们同生死共患难、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的吴妈之外，其余“服侍”的人，都是保密局派来的看守特务。在大伯家的外围，也布满保密局的警卫点，不让外人靠近。我们平时不能常去大伯家，偶尔去了，家人总要再三交代，说话要小心，隔墙有耳，不能口无遮拦，免得给他们添麻烦。当时我真是无法理解，看着他们宛如生活在“鸟笼”中，心里很压抑，也很气愤。大伯的“自由”是很有限的，来往的朋友也少得可怜，除了家人，只有张群、张大千、王新衡、大卫黄（黄仁霖的儿子）等几家可以走动。大伯每次外出都要提前报告，出门时，总是两辆车，前一辆是大伯、大妈，跟随的一辆就是便衣特务或警卫。

大伯、大妈最开心的日子是逢年过节。每到年三十，我们与大伯、大妈一起在北投过年。平时他们家冷清寂寞，连玩牌都不允许，这一天可以例外。大妈忙里忙外准备年夜饭，她烧得一手好菜，中西餐都很拿手，尤其是西式蛋糕更是一绝，小巧精致、香甜诱人。吃过年夜饭，大伯带头玩牌，别看他的视力听力均不好，每次赢家总是他，我们口袋里的“红包”还未焐热，大部分的压岁钱都回到了他手里。看我们沮

丧的样子，他呵呵一笑说：“耍钱，你们差远了，我是拜过师的！”有好几年，都是大妈下令：“散局！”大伯才肯放人。这就是我的大伯，天性爱热闹、爱玩、爱生活。有时我会想，那些囚禁的日子、与世隔绝的时光，大伯、大妈是怎样熬过来的？在他的记忆中，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呢？

后来我在香港定居了，往返台湾很方便，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我们都成为他的听众，他讲他的童年、他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偶尔也会讲起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在他的讲述中，张家的“老事”、人与物似乎都鲜活地呈现在我面前，那些原本遥远、陌生的人与事，对于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台湾的张家后人来说，清晰得似可触摸。

（四）

日子久了，我与妹妹闺芝成为大伯最好的倾诉对象。常常是我们三人聊，大妈有时就避开，因为她一见我们总是谈《圣经》或上帝。别说我们，有时大伯也烦，就打断她说“换个话题”。我理解大伯，他在漫长的囚禁生活中，除了大妈，无人可聊，他是靠回忆和读书度过那段难熬的日子的，他的周围全是看守监视的人，那些人还时时提醒他“不能跟陌生人交谈！”大伯的心里积存了太多太多想说的话。

记得有一次，大伯笑着对我妹妹说：“你大姐一回来，那批跟班可忙坏了！”因为我好交际，朋友多，只要我回台湾，家中便“高朋满座”，热闹无比。大伯来了，很开心地看着我们，并不时与我的朋友聊上几句，这让那批“跟班”非常紧张。当时，凡是与大伯说过话或见过面的人，都是“跟班”调查的对象，都必须一一询问，记录在案。“跟班”知道都是我的朋友，他们不好意思直截了当向我盘问，常常问家里的佣人、司机或楼下看更打听，但他们哪能百分百掌握实情？有很多时候，我有意弄虚作假，这些大伯看在眼里，心里跟我一样得意高兴！

调皮爱热闹的性格跟我们这批年轻人一拍即合，只要我们在，大伯几乎每天都

来。这也是大伯喜欢到我们家的缘故吧。有时一待就是半天，吃了晚饭还没有动身的意思，“跟班”就不时上楼来催，大妈有些紧张，可大伯正聊到兴头，故意装听不见，能多待一会儿，他就多“赖”一会儿……每次看到大伯如贪玩的顽童不愿“回家”，而“跟班”又不停地催促，心里又痛又恨！大伯、大妈已经被他们囚禁了那么久，为什么还不放过他们？这种“管束”的日子何时才能结束呢？听大伯讲，他在上世纪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他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连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家有一个“顽童”般的大伯，喜欢与他聊天，听他讲故事。只要你跟他待一会儿，你就会被他的睿智魅力所吸引。

（五）

我常对自己说，我真幸运能有这么一位长辈，从他那里，我学会了许多做人处事的道理。他对我们的呵护、关爱，细微无声，常常只是简单的一句话或一个眼神。他认为我们做得不对时，最多说一句“你们不懂”或“糊涂”，然后他会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像对朋友一样娓娓道来。从他言谈中，我能感受到他对家人、家乡、国家、民族的挚爱。谈起这些话题时，他兴奋不已、神采飞扬，有时说着说着，黯然神伤，音落神凝。即便现在，一想起他陷入沉思中的伤感神情，我的泪水仍会夺眶而出。他的心时时牵挂着两头，一边是他的老家故土，一边是远在异国的儿女……正因为我们能感受到他内心的寂寞与思念，我们想为他做点事，我与妹妹间芝的生活都改变了。妹妹先是成了大伯、大妈的“管家”，而后提前“退休”陪伴他们。我呢，1979年“贸然”进了中国内地，乘火车去了广州。

这是我自1948年离开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内地。回到香港后急不可待地飞往台湾，想把我在内地的所见所闻告诉大伯。见了大伯后，还未开口，大伯悄悄先问了一

句：“你回大陆了？”吓了我一跳！我去内地没告诉任何人，担心乘飞机，航空公司要登记才改乘火车，大伯怎么会知道呢？后来大伯告诉我，当局对进出内地的人是密切“关注”的，那些“跟班”已知道了情况，是要大伯找我核实。大伯告诉他们，要问你们自己去问！但除了大伯，始终也没人找过我，他们知道问也白问。

有惊无险，反正也是“记录在案”，我依旧不管不顾地进出内地。我去了许多地方，也认识了不少新朋友，大伯说过的地方，我都会去看看、听听。回台湾后，赶紧一一告诉大伯，我就是想让大伯多知道些曾经在他梦中牵挂的人与事。1982年，我到北京，见到了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杨虎城将军之子杨拯民。他热情款待了我，介绍我认识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况。回台湾后，我向大伯转达了他们的问候。大伯听了很高兴！他悄悄告诉我，再回内地，可以找两个人，一位是吕正操，一位是万毅。说这两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无形中变成大伯与他部属之间的“联络员”，也成为自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峡两岸历经多年隔绝之后，大伯与祖国内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一方面是我的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在台湾，我们与大伯这种特殊的关系，这是无人可以替代的。但我心里清楚，是大伯的言行影响和改变了我，改变了我与妹妹闾芝的人生。我曾希望在他有生之年，为他多做点事，让他心里的愿望得以实现。这就是多年来催迫着我奔波于途的心愿。

大伯、大妈后来去了夏威夷，我们全家陪着他们一同沐浴着阳光与海风，这样自由自在的时光对于他们来说，来得太晚了！眼看着他挽起袖子生气勃勃的躯体日渐枯干，炯炯有神的目光在悄然暗淡……我读懂了什么叫“力不从心”！我无法阻挡时间的脚步，在大妈去世一年后，2001年，大伯也画上了人生句号。大伯走了，带着遗憾走了！只有我知道，大伯的有些愿望是永远无法实现了！每每念及，潸然泪下，伤感无限！遗憾无限！

（六）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70年了。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也是我大伯人生“大起大落”的转折点。在国难当头之际，他用枪扣押了“上司”，逼其抗日；又抱着牺牲自我的精神，经受了遥遥无期的“管束”，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的。自1946年11月，大伯、大妈被押往台湾井上温泉，他们的消息被严密封锁，不要说内地民众不了解，我们在台湾也知之甚少。幸好大伯留有大量的日记、照片、手稿，这些资料都是从未发表过的，我们将其分段编撰成册，通过这些图文并茂的真实记录，让海内外所有关心张学良、赵一荻的读者，了解他们是如何相依相伴度过那段人生苦旅的。在许多人的眼中，他们是曾经的风云人物。的确，他们的一生始终被人“前呼后拥”着：早年是他的部下，晚年是各种访客与媒体，其间漫长的幽禁岁月则是一群甩都甩不掉的“跟班”……人生起伏，荣辱烟云，坦然处之，这就是我眼中的张学良、赵一荻，我可亲可爱的大伯、大妈，他们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

2006年10月8日于香港



大伯、大妈与我们全家合影。





我们三姐妹（闻芳、闻箫、闻芝）与大伯、大妈合影。





我与大伯在美国家中。





1991年5月大伯与吕正操在美国见面。





在夏威夷海风中：我与大伯。



我与大伯大妈有约

张间芝

我的父亲张学森是张学良将军的五弟，兄弟年龄差距廿岁。常听大伯提及当年在沈阳大帅府有外宾来访，见院中一群儿童正玩耍嬉闹，大伯向客人介绍这群孩子，有的是儿子，有的是弟弟，两代人玩在一起，实是有趣现象。家父自幼对他的大哥尊敬如父（祖父张作霖皇姑屯遇难时，家父仅八岁），大哥对小弟弟的亲情与关怀更是融入了父子般的疼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大帅府被日本人侵占，仓皇中一家人分散至北平或天津，也有至英、美的；家父随着祖母在天津求学、成家。1936年西安事变后，被“严加管束”的大伯与亲属的联系受限，于1938年及1939年我父母在香港及美国见到赵一荻小姐，得知大伯的消息。此后则音信全无，直到1946年祖母于天津收到大伯来自台湾的信，才知他们已到了台湾。1948年襁褓中的我随着祖母、父母及两个姐姐从天津到了台湾，父母虽多方尝试着想与大伯联系都未成功，大伯已听说五弟也到了台湾，在其1955年2月27日的日记中，未加注明悄悄地记下了我们当时在台北的住址。直到1961年9月，大伯才得到“当局”获准与亲属见面，祖母及父亲与大伯这一别足足等了25年矣！回想见面的情景感人至深，大伯仔细端详着每一个人，14岁的我大声地叫一声“大爷”（北方人称大伯为大爷），跪地叩头行大礼。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历史课本中的“张少帅”，接着我见到了“大妈”赵一荻小姐。是亲情使然，还是受祖母及父亲的激动所感染？眼前这位大伯的气度与风范，立刻深深感动了我。

这一年是大伯软禁生活的一个转折点，一个新生活的开始。在宋美龄女士及蒋经国先生的协助安排下，由自己出资选地设计兴建住所，在台北市近郊北投复兴岗建了一栋西式二层房屋，院内有假山、鱼池、花房等，与过去25年的居住环境真是天壤之别。我们一家人经常去他们家，一去就是大半天，大伯也经常出现在我们家。他称我的祖母寿夫人为“五姨”。我看得出大伯对这位五姨非常尊敬。大伯告诉我：“你的奶奶可不简单，最得老师喜欢，也最能和老师说上话，大帅府里上上下下都听她的，接待外宾也得心应手，生你爸爸时，全府连庆数日。五爷可是个宝贝。老师老来一连得四子，你奶奶真是大帅府的大红人。”自幼我就常随在祖母身边，爱听大人谈话，祖母非常健谈，记忆力又强，与大伯谈及往事精彩有趣，他们聊天我一定静坐在旁聆听。

当时在台湾居住的亲属还有大伯称“六姨”的马夫人，育有一女，即我的六姑张怀敏女士，她一直在台湾从事教育工作。祖母和六奶奶感情很好，相处融洽，我们两家是一起自天津到台湾的。

后来六叔张学浚从澳门，七叔张学英从香港与家人相继来到台湾，所有亲属逢年过节或是庆祝生日皆是在大伯家欢度。每年除夕，三代亲属欢聚一堂，年夜饭后，由大伯、大妈率领全体晚辈向两位老奶奶叩头辞岁，一过12点再叩头拜年，接着放鞭炮。每年都是由大伯持烛点炮，一片欢乐声中吃元宝（饺子）。这时每人手中一叠压岁钱准备推牌九，先坐庄的一定是大伯，接着是我父亲，好不热闹，其实说是推牌九，不如说是看大伯表演，他说，那是付了不少学费学来的。

其余的亲属，有的留居内地，有的远在美国，难得联系。大伯与凤至大妈生的女儿闰瑛住旧金山，与夫婿陶鹏飞偶尔来台。长子闰珣未婚，自美搬至台湾，因健康问题，长期住在医院，我们难得一见。次子闰玕一家人与凤至大妈住在洛杉矶，从未来过台湾，见到他们，是我随着母亲至洛杉矶家中时，特意去拜见凤至大妈的。大伯和一获大妈（赵一获小姐）生的儿子闰琳一家人住旧金山，常来台湾。大伯最高兴的就是见到闰琳的两个儿子：居信、居仰。

我于1970年赴美国夏威夷攻读旅游业管理，经常接到大伯和大妈鼓励的信。我寄了许多风景照片并向他们描述了当地优美的居住环境，由此他们对夏威夷的向往便在心中萌生。1976年我返回台湾工作时，祖母已安享天年过世，父母迁至夏威夷，两位姐姐均留居国外，只有我一人住在台湾。工作之余，经常去大伯家看望，我陪着他们郊游、下馆子、购物，每周日去教堂做礼拜及和特定准许交往的朋友聚会等。

有一段时间，大姐闫蘅因事业关系在台湾住了几年，他们一家的到来带给大伯、大妈很多欢乐。这其中除了各人忙各人的事以外，我们总是欢聚在一起，最令我神怡的还是听大伯追述往事，往事就是历史，有严肃的、也有趣味的。最难得的是，几十年里，我从未听过他有一声怨言，总是笑声洋溢，侃侃而谈，其声其景令我难忘。后读他的日记，我的乳名“领弟”（父母希望我领个弟弟）不时出现其中，才恍然伯侄间原是如此的亲昵接近。

一日大妈因骨折卧病在床，把我叫到床前，面色凝重地对我说：“领弟，你大伯和我都渐渐年纪大了，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我的身体不好，如果一旦我不在了，你是否愿意好好照顾大伯？”说这最后几个字时，她泪水涌出，哽咽着说不下去！我回答：“我当然愿意，我不就在你们身边吗？”大妈接着说：“你大伯很喜欢你，今天对你的谈话，是你大伯和我商量过的，虽然你和我们时常在一起，也最明白我们的生活情况，大伯的意思是让你管理及处理我们的事，如果你愿意，我们将会有许多事要交代给你，大伯和我都觉得你最合适，对你我们完全信任放心。如果你愿意答应，我们也了却一桩心事。”我的立即承诺，从此带来了无限的牵挂。不知多少次，大妈一提到如果她先离世……总是泪流满面，后来她体会到我爱大伯如同父亲，逐渐流露出欣慰之情。

大妈常说：“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1994年大伯、大妈选择在夏威夷定居，我的父母已在该地居住多年，很顺利地就将兄嫂的居住安顿妥善。当地的朋友热烈地欢迎他们的到来，一连串的邀请聚会活动纷至沓来。大伯兴致高，有请必乐意出席，这时为了大伯90高龄的身体，大妈不得不执行她饱含关爱的“管束”。大伯称大妈为

“总司令”，从不抗命，大伯的风趣，常常引得大家开怀大笑。我一有假期就飞夏威夷，因大妈觉得在电话上交代我的事情不够清楚，同时在台湾，我也忙于处理他们搬迁后的善后工作。

1995年9月，家父应邀赴北京参加庆祝抗战胜利50周年活动，临行前，兄弟二人畅谈此行的目的及意义，很是高兴。孰料就在会议闭幕的当晚，家父不幸心肌梗塞，救治无效与世长辞。噩耗传至夏威夷，大伯顿时惊呆了，昏花的老眼泪水盈盈，失去了在异乡相依为命的弟弟，怎能让他不心痛至极！父亲过世，闻阖大姐和我本可以将母亲接到香港或台湾同住，便于奉养照顾，然大伯他们刚刚迁居夏威夷不久，母亲怎能于此时搬离？于是，次年我决定辞去台湾待遇优厚的工作，迁居至夏威夷与母亲作伴，同时也继续执行对大伯、大妈的承诺。我们一家人与大伯、大妈朝夕共处在蓝天绿海间，一同沐浴着清爽怡人的海风，他们的脸上时时漾着孩童般的微笑，愉悦中我却有一丝隐痛；大妈曾患肺癌，割除了一片肺叶，时时离不开氧气的补充，大伯40余岁时患严重眼疾，因居在深山中未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视力差到看人只是影子，打麻将全靠手感，一耳全聋，一耳微有听力。多年来，大妈就是大伯的眼及耳，但一大声说话，即喘不过气来，非常辛苦。两人以轮椅代步相依度日，对于来自各方难却的盛情，无奈之下不得不却。这也是让盼望他们返故乡的许许多多最终失望和遗憾的原因。

“心有余而力不足”，终让大伯、大妈的乡愁成了永远的乡愁。

回顾1936年西安事变后，大伯经过在浙江奉化，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沅陵，贵阳修文县、阳明洞、灵山麒麟洞、开阳县、桐梓县，重庆等地的辗转迁徙和颠沛流离，于1946年11月2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到了台湾，幽禁于新竹县竹东镇的清泉井上温泉，后于1957年10月迁至南部高雄西子湾，1960年迁至台北近郊北投的安全局招待所，一年后迁入自建的房屋，直到1994年移居夏威夷，幽禁岁月超过了半个世纪，耗尽了他们一生最好的年华，怀想之余，怎不令人歎歎！

在新竹井上温泉与世隔绝的深山中，大伯与大妈互拍些照片寄给在美国的家属，



张学森夫妇与大哥大嫂。

存在身边的多是些底片。1990年前后，发现这些底片均已受潮，大妈见这些黏在一起的底片嘱我丢弃，我不舍得。闾衡大姐认为他们二位这段时间的生活鲜为人知，而照片最为可贵，于是不计费用，经过很长时间，寻求高技术处理，幸得部分可展示给读者。从这些残存的照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当时居住的环境及岁月的痕迹。这是大伯、大妈在台湾早期幽禁期间最真实的记录与写照。

今天能有此机会，回顾往事，诉之于笔，真是感慨万千。这本画册的起止年限为1946—1960年。文字部分是依据大伯的记事簿、日记、信函及他们二位的口述，希望在读者欣赏照片时，提供一些他们生活情况的背景资料。我与大伯、大妈有约，要让世人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这仅仅是开始，我们将继续整理他们留下的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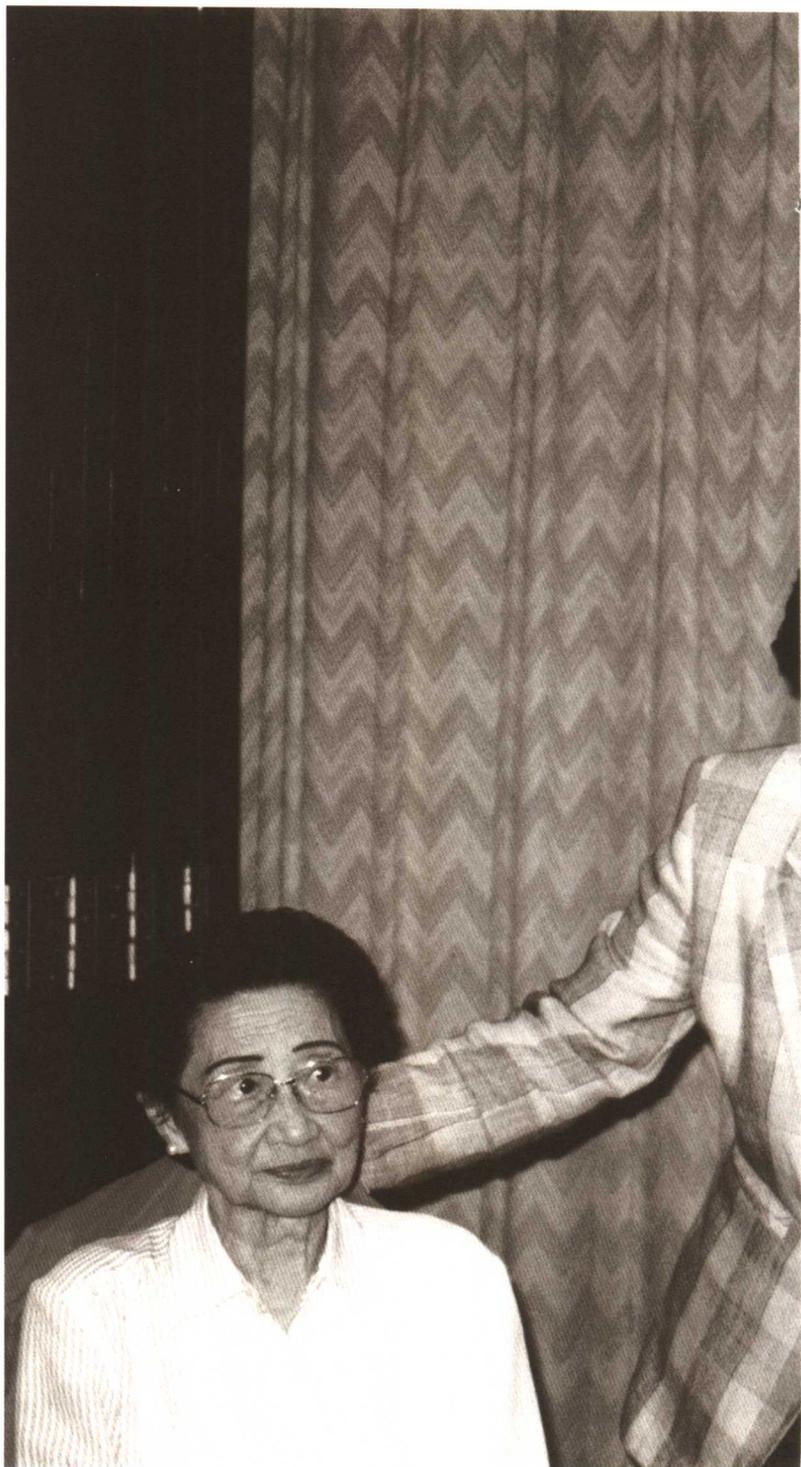
适逢西安事变70周年，大姐闾衡和我谨以这本《张学良、赵一荻私人相册》纪念大伯忠纯爱国、毁己恕人的一生奉献及大妈深爱不渝的一生相伴。并以此表达作为子侄的孺慕之心。

2006年10月于香港



在台北我与大伯一同登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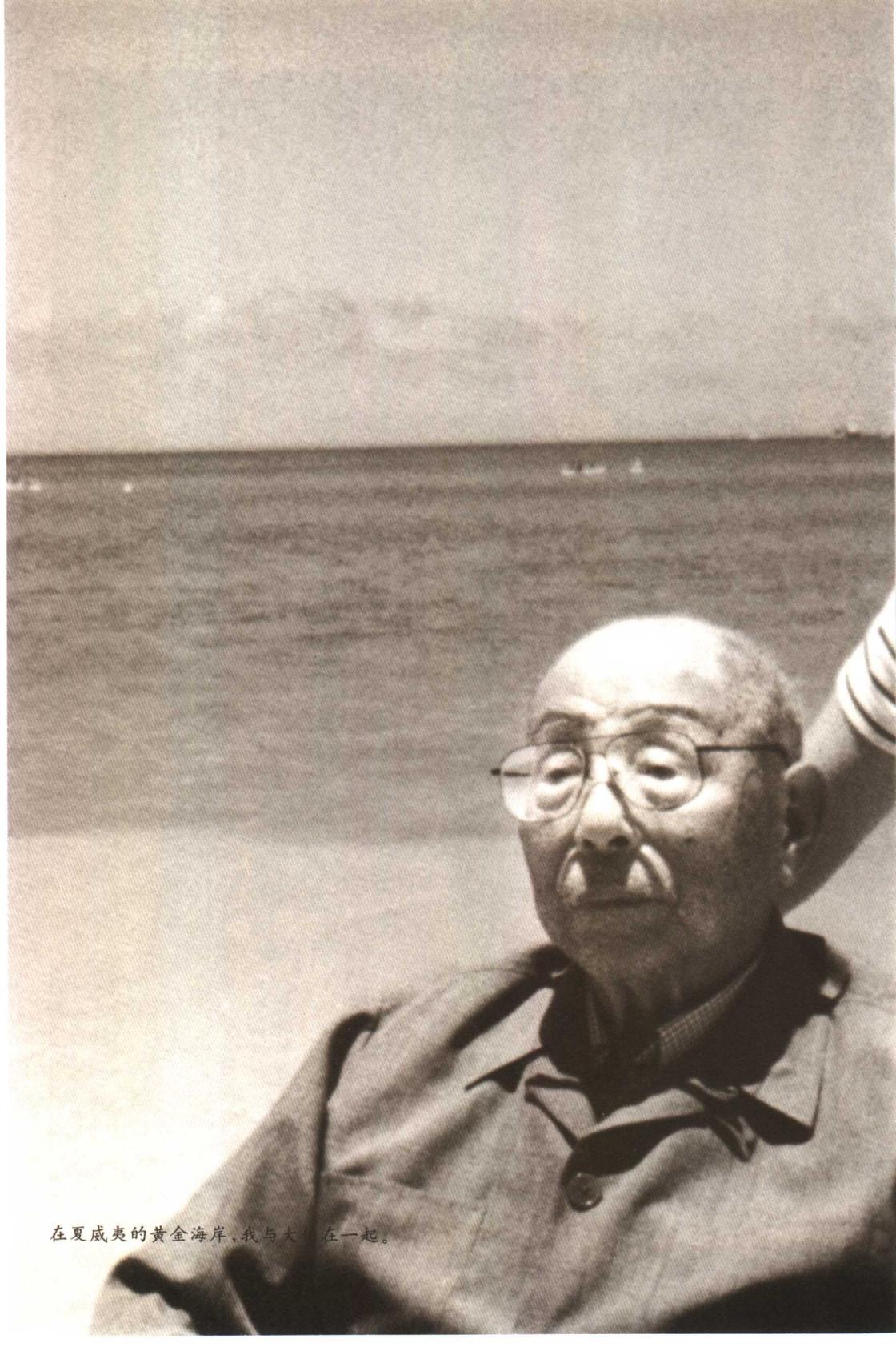
大伯在台北 88 岁生日时，我们为他做寿。





大伯的笑脸，永远留在我们姐妹的脑海中。





在夏威夷的黄金海岸,我与大家在一起。



辗转重庆 飞越海峡

台湾首名胜利古迹

自从说要搬家，将近一个月，昨日汽车才来。今晨四点廿分在小雨中由桐梓天门洞出发，约十点抵东溪午餐，下午约六点抵渝，住于松林坡（为戴的训练处所）。在松林坡住了半个多月，有张严佛夫妇、李云波夫妇、杨继云、许（徐）远举等人，常来寓所玩玩，并赠送食品。

1946年10月15日

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相（向）何处。早六点一刻，由重庆白市驿机场起飞，有李云波、徐远举、郭处长等来送行。八点四十分抵武昌徐家栅机场加油，十二点一刻抵台北松山机场，余（始）知是到台湾。陈长官派周处长一鹤、刘县长启光、连谋、陈达元调查科长等在机场迎接，到陈达元寓所午餐，下午二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五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

1946年11月2日

早九时许，由刘启光县长夫妇陪同乘汽车由新竹起程，约至下午一点许抵井上温泉，余知此为余之新住所也。

1946年11月3日

十一月十五日

陳長官公使來寓談列國內國際
歷史中日各問題。彼對中日問題有深
刻認識特殊見解。言到吉田松陰對
日本尊王。吞華思想之提倡。伊藤
博文。及德麟新干滅華之陰謀。彼
認由日本侵華思想。一時難為消除。
美國亦將上日本人的當。並言到廿
年內中國恐放聯邦。但如中國人自
己不自強。恐大部政權反落到日人
之手。才政甚有記載。留給後來之
必惡。午餐後再談了一談。始辭去。
並贈給書報雜物不少。



这张照片是1947年5月莫德惠到井上温泉时拍摄的。先是张学良与之合影，随后，在同样的位置，莫德惠为他们拍了这张照片。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件”之后，莫德惠风尘仆仆送来了蒋夫人的问候函和家人信件。这也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湾幽禁期间保存下来的几张最初拍摄的照片之一。日式的建筑、藤椅、藤桌、插花……面对友人，真不知该说些什么，在台湾的幽禁生活刚刚开始……

1946年，对于已被囚禁10年之久的张学良来说，真是不平静的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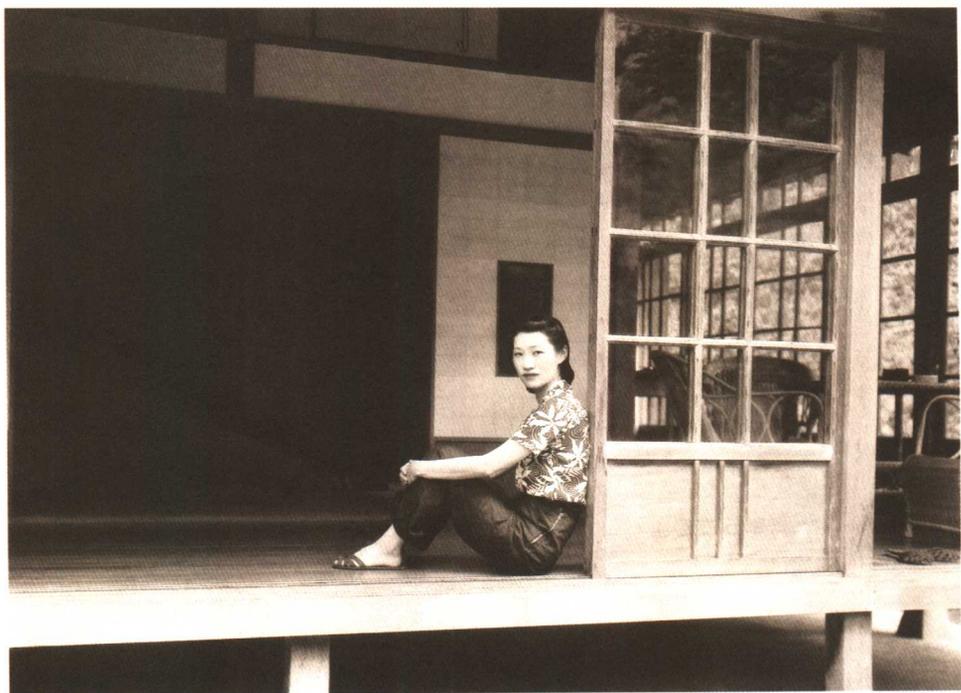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1945年8月，张学良听说日本投降了，真是“初闻涕泪满衣裳”，家仇国恨，终得雪耻，长夜难眠。此时似乎能看到恢复自由的一丝曙光。

新年伊始，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前几年的日记，每年的开头统由九一八起，今年我又把它改回来了。九一八的问题虽然是有了结局，可是东北尚未得到自由解放。那块土里还是埋藏着大量的炸药，不晓得哪一天它还是会爆发的。可是，不只是东北哟，中国全国还不是一样吗！”让人几分欢喜，几分忧愁。

张学良的心情自然是不平静的，作为军人，他感到惭愧，没能为抗战出力，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却仍被关在贵州偏僻的“夜郎国”中，不知什么时间才能离开。

在贵州关押期间，他的活动范围仅限在两三百米内，白天在刘乙光等人的“陪同”下，尚可到附近走走或垂钓，一到夜晚，便只能待在屋里。囚禁地的内外圈，均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军统特务把守着，不允许任何外人擅自闯入。这种孤寂的囚禁生活，唯一可以慰藉的是，当收到各种报刊杂志，获悉外界的各种消息时，焦急心情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1946年1月10日，国民政府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亦参加，并提出释放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与杨虎城将军。周恩来在小组会和大会上多次提出应立即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他说：要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这一提议得到了许多与会代表的赞同。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这栋日式建筑的样式，较为宽敞的廊道，整个建筑是木结构的，并与地面隔开。从贵州到重庆，又被送到台湾大山中，究竟还要被与世隔绝多久？从悲到喜到平静，这种反差，正如衣着鲜丽的女主人与陈旧建筑的对比，这一年赵一获36岁。



这是赵一荻1945年在贵州桐梓的照片，张学良一直将它带在身边。1945年抗战胜利了，原本以为“管束”生活可以结束了，很快，他们又开始新一轮的迁移。



这是莫德惠到台湾探视张学良。前一次是在贵州。1947年5月，莫德惠在井上温泉住了约一星期。贵州一别，一晃又是一年，老友重逢，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莫德惠后来也迁居台湾，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逢年过节互赠礼品。虽同在台湾，却极少有机会坐下、无拘无束地畅谈。

但蒋介石不以为然，不为所动。直到会议结束，仅释放了叶挺、廖承志。

张学良无法了解政治协商会议的内情，他只能将报上的报道剪下，存在日记本中，因为参加会议的人，有许多是他所熟悉的。他在日记中写道：“政协完成，和平建国纲领甚好，但愿不要只成为一篇好的文献文章，但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有进步。”

当年，张学良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将蒋扣押，是否释放蒋介石，是否要蒋介石签字保证、画押，各方争执不下。最后蒋介石仅以“领袖”的口头承诺作为担保得以脱身。现在“和平建国纲领”虽好，有各方的签字，但谁敢保证它不会成为“一纸空文”。后来形势的发展，恰恰被张学良言中。

贵州的3月，阴冷潮湿。3月29日，张学良从报上获悉，戴笠于17日在南



这是张学良、赵一荻陪莫德惠在自己住处下方的球场打网球后拍摄的。这张照片后来在各种书刊上常能见到。照片冲洗后，张学良题款送了一张给莫德惠，而这张是张学良自己保存的。准确的拍摄日期是1947年5月16日。左一为刘乙光，几乎在所有照片中，他与张、赵一直保持着“距离”，且面无表情。

京因飞机失事被烧死。戴笠之死，对囚禁中的张学良、赵一荻来说，会有不大不小的震动。他们太熟悉这位执掌国民党特务系统的“老板”了。

西安事变时，戴笠亦被扣，但张学良并未太为难他。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后遭扣押，实际上一直是交戴笠负责“严加管束”。囚禁期间，戴笠每年总要去探视一两次，并顺便带些生活用品或食物、信函等。张学良在贵州桐梓囚禁地就是戴笠选定的。这是一个天然的山洞，原是国民党兵工署下属的兵工厂。戴笠巡视后，认为此地自然风光好，方便车辆进出，又方便警戒，方案报蒋介石批准后，就在兵工厂蓄水池附近盖了一排房，将张学良与赵一荻从修文阳明洞迁来。戴笠每次来，总要陪张学良聊聊天，或四处看看，有时也会派人送信或送些罐头、水果来。张学良寄出信函则由刘乙光带出交戴笠转呈，从两人信件往来的称呼上



这是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居住地的全景。门前是一条小溪，平日山泉清澈见底，人可涉水而过，遇大雨山洪，就只能从吊桥上行走。张学良与莫德惠在吊桥上合影。

看，戴笠称张学良时有“副司令赐鉴”、“汉公赐鉴”，而张学良的去信是称“雨农兄”。大家都是客客气气。作为看管者，戴笠从生活上给予了张学良照顾，这其中也有蒋夫人、宋子文的关照。但戴笠不时也会“警告”张学良，来信“请勿书明现在之住址……以公之声望与晚（戴笠信中均称自己‘晚戴笠’）之处境不得不慎重将事耳……乞深居简出，为国珍重”。蒋介石不想让人知道张的秘密囚禁地。戴笠突然摔死，国民党军统局顿时乱成一锅粥，连看守张学良的刘乙光一时也不知所措，一时间张学良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很快，1946年4月15日军统派了李肖白处长陪东北元老、参政员莫德惠进山探视张学良，顺便将积压的信件一起带来，在桐梓住了五天。这是得到蒋介石的首肯的。面对一大堆信件，张学良看得“头晕眼花”。这五天的时间，让张学良百感交集，尽管每次与莫德惠交谈，刘乙光总是“陪伴”着。听到东北同乡寄

张学良、莫德惠背后的牌子是“新竹县警察局竹东区警察所清泉警察疗养所”。这是张学良送别莫德惠时拍摄的。莫德惠从清泉下山，要先到竹东区和新竹县城，再乘火车到台北。此一别，何时再见？



望的厚情，张学良“五内酸痛，真欲泪下”。“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白天与莫德惠聊天或一同垂钓，晚上畅叙至深夜。直到行前才急急陈铺素纸，一一回信。家信自当必回，同时给蒋介石、蒋夫人及一干老友一一回信，根据莫的提议还给何应钦、陈诚、徐永昌各书一函，莫德惠希望通过他们向蒋做些工作，争取早日“解禁”。张学良在“给同乡诸友一函未书上款”。囚禁中的张学良仍不愿意自己为“同乡”带来麻烦。

莫德惠离去后，张学良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写了许多的回信和家信交他们带去。因这几天累了，追忆。”戴笠走了，莫德惠来了，这些信件发出去了，如果是“投石问路”也该有些回应吧！

1946年9月21日，终于等到音讯了。刘乙光跑来告之：“吾等有移地消息，彼将至渝请示一切。”刘乙光带回的消息是，先到重庆等待安排。毕竟在这里居





住了几年，现在将要离去，得到“恩准”，在刘乙光及夫人的陪同下“游兵工厂的大山洞，再到招待（所）小饭，又游红花园（在桐南约16公里），游元田坝、峰岩洞（在桐北约15公里）”。这时，张学良、赵一荻才对自己居住的周围环境有了了解。

从知晓要到重庆去，张学良就开始整理行李，等了将近一个月。10月14日几辆汽车来了，大家七手八脚赶紧装东西，随行的看守们也希望早点离开这荒无人烟的大山。10月15日，天蒙蒙亮，4点20分由桐梓出发，一路颠簸，下午约六点半抵达重庆，“住渝郊外之松林坡（原为戴雨农所建）”。

松林坡公馆——是抗战期间中美合作所为蒋介石修建的，实际上蒋介石一天也没有待过。倒是戴笠常去小住，被人称为“戴公馆”。这是一排位居歌乐山半山林间的平房。四周原本就戒备森严。

沈醉在《军统内幕》中提到，张学良到松林坡第一次进餐时，刘乙光全家都和沈醉等人一起陪他吃饭。刘乙光的两个小孩子把吃剩的骨头向地上吐，他看了连忙笑着说：“这样不行，这不比过去我们住在乡下……可不能再随便向地下吐东西！”

张学良与赵一荻是秘密押解到重庆的，自然来探视相伴的都是原国民党的军统大特务（1946年10月1日军统改为国防部保密局）。如张严佛（军统办事处主任）夫妇、李云波（即李觉，时任中央训练团分团主任）夫妇、徐远举（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少将军衔）等人，轮流做东，打牌、吃饭……

所有陪伴的人都清楚，蒋介石绝不会释放张学良，也知道张学良与赵一荻下一处的囚禁地点在台湾，只是在等待安排专机等事宜。他们对张学良只是说正安排专机准备去南京，一旦安排妥当，立即动身。

离开贵州大山，来到重庆，按常理讲，抗战胜利了，10年的“管束”亦到期，应该没有什么理由再羁押了。张严佛等人“营造”的气氛，让一向喜欢热闹的张学良，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11月1日，通知张学良、赵一荻次日动身，飞机已安排好了，这是张学良与赵一荻在重庆松林坡，也是他们在大陆的最后一个夜晚，此一去，永无归期。

谁又能想到，1949年10月，此地，重庆松林坡公馆又成了西安事变的另一

位主角——杨虎城将军的葬身之地。是巧合，还是有意安排？杨虎城也是从贵州被押往重庆，他一踏进室内，后面就传来儿子拯中的惨叫声，杨将军急转身去，特务的利刃便扎进腹腔……特务在掩埋时，还在杨将军的脸上淋上镪水。这一幕，张学良很久以后才得知。

11月2日，重庆白市驿机场，早六点一刻，李觉、徐远举、郭（旭？）处长到机场送行。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今日迁移，但余始终不知去向何处……八点四十抵武昌徐家栅机场加油。”直到此时，也没有人告知张学良飞行的目的地。如果再往东飞，就是南京。加完油的飞机起飞后却往南飞。“十二点十五分抵台北松山机场，余知是到台湾。”

“陈长官派周处长一鹤、刘县长启光、连谋、陈达元调查科长等在机场迎接，到陈达元寓所午餐。下午两点一刻由台北乘汽车动身，约五点半抵新竹，宿于招待所。”

从日记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张学良、赵一荻是飞机落地后，才知道自己被送到了台湾，无奈愤懑之情，跃然纸上。一下飞机，就登车到新竹。11月3日上午9点，离开新竹，在刘启光县长夫妇陪同下，汽车沿山路东行，山路崎岖，人烟渐稀。约在下午1点抵达井上温泉。两天的时间，张学良与赵一荻飞越了大半个中国，从行程安排看，几乎是“马不停蹄”，直奔事先安排好的目的地——井上温泉。所有行动中的人都知道要去的地方，唯有张学良与赵一荻最后才被告知。从新竹到井上，汽车行驶近四个小时，如果按每小时30公里算，井上离新竹约有100多公里。

“余知此为余之新住所也。”疲惫不堪的张学良、赵一荻环顾四周，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一“安排”。

二

陈仪造访 感慨良多

台湾省名胜古迹

1:250,000



昨晚陈公侠派专人送来信一封，附蒋夫人信和糖两包。

1946年12月5日

陈公侠来寓，谈到国内国际历史，中日各问题。彼对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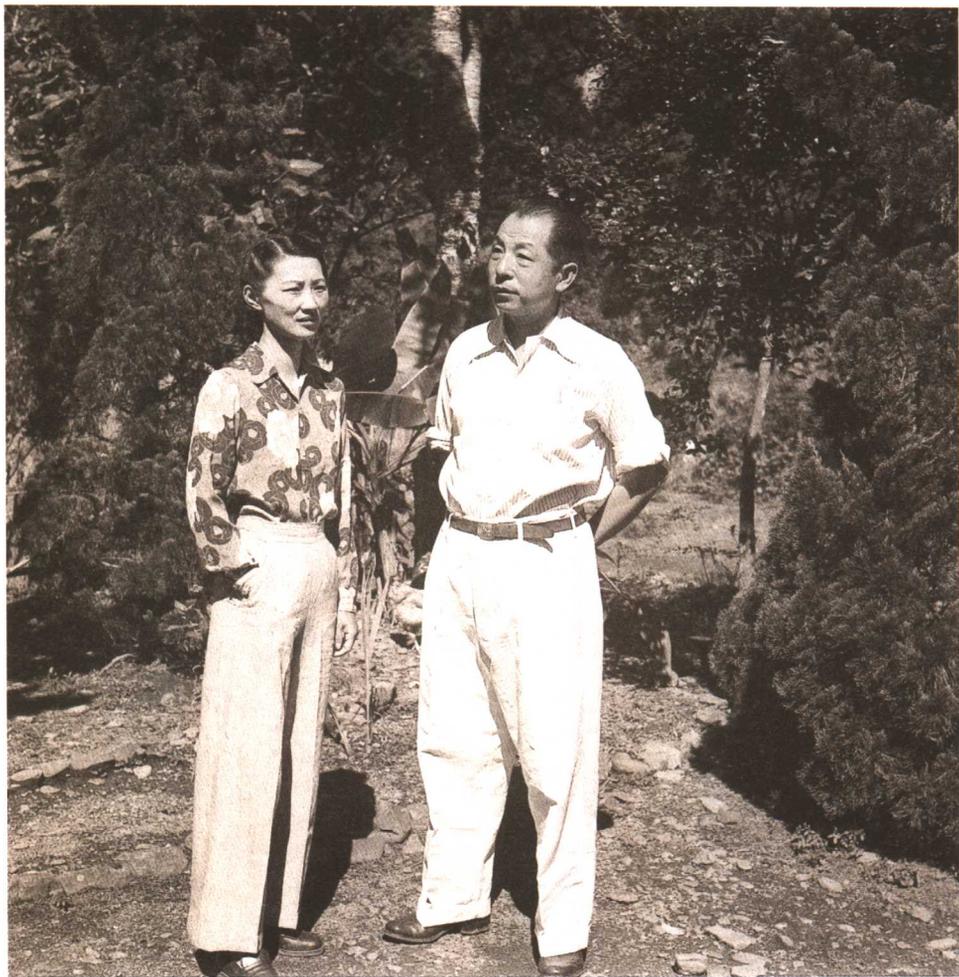
1946年12月15日

三月一日

劉乙先告知我，在日台北竹東民中暴動，襲擊衙署，寺打外省人，在台北官吏共。我到台灣第二日，已有此感覺，已見我所寫的這廿初感，能是我子以有先見之明。當局如不善處，台灣問題，真不知道我什末樣子。

三月五日

昨晚在沉河空氣中，竹東忽來了一輛卡車，送來三米而菜蔬不少，這是怎末一回事，起初一點不知道，後來劉隊長告知了一點，但真怪，还不能知道，一夜十分緊張，我也未能好睡。



夏日之井上温泉，张学良在照片后面题写了“二人站在花前”。骄阳之下，两人表情各异，视线不同，更多的忧虑让赵一荻闷闷不乐。

井上温泉的这栋平房，是日据时期由日本人设计建造的木板房。远离尘嚣，隐于青山绿水间，周围散居着台湾山地原住民，即大陆称为“高山族”的同胞。多年的迁徙生活，使张学良能够很快地适应这一变化。收拾好房间，提笔写了谢函，请刘乙光转交台湾行政长官陈仪，表示谢意。陈仪派其参谋长柯远芬前来慰问，同来的有旅长谢懋德、宪兵团长张慕陶等，交谈中，张学良对接收后的台湾情况有了一些了解。



羈身于孤島寂靜的山中院落，子女遠在海外，而對岸大陸的故園，內戰又起，風雲難測。
張學良默默無語，似乎在等待着什麼……



斑驳的台阶，浸透着岁月的痕迹。孤独的身影相伴着无名的野花。这16级台阶，是来井上温泉的客人们的合影之处。



远处是悬挂的吊桥，近处是竹篱笆，山中小院，看着张学良摆弄相机，等待中的赵一荻露出了微笑。一丝苦涩的微笑。（上图）

仿佛在谛听树上的蝉鸣，大山之中两人相依为伴，沉默无语……小路在延伸，寂寞中时光悄悄流淌。（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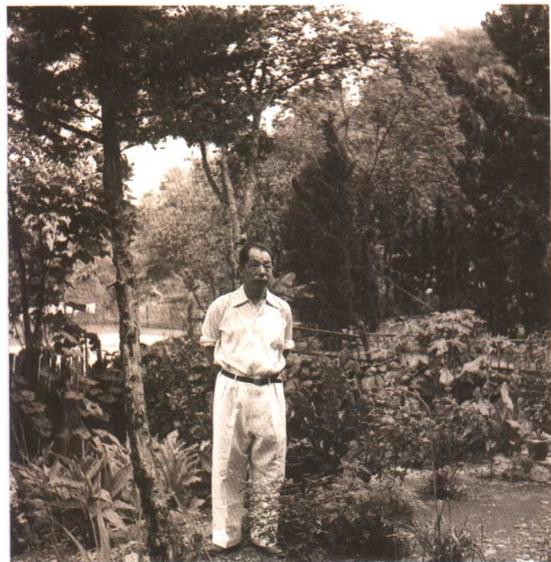




树荫下的“赵一荻半身像”。尽管居住山中，操持“家务”，但赵一荻仍保持涂指甲油的习惯。



从贵州的大山又转到台湾的大山中。张学良在50年代似乎被人忘却了，加之海峡两岸的对峙，音讯全断，“少帅”寂寞与沮丧的心情不难想象。



周围茂密的树木，在夏日中“疯长”。而张学良对恢复“自由”的期望正慢慢枯萎……



50年代的赵一荻，依旧风姿绰约。小猫怯生生地靠近，这是因为女主人不太喜欢小动物。背后是井上温泉的小广场。

12月15日，陈仪专程到井上温泉拜访张学良、赵一荻。也就在前10天，张学良收到陈仪派人送来的蒋夫人的一封信函及两盒糖果。这是张学良到台湾后收到蒋夫人的第一封信及礼品。陈仪的到访带有礼节性，给张学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张学良的囚禁岁月中，很难见到地方“封疆大吏”来探访，国民党的高官将领深知蒋介石对张的态度，谁愿担风险去冒犯蒋介石呢？

两人交谈的话题，大多围绕中日关系。陈仪字公洽、公侠，早年留学日本习军事，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炮兵五期，曾任兵工署长，在福建省主席任内下令枪毙军统特务张超，得罪了戴笠。后任重庆行政院秘书长，在重庆组织过台湾培训班，抗战胜利后，受命接收台湾，组建台湾行政长官公署。陈仪虽是旧官僚，但为人清正廉洁。他对接收治理台湾有一套想法，如接收后，不希望有太多的驻军，仅靠警察维持。蒋介石曾褒奖他“顾大局”，使蒋有更多的兵力投入内战中。但陈仪无法控制各大派系及利益集团在台湾的掠夺、贪污。“二二八事件”爆发，“风暴”迅速波及全岛，蒋介石急调兵上岛开枪镇压，陈仪“引咎辞职”。1948年陈



“Edith (赵一荻) 坐在大石头上，宪兵岗亭背景”。张学良与赵一荻在井上温泉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未得到批准不准离开院子，即便是外出拍照也必须有宪兵的跟踪“保护”。



行进中的张学良。似乎在检阅自己的成果，那是一排排豆角。



照片背景是张学良的“书房”，正当盛年的“少帅”，早已无缘戎马生涯，多了一点“学者”的儒雅味。

仪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1949年因策动汤恩伯起义失败，离职回上海被捕，先囚于浙江衢州，后押解台湾，1950年被枪杀于台北松山机场附近。

张学良对陈仪讲述的中日历史之症结以及未来之发展与担忧，感慨良多。“彼对中日问题，有深刻认识，特殊见解。言到吉田松阴对日本尊王、吞华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吞华之阴谋，被认为日本侵华思想一时难为消除，美国亦将上日本人的当。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联邦，但如中国人自己不自强，恐大部分政权反落到日人之手。”

张学良在12月15日的日记中，留下这么一句：“此段甚有记载留给后来之必要。”30年后，中日成为邦交国，但两国间仍存有各种矛盾，张学良的日记，见证了陈仪当年的预言。“中国人要自强”，张学良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地反省自己……

刘乙光告知我，连日台北竹东民众暴动，袭击衙署，专打外省人在台为官者。我到台湾第二日，已有此感觉，已见我写的莅台初感，非是我事后有先见（之）明。当局如不善处，台湾问题，真不知道成什么样子。

1947年3月1日

连日沉闷，昨晚来了一辆卡车，带来米面菜等。赵献瑞也来了，一刹功（工）夫，窝中如临大敌，我的窗前门外，全布有卫兵，并皆手持武器，这是怎么一回事，请老刘过来，想问一问，他说有事，不来。又见他们焚烧文件，收拾行李，人员纷纷乱窜，有什么事？为什么不告述（诉）我哪！令人烦闷，三请老刘，仍不来，余到刘的屋去，看他们十分仓皇……

1947年3月5日

今天他们又对我鬼鬼祟祟的样子，一大早，刘太太就装模作样的（地）到处偷偷查看，一定是外间又有什么风声，我想不外乎那一套，想了一想，睡我的大觉去罢。

1947年3月7日

连日听刘队长所讲的对台变事，得知大概。真叫人痛心！贪官污吏造孽不小。台湾人这次举动，可敬佩之处不少，然可批评之处亦不少。

1947年3月17日

莫先生整住了一星期，因为他这回来可以自由些，畅所欲言古今中外，政情和私人的事，无所不谈，莫先生不但未老，而且健谈的（得）很。我写了二十余封信交给他了。今晨九时惺惺相别，由刘专员乙光陪去台北。

1947年5月18日

昨天聽說蔣夫人要到美國去，我給她寫了一封信，內
附了給風聖的一封信，託她轉交。也劉說給毛人風加一
封信，呈上快書，所以又給毛人風寫了一封信，把蔣夫人
信裝內寄給他，並託以蔣夫人上美國已竟走了，請
求他，把信寄給她。交與劉加封寄出。



这张照片背面，张学良题有“Edith（赵一荻）和我在屋前”。但两人的合影并不多，张学良似乎不习惯面对镜头，他的视线总是侧向一旁。

1947年，台湾的“二二八事件”，使张学良、赵一荻原本“平静”的山中生活，受到了不小的“冲击”。

“二二八事件”的导火索，是台北专卖缉私人员开枪打死烟贩所引发的一场波及全岛的暴动，但深层的因素是岛内民众不满国民党的统治。从1945年台湾民众涌上街头欢迎“国军”，不到两年时间，频频发生民众袭击“外省人”，张学良到台湾后，就有感觉，国民党的官吏、军人以胜利者、接收大员的身份中饱私



毕竟是军人，原本指挥千军万马，如今得以体悟农夫之辛苦。

囊，欺压百姓，并将大批接收的物资运往内地倒卖……民众生活难以为继。

暴动始于台北，很快向南蔓延，各地民众纷纷袭击衙署，殴打“外省人”。而台湾的大部分地区仅靠警察维持，陈仪已无法控制局面。

“隐居”于竹东山区的张学良，先是感到看守人员的异常神情，私下交头接耳，焚烧文件，收拾行李。3月4日，从竹东来了一辆卡车，送来了米面菜，同时井上温泉的警备升级，窗前门外，全部是手持武器的卫兵把守。究竟发生了什



居家过日子，女主人总希望窗明几净，使自己有一个整洁的环境。井上温泉的住所，年久失修，难经风雨。张学良在日记中记载：“约在正午，暴风起，下午二三时左右，狂风暴雨，我们的住房到处漏雨，迁床搬东西，一夜未好睡。不知此次台湾灾情如何？反正总是苦些小百姓。”

么事？张学良三次派人请刘乙光，想请他讲讲发生什么情况，刘乙光不理睬。张学良只好到刘乙光的屋里，一看，刘家人也在收拾东西，刘太太和孩子都换了衣服，做好随时逃离的准备。问刘乙光这是怎么回事？大家都在准备撤离，唯独没有人通知自己该做什么准备。

刘乙光不耐烦地应付说：“竹东也出事了，他们把区公所烧了。”竹东离井上约30多公里，是井上到新竹、台北的必经之路。事态的严重性以及刘乙光的冷淡，张



昔日浮华已被岁月冲洗，一身素装，挥锄汗滴。在大山之中，种菜种花，既是生活所迫，也是休息怡情的需要。尽管锄地的姿势不太正确，只管耕耘，等待收获。



赵一荻在喂鸡。这些鸡下的蛋，成为他们山中生活必不可少的“营养品”。

学良似乎从中嗅到了什么……毕竟行伍出身，张学良后来对人讲述这次经历时说过，一旦到了最坏结果，他准备抢枪……

据说当时刘乙光已接到上峰密令，如有人冲击或借机“劫”张学良，就……在刘乙光与看守人员的眼中，平时可以客气地对待“副座”，但危机来临，他的职责不是保卫“副座”安全，而是不让“人犯”活着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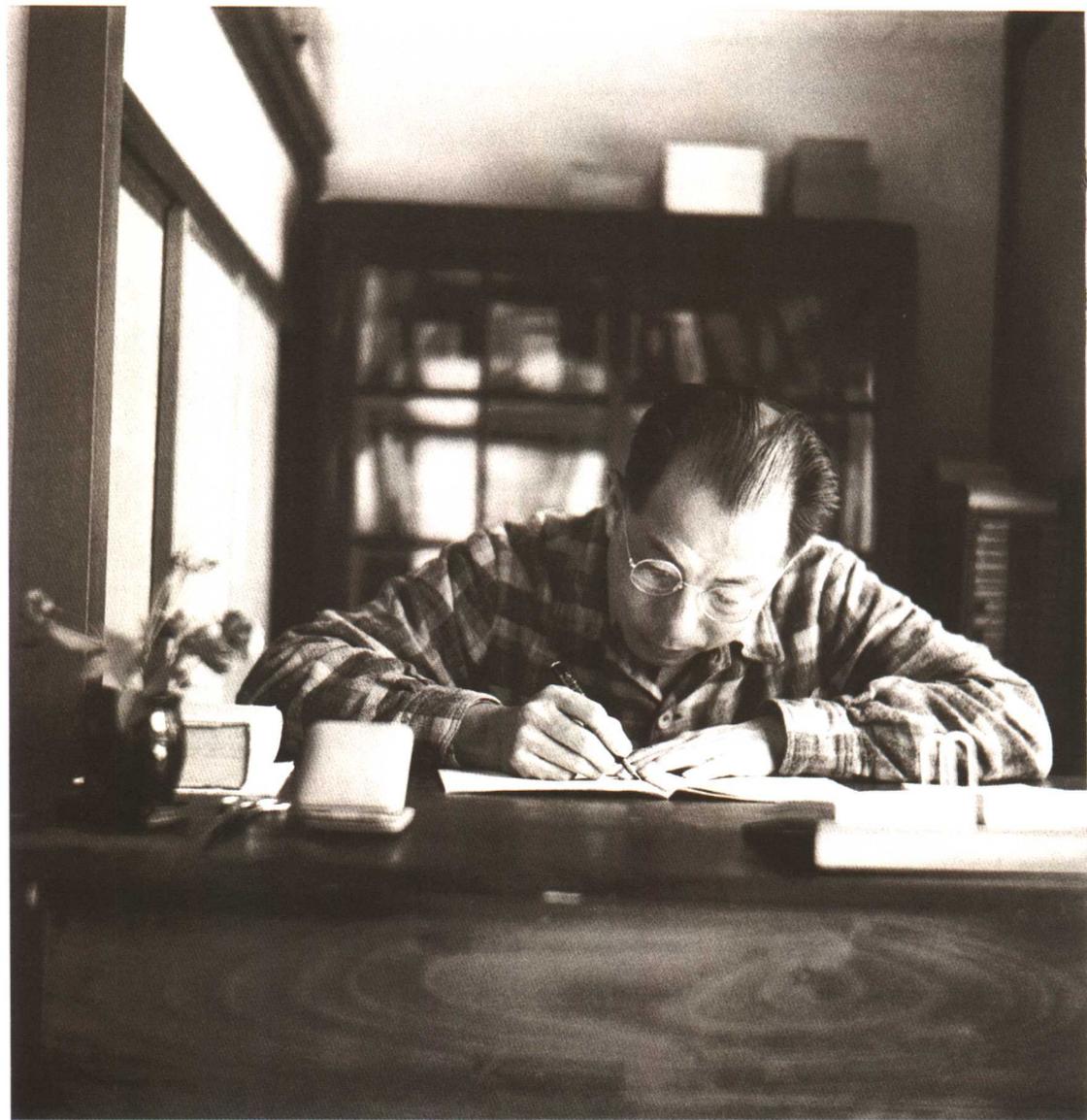
张学良则认为，“利害相同，有什么事应该明白告诉我。”看到刘乙光夫人不时找借口来察言观色，刘乙光则避而不见，见面连招呼也没有了，张学良觉得这些人“可怜又可笑”，“就是外方对我有什么图谋，好好地告诉，使我自戒，说明他的苦衷。何必这样鬼祟，拿我当傻瓜，可气！”

两人的地位、身份原本就不一样，想法及处事方式自然不同，张学良所经历的“风浪”多了，想想这是他们的职责，“也不外乎那一套”，生气归生气，照样睡大觉。这就是张学良的性格，处乱不惊，处变不慌。

但刘乙光在处置这次事件中的“无礼貌的不诚实的举动”，深深地伤害了张学良。随着“二二八事件”的平息，井上温泉又渐渐恢复了平静。张学良从刘乙光的讲述中，才大致清楚当时山外的情形，张学良也坦率告之自己的意见，希望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要隐瞒。可以想见，张学良提醒应注意的几件事，刘乙光心里肯定不痛快……

5月的井上温泉，风和日丽，草木葱郁，一派生机勃勃。不时有客人来访，为单调平静的生活带来了些许变化。让张学良感到高兴的是，莫德惠要来探视，自贵州一别，一晃一年过去了。5月12日下午5点，莫德惠风尘仆仆地来到井上温泉。老友再次相见，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莫德惠又捎来了诸多朋友的书信及礼品。与贵州的幽禁处相比，这里的风景也算不错。但这里生活条件更差了，旧式木板房中只有简单的家具。冬天潮湿阴冷，夏日稍遇大雨，四处漏水，而台湾又是台风的必经之地。井上温泉与外界只有一条公路，路面损坏严重，如遭遇暴风雨，人车皆无法通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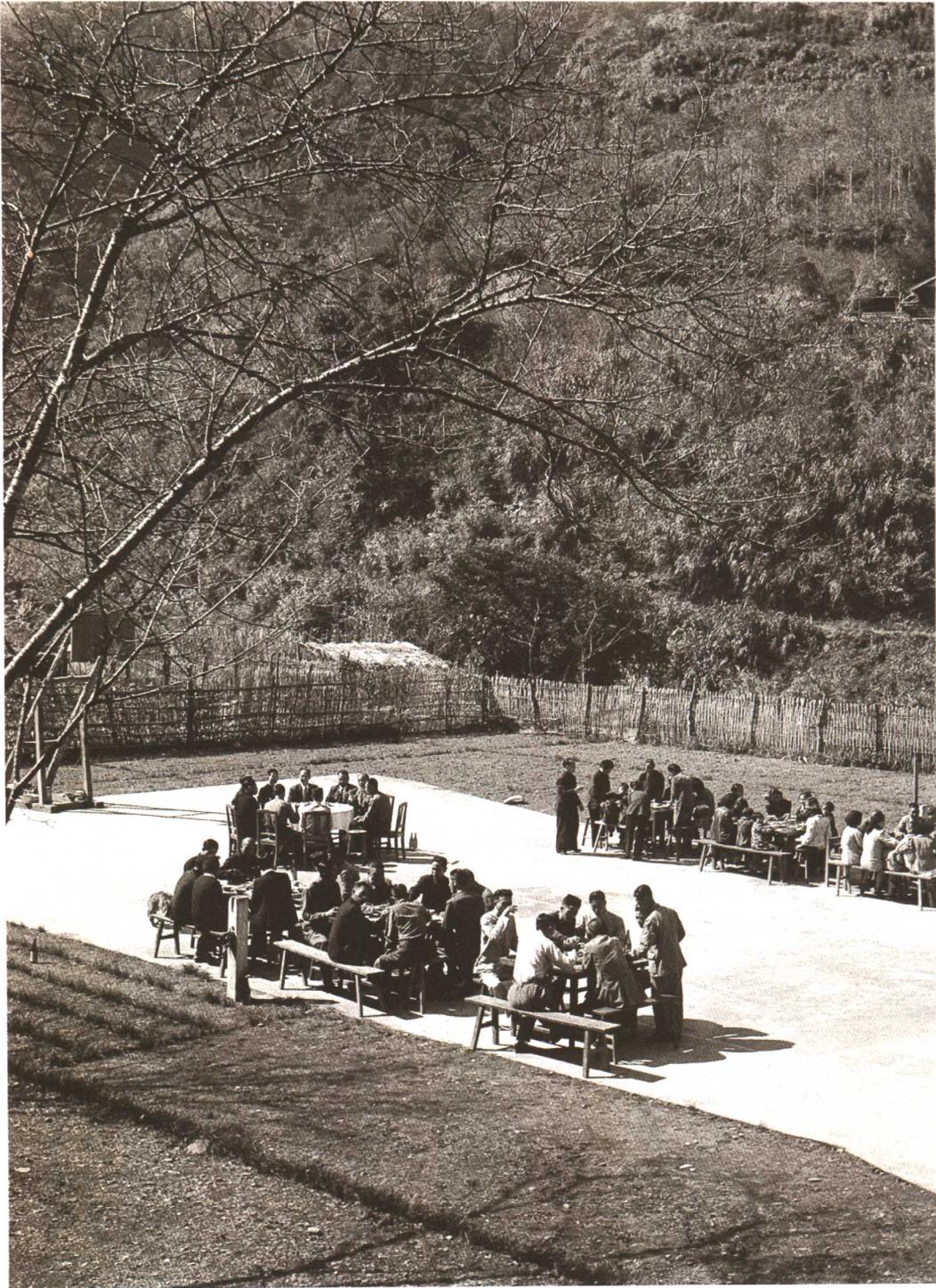
与莫德惠在贵州见面时，张学良与莫合影了几张照片。后来莫德惠接受了大公报记者高学逵的采访，发表了《张学良的生活——莫德惠由黔归来谈》一文，并配有张学良个人的照片及张、莫在河边垂钓的照片。这篇访谈分别刊载在1946



张学良有记日记的习惯，在山中，只要收到外界的来信或有人来拜访，他都会在日记中记下。有时也会写四个字“无事可记”。日记中常有反省之言，如：“自觉还有一点优点：①良心秉正，每遇大事，总是把国家和大家利害为思虑的主点，把自己的利害，置之度外。②富贵不淫，威武不屈。否则早成为了满洲土皇帝；因之上不愧天，俯不忤人。记之以备他日再自省时之参考。”



虽然在山中，赵一荻依旧按自己的习惯生活着。修指甲，涂指甲油，始终保持着一份女人爱美的天性。





年重庆版（4月26日）与沪版（4月29日）的大公报上。张学良看到后，专门将两张报纸剪贴，并在张、莫合影的照片之上，用毛笔小楷记下：“这是我同莫先生在贵州桐梓照的。”这一次，莫德惠在井上温泉住了一星期，张学良兴致勃勃地陪他四处走走，“政情和私人的事，无所不谈”，两人一起拍了好些照片。5月18日，莫德惠动身离去，这一走，何时能再见？张学良又写了20余封信托他转交，并题签他们在一起打网球后的照片及两人坐在小桌旁聊天的照片。“网球作戏。于台湾井上温泉，柳老纪念。毅庵，三十六（1947年）五、十六。”这些照片后来都发表了，让世人看到1946年在贵州、1947年在台湾井上温泉时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影像，也让人们看到了看守刘乙光的“真面目”。在囚禁地，刘乙光永远是“最高长官”、直属“国防部”保密局少将军衔的“看守者”。

这是1950年井上温泉难得的一次大聚餐。共摆了八桌，居中一桌，自然是刘乙光为首，还有张学良、赵一荻及队副等人，女人与孩子占了两桌。这块场地的上方就是张学良、赵一荻的住所，张学良有时在此打网球，边上有篮球架。趁大家刚入席，张学良在山坡上拍了这张“看守人员”大团聚的照片。性喜热闹的张学良，在这种场合，总会拿出朋友相赠的洋酒，让大家“开开洋荤”。



1949年1月，张学良见报载“蒋总统于21日引退，去奉化”。并从申报上得知：“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2月1日，刘乙光告之“即将迁移，但未言何处去”。2月2日，“夜三点由井上出发，11点（因为天气）由新竹飞机场乘机起飞，12点10分抵冈山，再乘汽车至高雄要塞，住于寿山要塞兵舍中。”因害怕外界知道张学良的住处，张被紧急转往高雄。这是他们在住所前的合影。



经过这次秘密转移，张学良似乎已明白，恢复“自由”是不太可能了，无奈和沮丧都写在了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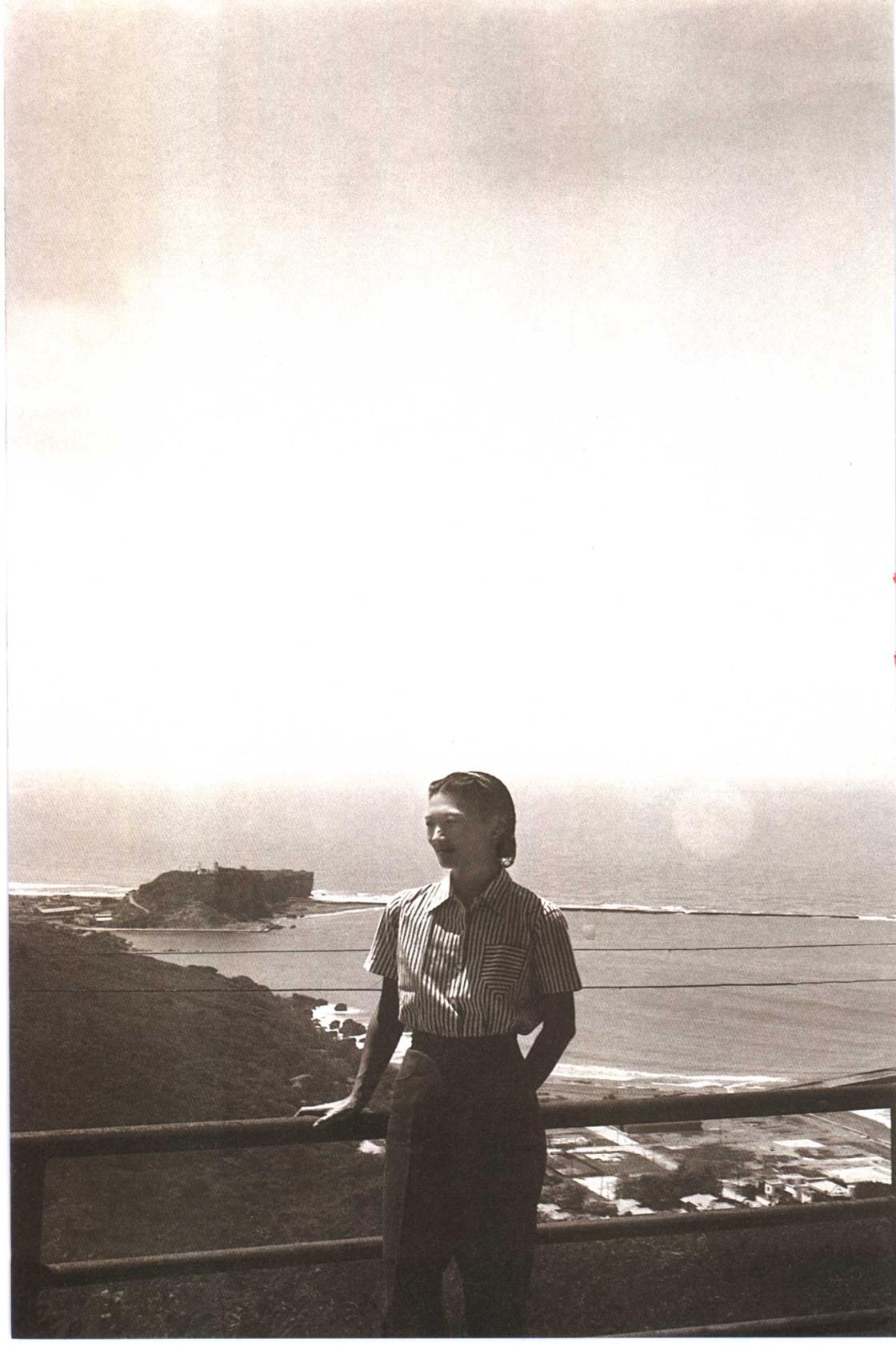


赵一荻在寿山兵舍廊前。



由于转移仓促，临时住所潮湿破旧，直到5月7日才“搬到要塞中新修理的楼居住”。

在寿山可以远眺高雄港。（右图）







赵一荻在寿山兵舍廊前。

张学良是从报纸上得知李宗仁上台后要“释放张、杨”的消息的。秘密转移后，不让看报，他在日记中写道：“上峰已准允照常阅报（迁居以后，未得看报）。”由于走得仓促，井上的书未及搬来。这段时间，张学良无书报可读，只能爬山，“登寿山顶远眺”。（左图）



吴妈一直跟随照料着张学良、赵一荻的生活，虽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

张学良在高雄住了将近一年，这期间，蒋介石、蒋经国都曾来过高雄，因为张学良拒绝对时局发表意见，他的求见要求无人理睬。1950年1月28日，张学良、赵一荻搬回井上温泉。从此，外界再无张学良的音讯，直到1960年。（右图）



四

“两张”汇报 宽严皆到

张文白携同张太太、长女公子（周太太）、长公子（张一真）、长媳（钱玫）、弟（张文心）、刘仲荻、张团长等十余人，来寓探视，披沥畅谈一切，午饭后又再小谈，珍重相别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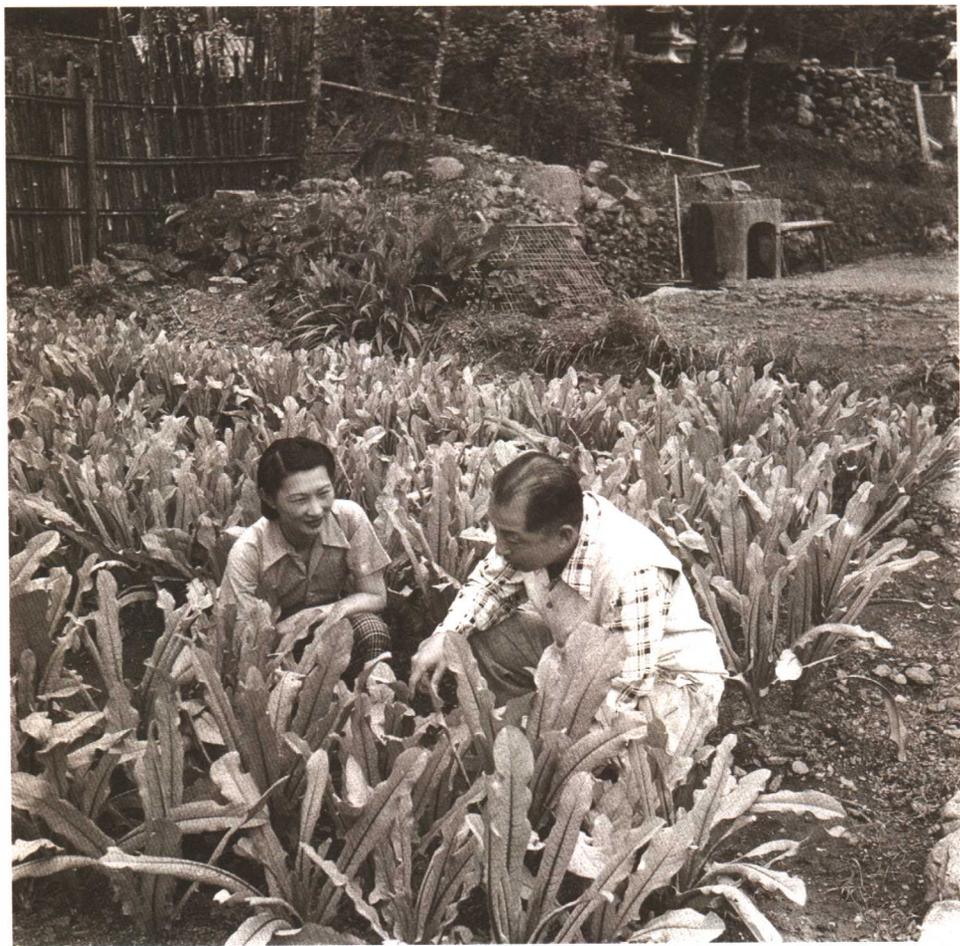
1947年10月30日

张严佛在此间数日，无所不谈，今日离去返京，余书上蒋夫人函，复郑介民信，另函张岳军、莫柳忱，统交彼带去。

1947年11月11日

去年今早晨打台北回來，帶給我兩個皮箱子，說是由陳至希交給他轉過來的，是王宋交給他的。打開一看，是朱秀峰帶來的，有給^陳的，甚多的用的東西，是去年託他買的，他早已買好了，現在才有機會帶來。還有好多吃的，是他送給的。另外有玄覽堂叢書一部，因為沒說明來歷。

1947年10月，有两位客人前来探访。张学良的日记中有记录的，一位是张严佛，一位是张治中。张严佛是奉命前来的，10月19日，张持时任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保密局局长郑介民的亲笔信到井上温泉，说是在此小住一段，暂时代替刘乙光。从张严佛后来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到张学良诸多的牢骚与不满，包括多年的积怨与两家日常的摩擦。实际上，张学良的不满与怨气更多是针对“二二八事件”中刘乙光的态度与做法，完全是把他当作“人犯”来对待，那种冷漠与职



井上温泉远离城镇，山居生活，引来泉水，开荒种地，种上几畦菜，贴补“家用”。但张学良的装扮怎么看也像一位“教授”在传授种菜“体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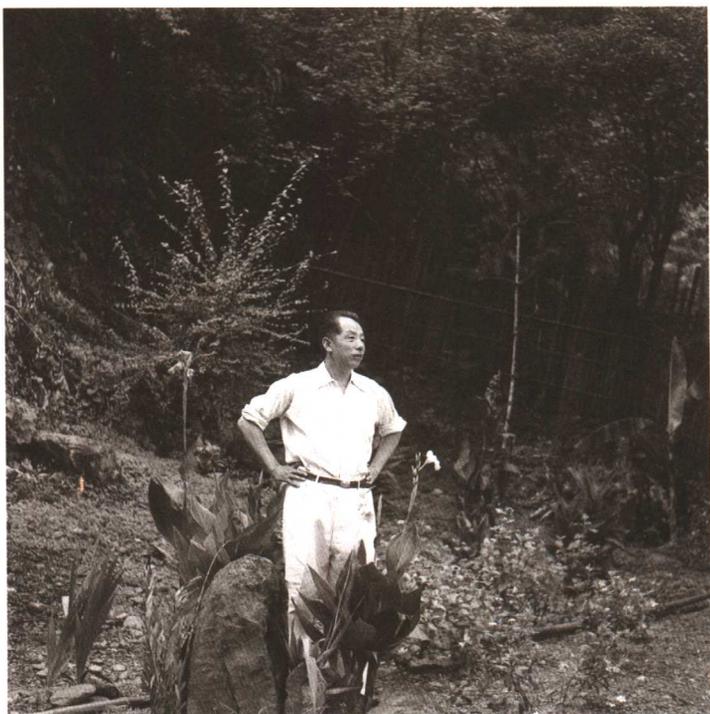
读书累了，张学良就会到自己种的菜地看看“是否长虫了”，“是否需要上肥了”？井上温泉吃菜要到几十公里外的竹东区购买，这几畦菜地的长势自然会让张学良牵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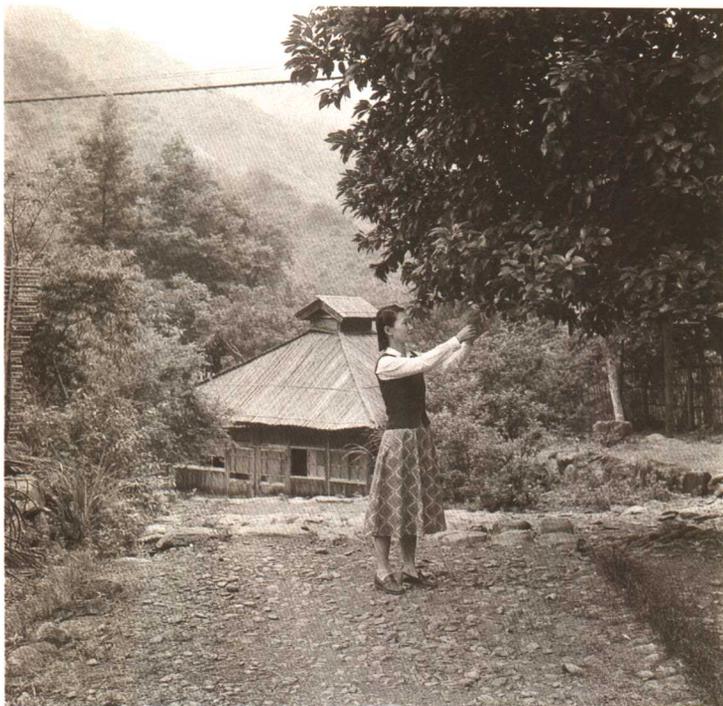
业的面孔。当时张学良很是生气，却又只能自己化解。张严佛的到来，刘乙光休长假了，这些牢骚话，加深了张严佛原本听说张、刘矛盾很大的印象。张学良久居山中，无可聊天之人，亦会口无遮拦。他们在一起谈往事，谈明史，谈历史人物，有时也会涉及时政。正如张学良在日记中说，“在此间数日，无所不谈”。张严佛是11月11日离开井上温泉的。

“Edith (赵一荻) 花园戴帽全身像”。娇艳的美人蕉映衬着年轻的赵一荻，也许就是这一刻，让赵一荻和张学良感悟到了人生的愉悦。



“大丈夫顶天立地”，这是张学良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背景的建筑，是张学良、赵一荻及看守们洗浴的地方。引来的泉水，自己烧柴加热后，方得以沐浴。



闲来看山景，往事如烟，山河依旧，故乡难归。

喜好打扮是每个女人的天性，即便在大山之中，也不例外。台湾高山族（山地原住民）独特的装束，让赵一荻也刻意当了一回“模特”，成了“赤脚大仙”。



在此期间，10月30日，井上温泉突然来了几位客人，即张治中（字文白）与妻儿。张治中的探访完全是偶然的，时任西北行辕主任的张治中到台湾休假，听说张学良幽禁于新竹，便找到自己的学生、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提出要求。彭孟缉未接到“上峰”通知，不敢答应，张治中言“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才获同意安排进山。

张治中的突然到访，张学良是很高兴的，早早就迎候在门前。距1938年湘西沅陵相见已有九年。张严佛借故躲开了，赵一荻则带着张治中的家眷，沿小路上山游玩，留下张治中、张学良两人聊天，话题自然离不开“恢复自由”之事。张治中在回忆中谈到，张学良表示“他恢复自由以后，哪里也不去，蒋住哪里，他就住哪里，也不一定做事情，可以先观察他一个时期以后再说”。“自由”对于张学良来说，实在是太渴望了，他已经没有别的任何要求了。虽然在井上，在日常生活中有小范围的空间，可以到屋外或周围散步、打球，但不能跨出警戒的圈子。他希望张治中能向蒋、宋转达他的请求。



这是张学良为所有看管他及赵一荻的“随从”拍的合影，摄于井上温泉附近。这里山高林密，看守众多，可谓插翅难飞。刘乙光与家人永远是处于居中或前排的位置，前排为刘乙光的儿女，赵一荻（穿格子上衣）与吴妈站立在刘乙光左右。

两家人在一起吃个中饭，饭后接着聊，谈时政，谈家事，谈四弟张学思，也谈及与刘乙光及其家人住在一起颇多不便之处等等。张治中一家下午四点必须赶回新竹乘火车回台北，行前两人拍了照，张学良写了一首诗相赠：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嘉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唯有清茗对此心。

话别之时，相对黯然，“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张学良叹息，张治中后来一想到此景：“我当时心里真是难过得很。”

张治中一家在井上温泉仅待了一天。张学良的诗后来发表在沪版大公报上，但两人的合影有可能是张治中携带的相机拍摄的。这也是张学良在台囚禁期间为数不多的几张在内地发表的照片。

张严佛、张治中回到南京后，各自通过不同的渠道，将张学良的情况向“上峰”汇报。张严佛将在台期间与张的谈话及张学良的信报告了郑介民，并由郑特报蒋介石。而张治中则直接见了蒋介石，转达了张希望恢复自由的请求，蒋听后显示出不高兴的神态，谈话无法进行。张治中只好去见蒋夫人，告之张学良的情况及请求。

“文白兄，我们对不起张汉卿！”这句话深深地印在张治中的脑海里。宋美龄认为“恢复自由”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但改善张学良的生活条件“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张治中也许没有想到，他去南京，见了蒋介石、宋美龄，两人的反应各异，给幽禁台湾的张学良带来两个变化。蒋介石非常生气，并把刘乙光找去，态度严厉：“以后非经我批准，任何人不许去见张学良！”从1948年开始，对张学良的“管束”更加严密，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外界再无任何张学良与赵一荻的音讯。也无人再敢未经批准前去探访。同时宋美龄也将刘乙光召去，询问了张学良的近况，要求对张、赵的生活给予更多的关照。

1948年1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井上温泉，给张学良带回了蒋夫人、莫德惠的信件及家人闰瑛来信，还带回了蒋夫人送的圣诞蛋糕一块。原先计划迁往江西的准备也放弃了。虽说圣诞节早过了，但蒋夫人的关照到了。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老刘对我讲，他曾去南京，曾见过蒋先生、蒋夫人和柳忱等。”刘乙光是否告之实情，不得而知。但他要继续扮演这个角色，捏拿好个中的分寸，也真劳神费心思。难怪他的脸上很少能有笑容，总是给人忧心忡忡的神态。因为刘乙光讲述了见蒋及夫人的经过，晚上张学良怎么也睡不着，躺在床上，想了一副对联：“爱护相殷，关切之深；主见之分，国事之争。”

五

“总统”下野 张赵南迁

刘乙光由台北返，交来蒋夫人函一件、毛人凤函一件并附书籍物品等，派来一位周念行先生为研究明史者。

1948年5月9日

早六点出发，下着小雨，但（要）不因为恐怕下雨，就不去了……过竹东到北埔途中，雨又大了一点，可不算大雨，快到狮头山，天要晴，到狮头山脚下，雨完全驻（住）了。在劝化堂素餐甚快。游狮岩洞，约登两千（级）台阶，开善寺佛殿甚大。回来经过香山海滨，快哉！

1948年10月30日

见报载蒋总统于廿一日引退，去奉化。

1949年1月23日

老刘交阅廿三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并告余些别的事。

1949年1月25日

老刘由台北返，言余事又有变化，我等即将迁移，但未言何处去。

1949年2月1日

夜三点由井上出发，十一点（因候天气）由新竹飞机场乘机起飞，十二点十分抵冈山，再乘汽车至寿山要塞兵舍中。

1949年2月2日

二月十二日

刘由台北返，带来由蒋夫人转来的风玉去年十月九日的信一切和相片三张。

二月十六日(旧年除夕)

刘在寓大过客有区长和好多的江山男女，饭后在我房间江山男女舞唱一番。

三月四日

刘带来怀敏六妹信，言她去年八月廿七生了一个男孩子，叫我给他起一名字。我给起了两个，鲁本Reuben和哲孙Jason，让她自择，复函交刘持给她。

三月五日

复风玉信附相片一张，叫他买三件东西，行由蒋夫人转，加巫毛局长代呈。

三月廿九日

刘带来六妹信，她生了两名鲁本，并带来香烟糖菓等。即复函，(吴母转)。

四月九日

早六在三刻，吴妈叫我起床，说鲁本不知是怎么来的了，我一着他就自斃了，我刘速了医生，意外的把他救活了，这真是奇蹟，我先受伤，而后又十分平安，这真有神保佑。

四月十六日

昨天周先生由台北返回。刘带来蒋夫人批等信，言将来寓探视。刘又告语杜之沛和峰已知悉，毛局长已赞同余之问题，应管一东，但不知如何办法，大家来商讨。我思改了一夜，今晨同周刘一谈，余言三策，但周先



“Edith和我”。这张合影，张学良是比较满意的。少帅“豪气”不减当年，“雄浑”与“婉约”相依相衬。四周的篱笆却让人感到压抑，一种“笼中鸟”的无奈。

1948年到1949年，正是国共两党大决战的关头，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在东北、中原、西北、山东相继歼灭国民党的有生力量，紧接着又发动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的百万大军土崩瓦解，节节败退，从东北退到华北，再退到长江沿线，并做好退守台湾的准备。大战之际，蒋介石自是无暇顾及张学良了，前线吃紧，他不时飞抵各地督战。内部各派争权日盛，1948年4月召开的“国大”，蒋介石当选总统，李宗仁则以1438票击败孙科当选副总统。这结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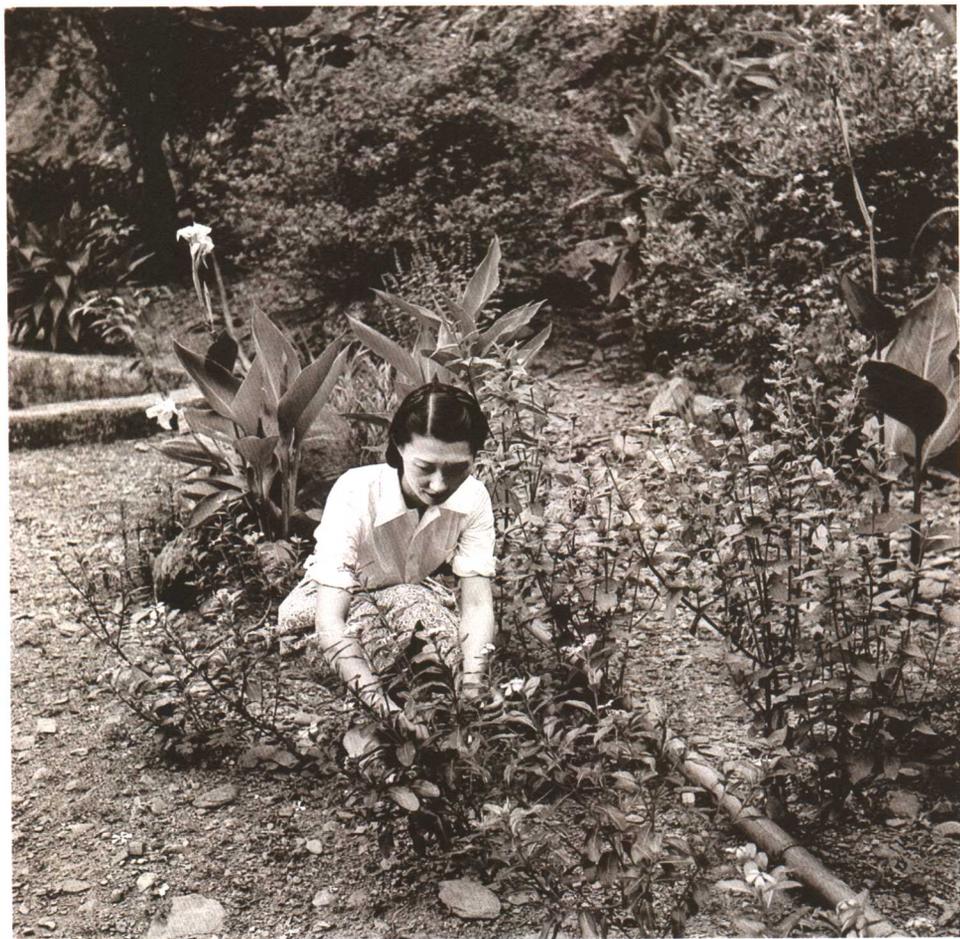


想当年，统帅大军，令行禁止，征战不休，如今成了“鸡鸭司令”，甚至连公鸡也不听“主人”的召唤，主人想拥抱一下的机会也不给。这些鸡鸭也成了张学良“馈赠”他人的礼物，如托人送宋美龄、毛人凤以表示谢意。

对蒋来说是很不舒服的。

内地战火纷飞与台湾的风和日丽形成鲜明的对比。

此时，幽禁于井上的张学良、赵一荻仅能从报纸、杂志或友人、家人的来信中，得到一点消息。也许是蒋夫人的关照，对张学良的“管束”采取了“外紧内松”，刘乙光及夫人、张学良、赵一荻不时可以一同驱车到井上温泉周边游玩，如驱车五指山（海拔1061米），让夫人们在上坪宋家等待，刘与张登山观景，有时



摘朵小花装扮自己，让平淡的生活增添些许亮丽的色彩。张学良、赵一荻在小院中种了许多花草。

也集体外出野餐。1948年5月，刘乙光从台北归来，还带来一位“陪读者”即周念行，这也是蒋夫人挑选并派来的，周念行是研究明史的专家。

1948年7月，张学良第一次体验到“台风”的猛烈。7月6日，来自太平洋的飓风在台湾登陆，“约在正午，暴风起，下午二三时左右。狂风暴雨，至夜中二三时风息，但小雨未停。溪水大涨，本地人说二十年所未有，将桥梁下边两个澡塘（堂）房子，全冲坏了”。井上温泉的房屋都是破旧的木板房，屋内到处



研究明史，是张学良幽禁期间的一大“收获”，他不时托人买书，列出书单让家人请毛人凤帮助购买。宋美龄知晓后，专门请了一位明史专家到山里来“伴读”。青灯古卷，读史知兴替。



本是大家闺秀的赵一荻亦能熟练使用缝纫机，自己动手，缝制衣被，抵御山中的寒冷。张学良拍照后写下“Edith（赵一荻）使用缝纫机”。张治中携女儿赴井上温泉，其女儿归来后说：“赵一荻的衣服大部分是自己做的。”



“Edith（赵一荻）站在清泉桥上”。赵一荻身体一直不太好，害怕走上高高的吊桥。这一次，也许是在张学良的鼓励下，战战兢兢地走到桥边，紧紧抓着吊线，才拍了这张照片。

漏雨，“中夜起来，迁床搬东西”。这天晚上，张学良、赵一荻一夜未眠。晨起，看到暴风雨带来的破坏，不禁感叹：“不知此次台湾灾情如何？反正总是苦些小百姓。”

山居期间，看病不方便，刘乙光从台北带来眼科、牙科大夫，为张学良、赵一荻治牙配眼镜。张学良需要的一些日常用品也会列出清单，请刘乙光托人去买。

刘乙光与张学良的关系也渐有缓和，刘乙光的孩子大了，便托张学良给时任台湾省主席魏道明写信推荐，“谋一挂名，以增家用”。

1948年年底，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濒于崩溃，金圆券贬值，物价飞涨，军事上也一败涂地，宋美龄决定只身赴美游说，争取杜鲁门的支持。张学良听说后，



在井上温泉，除了看守，无人能陪张学良聊天、坐论古今。读书之余的散步，其神情也总是一副“沉思”状，胸中块垒，无法排遣。

写了一封给于凤至的信，托毛人凤转蒋夫人带去。

1949年1月23日，张学良读报时，看到了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的声明：“……本人因故不能视事……决定身先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介石是在内有白崇禧、李宗仁相胁，外有美国人不支持，内外夹击下，蒋介石“引退”并返回浙江奉化溪口。表面上看蒋介石躲在家乡，实际上依旧操纵并遥控着大小事务，如长江布防，企图以长江天险阻拦解放军的进攻，安排蒋经国到台湾。这一时期，国民党军政要员络绎不绝于溪口途中。

李宗仁任代总统，立即安排与中共和谈，并发表了八项主张，其中有“释放政治犯”，提出恢复张、杨自由。此时，国民政府已失去“半壁江山”。



在井上温泉，只要出去游玩，张学良总是跑前跑后，充当摄影师，为赵一荻和大家留影。这张照片，则是难得坐下来陪着赵一荻吃几口饭，张学良一边吃饭一边听讲，他的头发几乎全谢了……

1月25日，刘乙光给了张学良一张申报，张学良在日记中记下：“23日申报载，政府明令，余及杨虎城，恢复自由。”寥寥数字，无悲无喜，抗战胜利之时蒋介石“威望”如日中天，尚不得释放，如今败走“麦城”，此令有效吗？刘乙光第二天赶赴台北请示，几天后托人给张学良捎来一信言“大体已定，只等飞机”。到2月1日，刘乙光返回井上，说事情又有变化，马上搬迁转移，“仍未告之去向何处”。

2月2日，夜里三点从井上出发，赶到新竹飞机场，因天气恶劣，直到11点才起飞，12点10分抵台南冈山镇机场，机场已有军用汽车等候，下了飞机就直奔高雄要塞，秘密将张学良、赵一荻藏于要塞的兵舍中。为何要连夜紧急迁移？据一些军统（保密局）特务回忆：当时李宗仁代总统要求“恢复张、杨自由”，保密局毛人凤借口不知“张、杨”在何处，推托不办。尽管各界呼声高，具体事没有“蒋先生”点头，自然无人去落实，一拖再拖，遂成一纸空文。而张学良、赵一荻被囚禁于台湾井上温泉已被外界知晓，为“安全”故，将张学良与赵一荻紧急转移高雄，与外界隔绝。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占领南京，“总统府”顶上的“青天白日旗”落地。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蒋介石退守台湾。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自此，海峡两岸形成对峙，来往断绝。在数十年间，张学良、赵一荻的音讯如石沉大海。

六

重兵看守 屈居兵舍

老刘返来（12日未告之离去），语余彼曾去沪，上峰已准允照常阅报，（迁居以后，未得看报）带来报纸多份，知道事情不少。柳忱在台。

1949年2月21日

高雄码头发生大爆炸。

1949年8月23日

老刘返来，交毛人凤信，言夫人之函即为呈上，又言因空袭关系，吾等仍迁回井上。老刘说定于廿七日乘火车离高雄。

1950年1月25日

戈刘亦来 蒋夫人转来风玉, 琪, 玳琳, James
信各一件, 附照片和照相机等。

八月廿三日

戈刘亦来 James 由美来云附美金支票三千
元。我给毛局长一函托女代取, 言取美
金较好, 市上贾价好一些, 并将 James 原信
附去, 以便查对提款。

九月十日 筵第

戈刘昨天由台北回来, 亦来现金二千元以
备零用, 另台湾银行便利存款收条一纸, 计
台幣二万八千七百五十元。两共新台币30750元
係美金三千元之折换的, 款係毛局长代寄存
的。复致风玉, 琦, 玳琳, James 等信, 上蒋

夫人云托代转, 由毛先生代呈, 戈刘言刘太太
日内返台北, 不必派人, 以省路费。

九月十三日

明日刘太太去台北, 将家信及上蒋夫人信,
给毛局长信加封, 统交戈刘。

九月廿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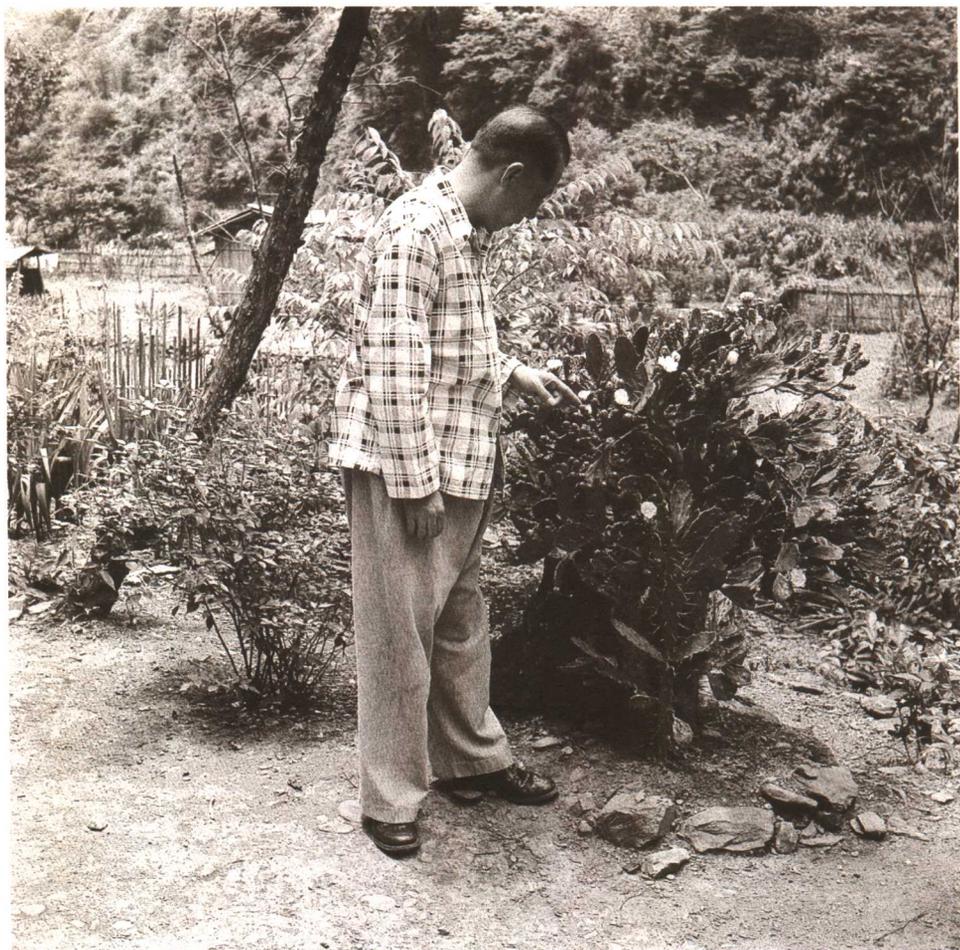
蒋夫人来信一件, 呈月并, 荼萼, 桔子和英
文什诺等(中秋节惠)。

九月廿六日

复何 蒋夫人函。

十二月廿三日

上蒋夫人和 蒋总统贺年及圣诞节信
一件, 加封给毛局长云托代呈。



仙人掌的花朵，让“少帅”好奇。生于东北的张学良是第一次见到这种热带植物开花，带刺的茎枝让人欲触而不敢。

原本一直囚禁在大山之中的张学良、赵一荻，一夜之间被转移到台南高雄的海边。寿山位于高雄的西北角，扼守着台南大港——高雄港，因其位置特殊，是进出台湾的“南大门”，一直由国民党军重兵把守。由于走得仓促，张学良、赵一荻基本上什么也没带，几乎是两手空空，要塞司令吕国桢等人闻讯前来，设宴招待并相赠了好些食品。直到1949年5月，才将要塞中一栋旧房，修理粉刷后，让张学良，赵一荻从临时的兵舍中搬入“新居”。

兵舍四周警备森严，唯有海边风景让久居山中的张学良顿觉眼界开阔，但张学良与赵一荻只能在有限范围走走或拍照玩。最初，井上温泉的生活用品及书籍未运到，刘乙光又交代，不允许看报，害怕张学良知道外界的情况。这更让张学良整日无所事事，无书可读，无报可看……刘乙光将张学良、赵一荻转移到高雄之后，悄悄到上海向“上峰”汇报，回来后装模作样告之“上峰已准允照常读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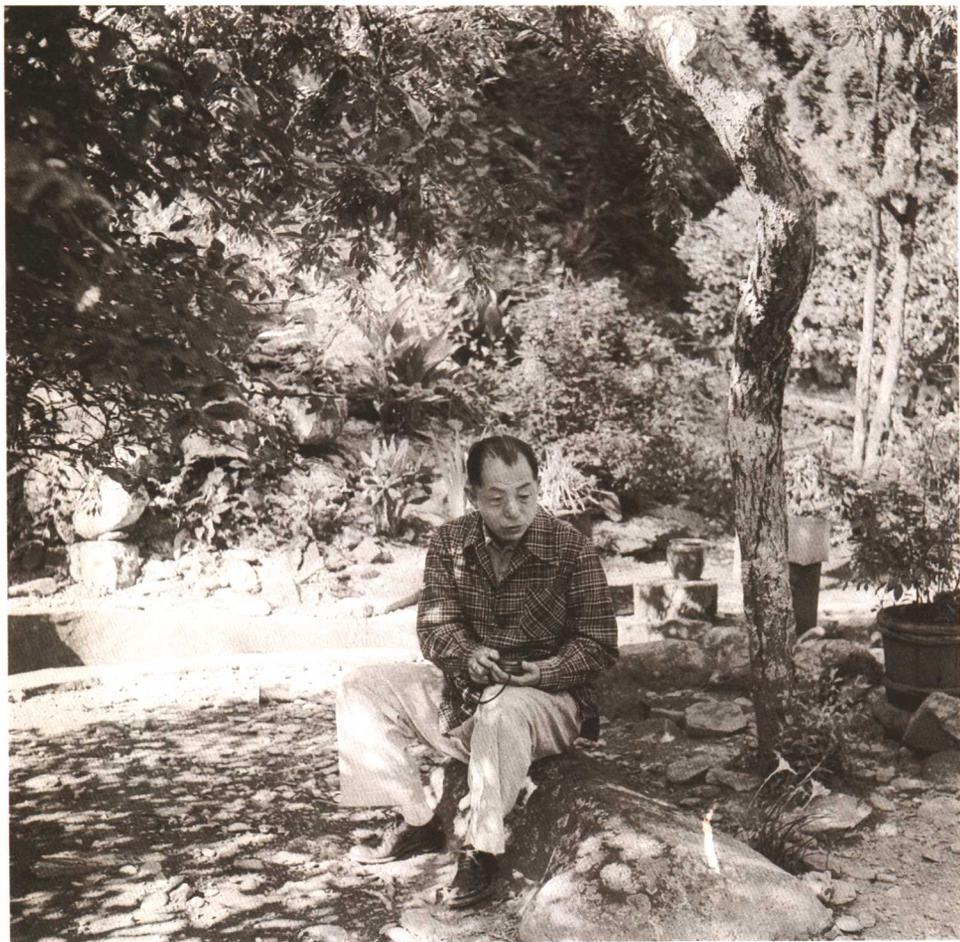
景致宜人，张学良依旧闷闷不乐，经过这次由“释放”到紧急“转移”，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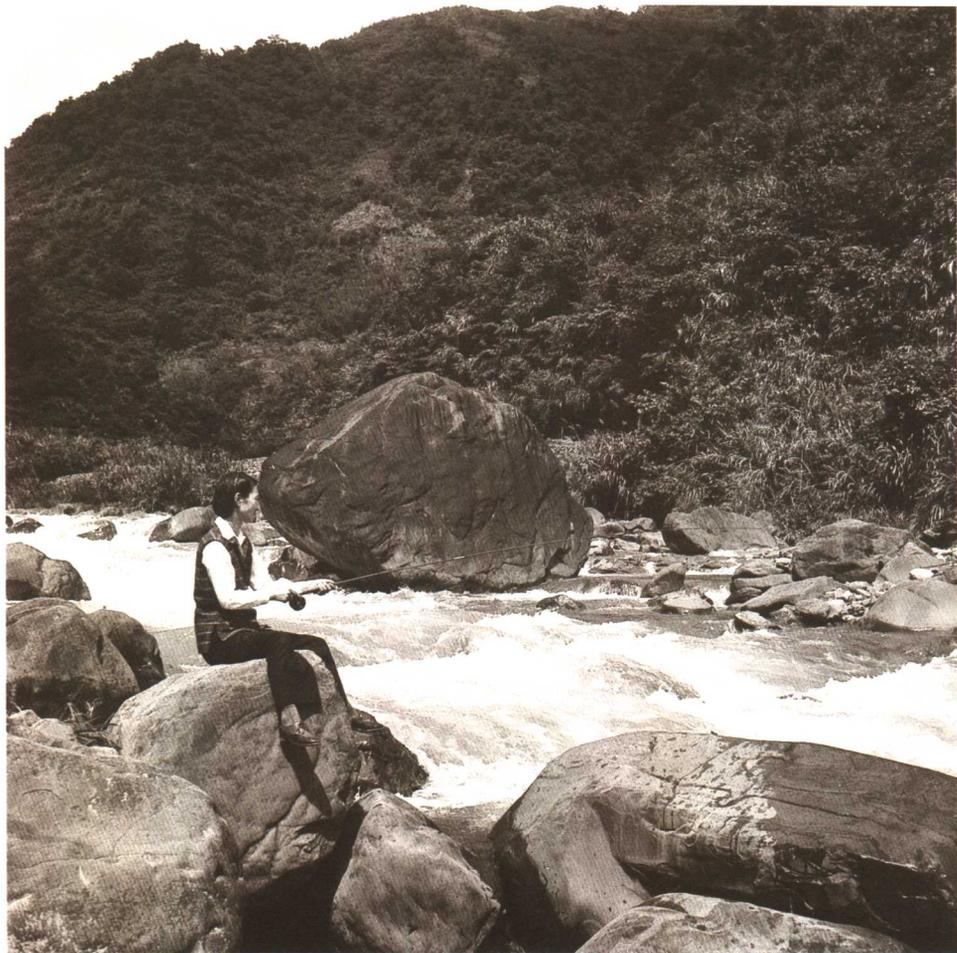
仙人掌在台湾随处可见，但开花却不容易，常常要经过漫长的等待，才能见到这些鲜艳娇嫩的花。难怪会吸引赵一荻驻足不舍离去。

学良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前途”，恢复自由，遥遥无期。

6月1日，刘乙光故作神秘状，说“应趁此时蒋先生在此，可以把问题解决一下，他想去看蒋经国”。也就是说蒋介石已到了台湾。张学良请他见到蒋经国，告之“我想会一会”蒋介石。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我把我的意见表示一番：1. 蒋先生也为难。2. 我向何处去？3. 只有陪从。4. 托经国一见。”无奈沮丧之情溢于笔端。



除了读书看报，大山深处无可消遣，听收音机使张学良忘却了自己身在何处，让思绪随着电波起伏……



山中的小溪，雨季时河水大涨。垂钓，一直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喜好，看着鱼鳔在急流中起伏……人生亦如此，唯有静静等待。

此时蒋介石失去了“大好河山”，退守小岛，正忙着布置台湾岛的防卫，安顿那些一同迁台的大小官吏，哪有工夫见张学良。6月18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告知张学良，他已见过蒋先生和蒋经国，并把大概的情形谈了一谈，说“蒋经国对我（张学良）意思很好”。未提及见面事。

高雄的寿山、西子湾，给张学良、赵一荻留下美好的印象。一次众人相伴一起登上寿山顶，近看高雄港船只进出，远眺海天一体，令人心旷神怡……

1949年8月23日上午，忽然传来巨大的爆炸声，张学良“平生头一回，听

张学良的相机镜头，始终是对准赵一荻。大山深处的赵一荻在不同季节变换着衣着，成为张学良囚禁生活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着旗袍装的赵一荻，给人的感觉宛如“小家碧玉”的江南女子，亭亭玉立。



夏季“着短裤戴草帽”的赵一荻。





台湾秋日之宁静气爽，似乎镌刻在赵一荻的脸庞上。



冬季，鲜花依旧盛开，一身素雅的赵一荻。

见这么大的声音”，跑出屋外，看见高雄港那边火焰冲天、浓烟滚滚，一会儿，“空中落下黑油点如雨”。后来一打听，原来是一艘运军火的船发生爆炸，半个码头起火，这场大火足足烧了12个小时。

不知不觉，在高雄已待了近一年。1950年元旦刚过，刘乙光听说蒋夫人在台北，提出要张学良写一问候信，并要求不通过毛人凤，直接由他交蒋夫人。张学良拟了草稿，送刘乙光看后，不满意，刘乙光让张学良要在信中“表示表示对时局的意见”。这让张学良左右为难，“不知由何下笔”。身为囚禁之人如何来评议这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的时局呢？考虑再三，张学良仍寄上一问候短信，请刘转毛人凤。这让刘大为失望！

信是转去了，刘乙光从台北带回的消息是：高雄要塞已成为“共军”空袭的目标，为安全起见，定于1月27日返回井上温泉。这莫名其妙的“借口”，是否是刘乙光的报复？因为只要走出大山，“少帅”张学良的大名，无人不晓。基地要人宴请时总是将张学良奉为“上宾”，刘乙光不满又不好发作。张学良与赵一荻刚适应这里的生活，现在又要准备收拾行李返回温泉。面面相觑，情绪低落。

1月27日“早，洪司令夫妇及吕太太来送行。下午同Edith（赵一荻）、老刘到西子湾、高雄码头，屏东公园游览一番”。又是在临离开前“开恩”到高雄市内“观光”。晚上八点“洪司令来同车赴高雄火车站，备有包车四辆挂于九点的班车上，九点由高（雄）开车”。第二天“早四点廿七分在新竹车站下车，改乘汽车，因路太坏，中途换吉普车”，晚八点才抵井上温泉。

冬日之井上温泉，因地势高，早晚寒气逼人。裹着厚厚的冬衣，也难抵御屋内的湿冷。一封发自美国、在途中整整走了四个月的于凤至来信，多少带来些暖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宋美龄的来信。阴历除夕的夜晚，从高雄回来的刘乙光很是兴奋，破天荒地请来了竹东区的区长及周边的高山族人，一同共度除夕。要知道，周边的山地居民平日里是不能随便越过井上温泉附近的警戒线的。能歌善舞的山地居民，年夜饭后，在张学良的屋中拍着手“舞唱一番”，虽然听不懂歌词，但生气勃勃的舞姿，曲调中透出的欢快，深深感染了这位已两鬓飞霜的东北“老长官”。这促发了张学良后来对高山族的情况深入调查，就改善高山族人民生活及生产状况提出了建议，并请人缮写后呈交蒋夫人。他想为山民做点事。

七

“夫人”牵线 大洋家书

老刘交来蒋夫人亲笔信，言将来寓探视……复蒋夫人函，切请其勿来，因路远而太坏，余可随时随地往见。

1950年4月16日

老刘返来，交来蒋夫人函及食品多件。语我他去台北，见过毛先生，由毛带见蒋经国，由经国带见蒋先生。一切正在研究中。蒋夫人不来了，候指定地点见面。

1950年4月24日

老刘交来伊雅格由美来函附美金支票3000元。我给毛局长一函托其代取，言美金最好，市上卖价好一些，并将伊雅格原信附去，以便查对提款。

1950年8月23日

一月十一日

上 蒋夫人一函，指示党员归队事。

二月八日

蒋夫人来函内附党部公函，外年礼四色。即复函。

三月四日

范刘将去台北，把写好了的贺蒋夫人寿信及寿礼（江山布两匹）系刘带去。

四月廿一日

范刘由台北返，言明日我们去大溪，有一人要见我，係蒋夫人交办的，是刘佳，他不知道。

四月廿二日

早六点出发，十二点到大溪，约等一个钟头，来见者是 James，带来蒋夫人的信和糖果什送，TV

的信，宗信等，谈至四点多钟才分手，余给他签了数张银行文件。住宿于大溪蒋庄。

四月廿三日

早七点由大溪动身，下午一点许返抵井上。

四月廿六日

上 蒋夫人音附宗信三件，TV信，James的信。

五月五日

上 蒋夫人音附对江山人之意见。

六月十四日

周先生由竹东同一寸差，需要向蒋夫人阅于江山人意见书原稿，要立即抄录原人带回，由周抄，余签名交来人当晚送去。

九月一日

见报载 蒋夫人感冒致书问候。



居家早餐，面包黄油，鸡蛋是自养的鸡下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950年4月，一连收到了两封宋美龄的来信。

在4月11日信中，宋美龄说：“自我返国，我就一直安排和你见面，所以未给你写信，但每次要去看你时，总临时有事……但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忘记你……所以，下周末我将可以来看你。”宋美龄说到自己“身体不适”，希望张学良要“仰头振作”。

张学良一算时间，急忙复函，“切请其勿来，因路远而太坏，余可随时随地往见”。信让刘乙光带去台北。



除了读书或户外的散步，很多时候，张学良是呆坐在屋内，泡上一杯茶，点着烟，静静地遐想，在缭绕的烟雾中，放纵无边的思绪。

4月24日刘乙光从台北回来，面带喜色，说他到台北后先见了毛人凤，又去见了蒋经国，“由经国带见蒋先生，一切正在研究中”。并带回了宋美龄的信及糖、罐头等。

宋美龄在信中说：“下周我应该可以和你见面，时间和地点我会通知刘乙光告诉你。”

1950年4月30日，头一天已接到通知，让张学良今天去蒋介石大溪官邸，说“蒋夫人”约见。1936年西安事变后，与宋美龄同机飞南京，一别十余年未



原本一直担任“少帅”秘书的赵一荻，在井上温泉，变为主妇兼秘书，张学良的一些信件或手稿，都是赵一荻誊清后寄出。因为井上温泉无电照明，“秘书”工作大部分只能在白天进行。

见面了，但彼此之间书信未断，宋美龄总是在每封信的开头称之“Dear 汉卿”。随信还寄来各种礼物，不时地询问需要些什么；为他请来伴读明史的学者；怕他寂寞，寄来了杂志；甚至寄来了小狗的照片，告诉张学良，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是否需要送来一只做伴……

接到通知后，张学良辗转于榻，一夜未眠。

早上五点半出发，沿着崎岖的山路北行，11点到大溪蒋家别墅。小休约一小时，蒋夫人到，谈了一些家常，然后在寓午餐。饭后，“夫人问我对她有什么



白天坐在廊道上读书，光线尚好，晚上只能油灯相伴。囚禁期间，读书是张学良一大爱好。他曾托人购买各种明史图书，在他的日记本中，也常保存有台北书店的广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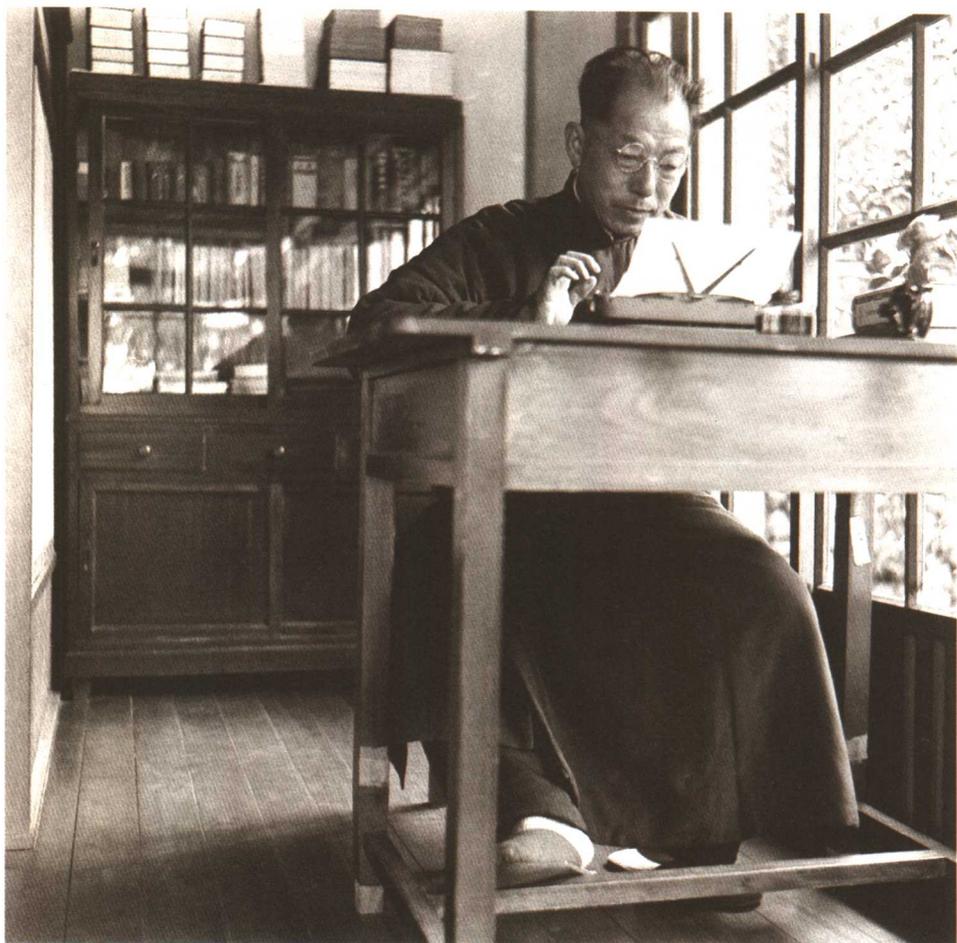
话说吗”，我答：“国家已到了这样天地，还有什么可说呢？我是无有可以帮助的了。只有两件事，想求一求夫人：1. 在私情上想望一望蒋先生；2. 请代家中索几个钱用。”宋美龄答应了，说“写给家中的信由她转”。

这是张学良与宋美龄自1937年浙江奉化一别，在台湾大溪，一次短暂匆匆的会面。一晃十余年过去了。1937年4月10日，宋美龄在奉化雪窦山妙高台招待张学良、于凤至午餐，在座的有宋子良、端纳、董显光，饭后大家一起打500



冬日的山中湿冷袭人，赵一荻裹着厚厚的冬衣，在阳光下编织来年的毛衣。

分。4月14日，宋美龄还单独请了张学良、于凤至吃饭。当时雪窦山的红杜鹃盛开，给张学良留下至深的印象，“北地人第一次看此景也”。花开花落，相见时难别亦难，1950年4月是张学良到台湾后第一次见到宋美龄。这一年，张学良50岁，宋美龄53岁，都到了“知天命”之年。当年被宋美龄称为“绅士”的张学良顶发已谢，而宋美龄风采依旧，两人相见，更多是无语相对，同为孤岛“沦落人”，“还有什么可说呢”？



“自己打字”。伊雅格送来了英文打字机，给友人及远在美国的儿女们写信，可以逐句敲打，“家书抵万金”，孩子们读到台湾的来信，一定很高兴的！

“两点半，夫人离去，余等返回，约晚九点半方到井上。”也就是说从井上温泉到大溪蒋家官邸，来回山路跑了近十个小时。疲惫与兴奋交织，在昏暗的油灯下，张学良记下了这难忘的一天。

在蒋夫人的关照下，张学良的山居生活多了几缕色彩。陆续收到家人的信件，伊雅格从美国寄来了钱款，送来了相机……

中秋时节，宋美龄托人送来月饼、茶叶、水果、杂志等。佳节思亲，读到于



宋美龄不时会托人送来各种杂志，这是“Edith（赵一荻）坐在桌前看 *TODAY'S WOMEN*（《今日妇女》）杂志。

凤至从美国的来信，以及子女闾瑛、闾玕、闾琳的信，作为父母，张学良、赵一荻自然倍感欣慰。儿女们在美国有于凤至照看着，让他们少了几许牵挂。“儿行千里母担忧”，更何况家人远在大洋彼岸，收信、复信成了张学良、赵一荻幽禁生活中最愉快的时光。

八

友人重逢 礼轻情重

老刘将去台北，把写好了的贺蒋夫人寿信及寿礼（高山布两匹）交老刘带去。

1951年3月4日

老刘由台北返，言明日我们去大溪，有一人要见我，系蒋夫人交办的，是谁，他不知道。

1951年4月21日

一月廿六日

蒋夫人手书一封，并年礼咸肉、粉、年糕、素
桂元、粽子、袜子三双，玩物两盒，什锦七种。

一月廿八日

复何、蒋夫人信。

二月八日

刘宝来妹信一件，并食品数种，复何，附相片
三张。

三月九日

致蒋夫人贺寿信，附礼二件（蒋溥诗卷，大册页）。

四月十一日

蒋夫人来信，言前玉因欠安，所以现在才复，又
言欲观石田、石涛作品。

四月廿三日

上蒋夫人一函，附去查士标画册一本。

五月一日

蒋夫人信，并附有手画一幅，什锦一束，听头两
打半。即复函。

五月廿一日

蒋夫人手书，并 James 的信和要我签名的文件数
种，立即签好原差带回，将军中教育一文附上。

六月廿一日

刘陪来眼大夫黄根桔配眼镜。

十月廿日

台北送来食品四色，不明何人所赠，后来询
明係蒋夫人送的。即复函，并问病（因
友人在美治病），汪毛局长持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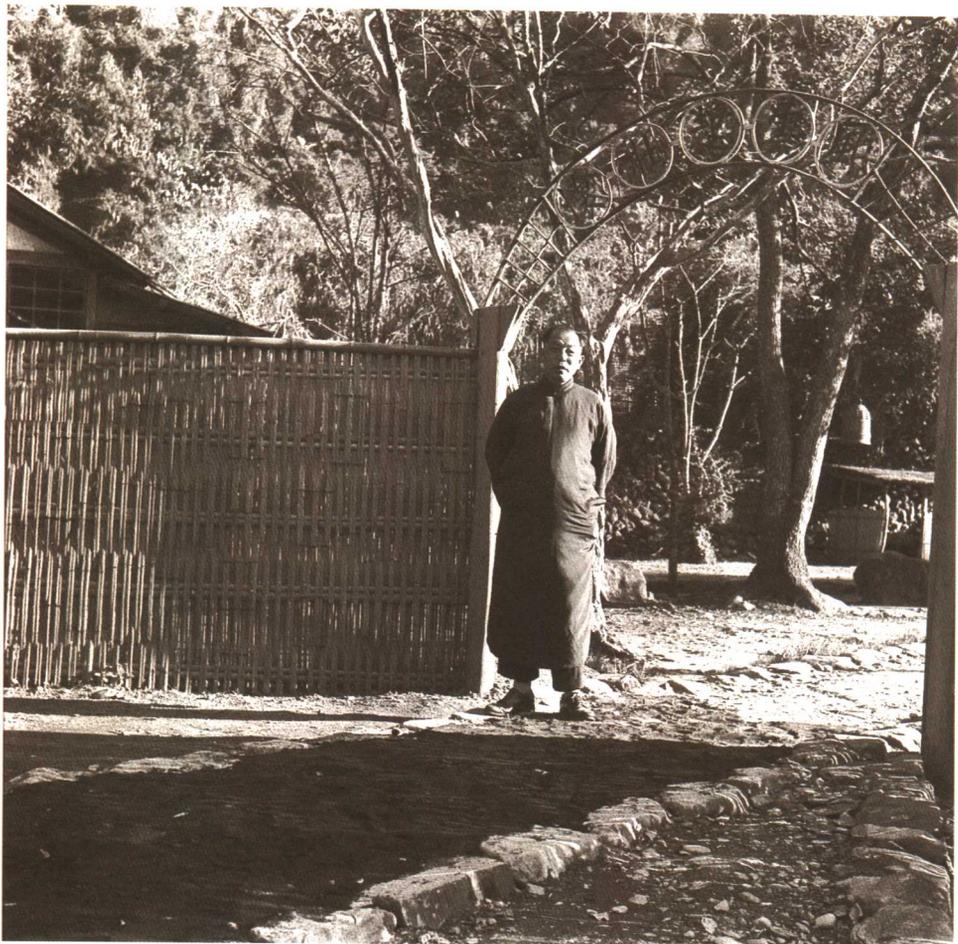
十月廿九日（旧历九月十五）

也许无奈地习惯了“山中的生活”，草木的荣枯也习以为常，新修的“清泉桥”便成为拍摄的背景。桥原本是抵达彼岸的通道，对于张学良来说，桥能让他散步的范围稍大些……



“山中清泉涌，人从桥上过”。台湾多山多温泉，山民出行多攀山路、走吊桥，为了方便出行，张学良、赵一荻迁此后，重修了清泉桥。图为“Edith（赵一荻）步行于清泉桥上”。





“自己站在院门篱旁”。院门外就是看守的住房。张学良在井上温泉的“自由”仅在院内，走出院外需要请示报告。

1951年4月21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直奔张学良屋内，说“蒋夫人安排，有一人要见你，明天一早去大溪”。张学良纳闷急问“见谁”，刘乙光摇摇头说：“是谁？我也不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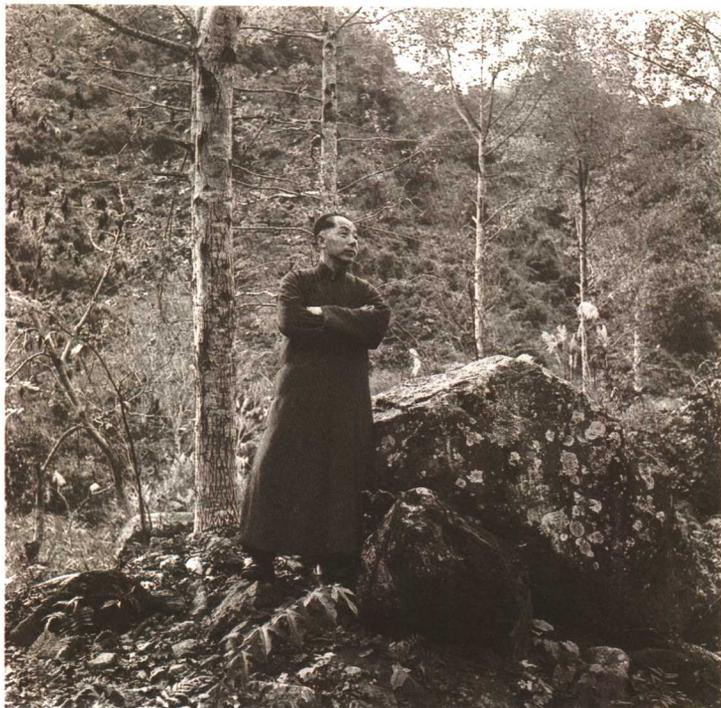
又起个大早，中午12点才到大溪，去蒋家别墅坐了一个小时。张学良一看，进来的人竟是伊雅格！张学良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展看伊雅格带来的宋美龄的信：“伊雅格来看你，我利用这个机会给你写几个字，我非常感谢你记得我的生日，你送给我当地（高山族）生产的布料，很可爱，我特别喜欢其亲和的颜色。”



“Edith（赵一荻）站在院门口”。一道竹篱幽禁了两个人的自由，夕阳西下，小木屋才是他们的天地。

宋美龄3月4日（旧历2月12日）生日时，张学良寄去了贺寿信，并从当地人手中购买了原始方式织染的布料作为寿礼送去。当时张学良听说宋美龄身体欠佳，也去函问候。宋美龄谈及自己“因不慎从楼梯跌下，在床上躺了三周……这样行走不便还会保持几个月……”在信的最后，有这么一句：“如果有其他需要的物品，请随时告诉我好吗？”

伊雅格的到来，真是出乎张学良的意外，他知道这是宋美龄专门为他安排的会见。故人相见，久别重逢，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的。伊雅格与张家三代人熟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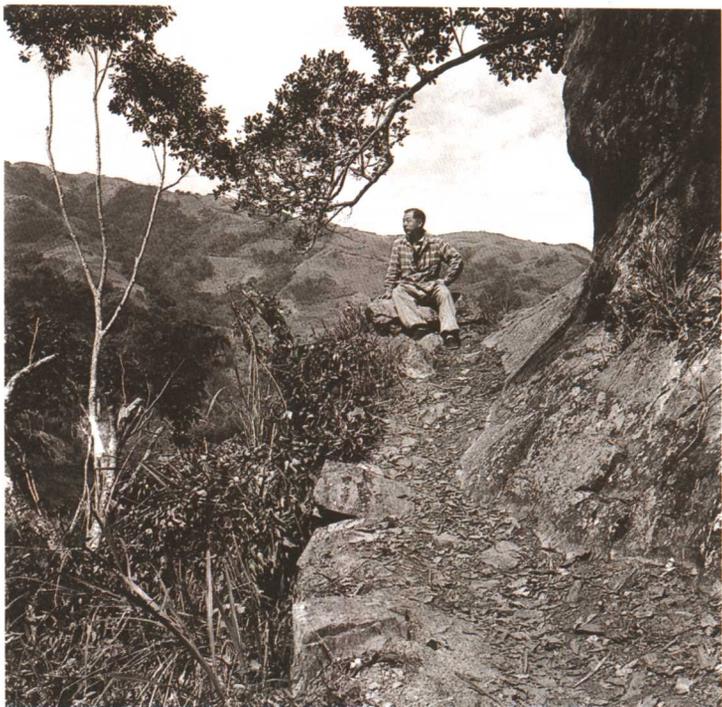


井上温泉的冬日,有时会滴水成冰。让张学良回想起东北的寒冷,不免思乡,转念一想,“大丈夫理应四海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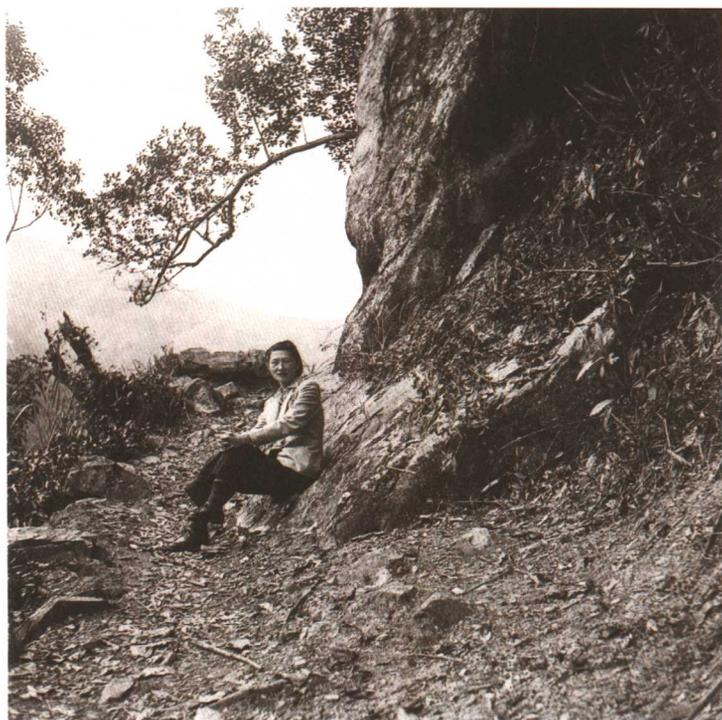


“Edith (赵一荻) 坐在警室旁树林”。表明他们跨出竹篱的一举一动都在警卫的视线中。

这是井上温泉后山的山道，爬山累了，坐下小憩，可以看到自己居住的环境。“外边的世界太精彩”，张学良喜欢爬山，幽禁的山坳阻挡着视线。每当登于山顶，举目远眺，会让他大呼“痛快”！



赵一荻在路旁树下。这条道，他们来过许多次，山路曲折，风景依旧，岁月无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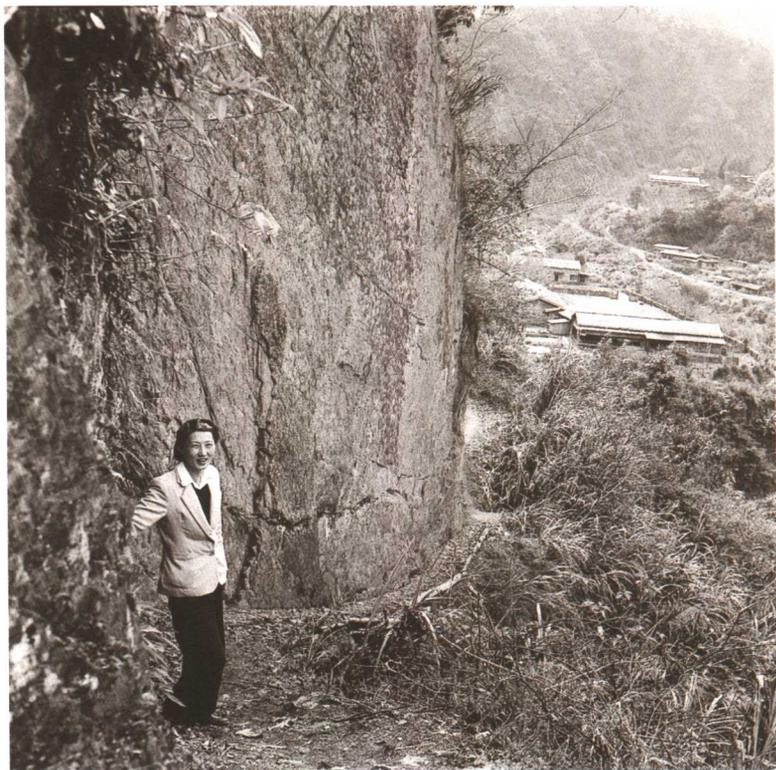


张学良背对着国民党的“党徽”、“党旗”，沉默无语，大山中的“青天白日”更透出一股彻骨的寒意。

是张学良年轻时的挚友，按张学良的话说是“可以引为终生的朋友”。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孩子闫琳，就是托伊雅格在美国安排一白人家庭科恩夫妇家中寄养的，当时科恩夫妇的儿子与闫琳同岁，这样有一小伙伴相陪。友情、亲情、往事如烟……两人谈到四点多才分手，伊雅格带来了几份银行文件让张学良签字，这些钱对张学良来说，真是千里送“重金”，患难之时，更显朋友之“赤子之心”。

天色已晚，夜行山路不安全，张学良只能留宿蒋家的卧榻旁，是否能够安然入睡？不得而知。4月23日早七点动身，下午一点，载着一车的各种礼物，张学良带着蒋夫人、宋子文的信及家信，也带着见到伊雅格的喜悦赶回井上温泉。他知道等在井上家中的赵一荻，一定有些着急了！

宋美龄之所以安排张学良与伊雅格会面，是希望通过伊雅格的渠道，让张学



“Edith (赵一荻) 站在石壁”。石壁下是张学良、赵一荻的住处，他们俩在大山中整整待了十余年。

良更多地了解在美国的家人情况。11月，伊雅格再次来台，带了一台英文打字机，请宋美龄转交。宋美龄在11月27日的信中写道：“从伊雅格告诉我消息，我很高兴一切都很顺利。”宋美龄讲述了“凤姐姐”及几个孩子的情况后，也谈到闾琳，“我不认为你需要担心他，我们应该知道少年男孩需要有一个时间的成长，来认识自己，何况他是聪慧的男孩”。

宋美龄以女性的细腻、优美的语言来讲述这一切。“你不知道，我是多么高兴能给你这么多伊雅格给我的好消息。”

收到这些礼物，在1951年岁末，张学良用英文打字机给“凤至及儿孙”复信，给伊雅格致信，并“上蒋夫人”谢信，将家信等附去请代转。在给家人的信中，寄去了张学良在井上温泉拍照并冲洗的40张照片。

九

互赠书画 回馈友情

蒋夫人来信，言前函因欠安，所以现在才复，又言欲观石田、石涛作品。

1952年4月21日

蒋夫人信并附有手画一幅，杂志一束，罐头两打半。即复函谢。

1952年5月1日

台北送来年礼四包，云系蒋夫人所送。

1953年2月12日

复家信附相片十二张，伊雅格信，孔庸之（孔祥熙）信，致蒋夫人一函，将上函附去请转。

1953年5月6日

二月十二日

台北送来年礼四色，云係蒋夫人所送。

二月十五日

复以蒋夫人函。

三月十二日

致蒋夫人贺寿笺，云毛局长代寄。

三月廿七日

蒋夫人返台，上表问候。

五月一日

蒋夫人来函，附来家信，James信及孔庸之等信，共23封，竹页外附衣物两大包。

五月六日

复家信附相片十二张，James信，孔庸之信，致蒋夫人一函，将以上函附去计封。

六月十四日

蒋夫人送来端午节赠五色，立即复函以。

九月廿一日

蒋夫人送来中秋节赠五色，即复函以。

十月卅一日

上蒋总统贺寿笺，由夫人转。

十二月廿四日

上蒋总统夫妇贺圣诞及年筵。

宋美龄到了台湾后，也许是不习惯台湾岛亚热带的气候与水土，身体一直不适。先是不小心摔了，背部受伤，隐隐疼了好长时间，接着感冒，又受到神经性皮炎的困扰，试用了各种药均不管用。她在1952年1月25日给张学良的信中抱怨：“医生说，最彻底的治疗，还是充分休息，放松心情，忘却烦忧——说得容易，但我如何能做到，——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困难时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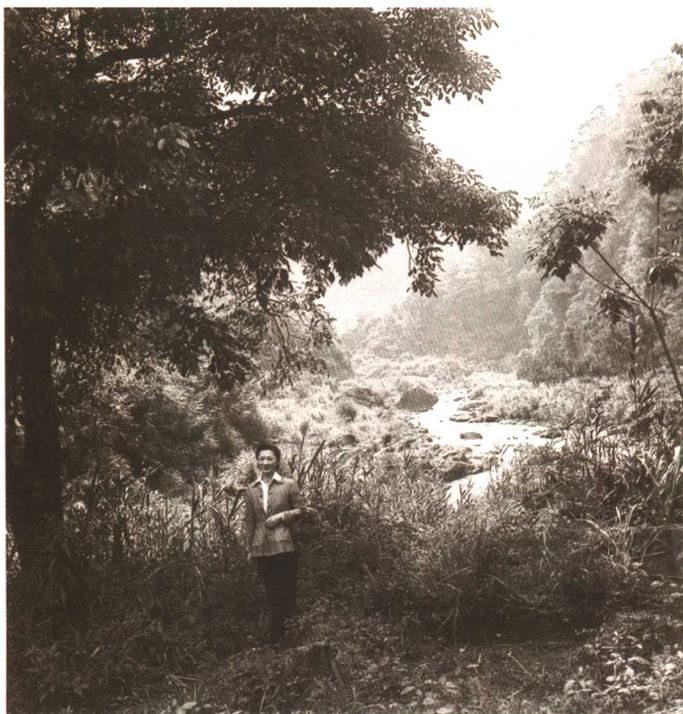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新春”礼物，“年糕是自制的，咸肉是我们自养的猪腌制的”，还送了拼图玩具，“希望你喜欢这些拼图，那会令人着迷的”。还有



张学良、赵一荻在山坡上的合影。刚理过发的张学良看似年轻许多，稀疏的头发已掩不住岁月的沧桑。身后是盛开的美人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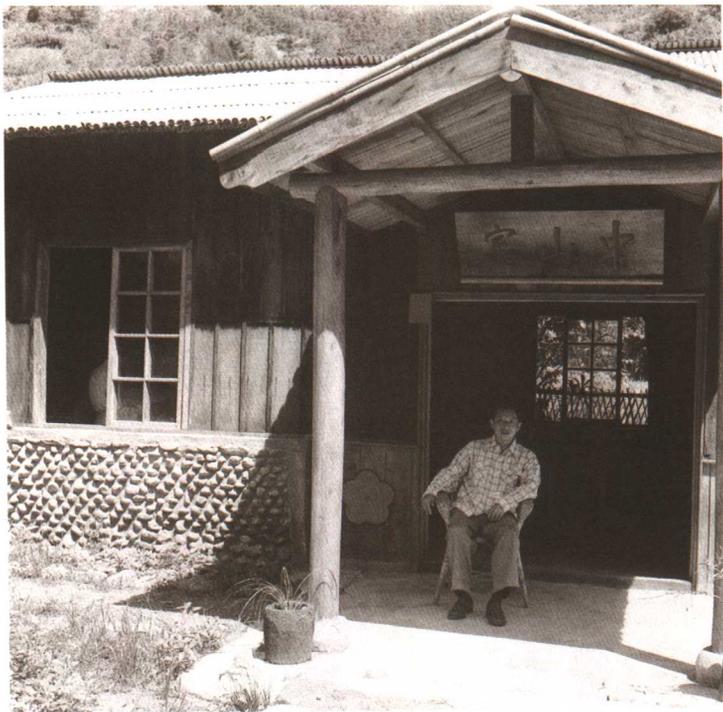


1953年3月，宋美龄从美国回来，5月托信差转来23封信，其中有来自美国的家信，让张学良、赵一荻倍感欣慰。



张学良心情好时，会与赵一荻一同去居住地附近转转。山间小溪，树木茂盛，景致极佳，唯不见人踪。这是1953年的赵一荻。

在井上温泉附近新建的“中山室”，成为大家在山中缅怀国父孙中山的场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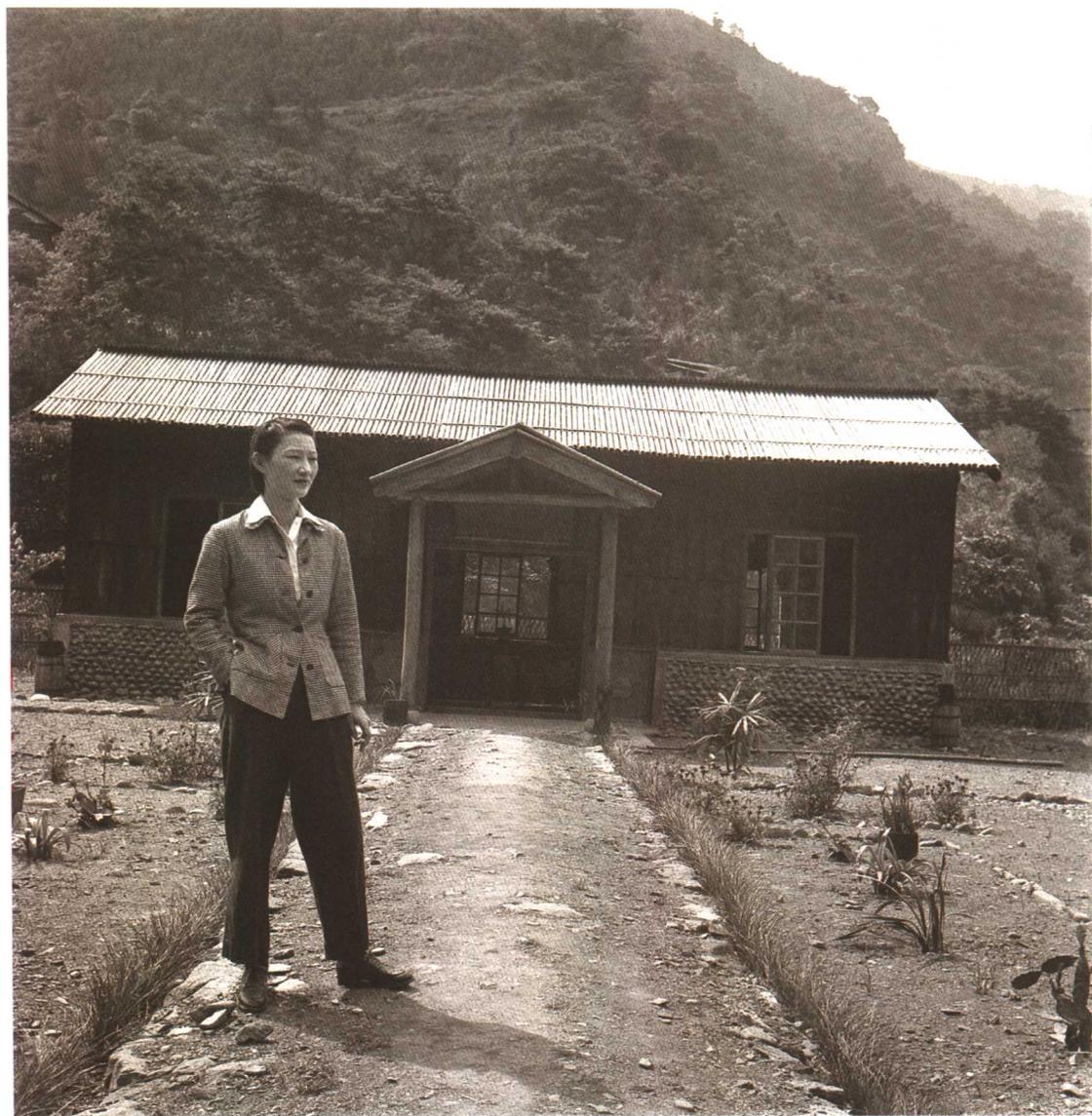
粉丝、枣、桂圆、粽子、袜子、杂志等。

张学良的身边没有什么好的礼物回赠，唯保存了一些过去收藏的古画及画册，他听说宋美龄喜欢画画，就送了“蒋溥年的画册”。

研习国画，成了宋美龄放松心情、修身养性的爱好，“据我的老师讲，我的画风及笔法近似石涛、沈石田，所以我一直在研究学习他们的画，但在台湾很难取得他们真迹来研习……”张学良收到信后，托人又送去了查士标画册。

5月的井上温泉，气候宜人，草木葱郁，而台北却炎热蒸人。这样的湿热环境，对于宋美龄来说，是非常不适应的，在收到张学良送来的画册时，她刚好完成一幅画，便题了款，请人送交张学良。这是一幅临摹石涛的画。

“我希望你会喜欢，请你包涵我的生涩笔法，到底我学习国画仅11个月，我的原则是不将我的画送人，同时我知道还有许多该学习的，而且目前离我自订的标准，还相差甚远，但我将此画送你留作纪念。一幅美龄初学的画，也许会引起你的兴趣。”



“Edith (赵一荻) 在中山室前”。新建的“中山室”不过是一简陋的木屋，四周的草木都刚栽下。在山中，无聊的生活，使赵一荻学会了抽烟，烟瘾日深，也伤及了她的健康。



宋美龄在1953年托人给张学良转来美国的家信，同时寄了两大包衣物。其中有四件夏威夷衬衫，并交代“这些衬衫是着于长裤外……希望你穿时感到凉爽”。沉思中的张学良，让思绪飞过高山大洋。



赵一荻上山采花，夕阳西下，“满载而归”，并留此“倩影”。

1952年的夏天刚过，宋美龄决定去美国看病。即便在美国，也不忘托人给张学良送去食品。张学良在10月20日忽然收到台北送来四包食品，“不明何人所赠，后来询明系蒋夫人送的，即复函谢并问病（因夫人在美治病），托毛局长转寄”。1953年2月12日，“台北送来年礼四包，云系蒋夫人所送”。

宋美龄在美国待了将近半年，1953年3月27日返回台湾。5月1日，信差送来了“蒋夫人来函，附来家信，伊雅格信及孔庸之（孔祥熙）等信，共23封，45页，外附衣物两大包”。

在美国期间，宋美龄见到张学良的女儿闾瑛及女婿，“他们都很好”。于凤至到旧金山的医院探视，被医生谢绝，“我未能见到她，我感谢她，也觉抱歉”。宋美龄还为张学良带了四件夏威夷衬衫，并在信中交代：“这些衬衫是着于长裤外的，而不是穿在长裤腰带内，我希望你穿时感到凉爽。”

宋美龄的画，在当年美国《生活》杂志艺术专栏上刊出，返回台湾后，立刻就将这张画的复制品送给张学良。张学良虽行伍出身，却喜爱收藏。年轻时常为买画一掷千金，有些古代名字画，是一直携带身边，不时翻出欣赏。品画、论画成为他与宋美龄这一时期必不可少的话题。后来，每逢宋美龄的生日时，张学良总会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古画或精心挑选的画册作为礼品答谢宋美龄。

如1954年3月14日“上蒋夫人贺寿笺，附王石谷画轴”。

1957年3月10日“上蒋夫人贺寿函，附钱东牡丹花立轴一幅”。

1958年3月30日“上蒋夫人贺寿函，附程孟阳小轴松石”。

……

1954年，备受“神经性皮炎”困扰的宋美龄再度赴美就医。10月23日返回台北后，25日立刻给张学良去了一封信：

我前两天刚回台北……在旧金山见到凤姐姐，她到医院来看我，次日我们一起吃晚饭……她能说英语，而且她看来比我十年前见她还要年轻十岁，我既惊讶又高兴，见她如此自立……她看起来很开心，而且心神非常宁静，但她非常想念你。

宋美龄谈到自己的病情时说：“没有比我过去几年皮肤痒所受的罪更难过的。”“经过多次检查之后，医生总算找出了我的病因，是对食物及空气的过敏……感谢上帝我终于好了！”

在信中，宋美龄想起3月份张学良送来的画轴：“我忘了是否已谢谢你送给我精美的画轴，作生日礼物，我当时身体不适，可能忘了及时感谢你，不过你要知道，我非常感谢你想到我，在我身体不适时，这幅画带给我欣慰。”

在美国，宋美龄还见到了伊雅格，帮张学良办理钱款事宜：“你很幸运有伊雅格这位忠实的朋友，他为你及你的家人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对你的忠诚与关怀。”



“自己在廊下看书”。已过“知天命”的张学良仍像一“小学生”，读书批注，定时休息，并列出作息表，克服自己的疏散缺点。简陋的“书屋”顶上悬挂着一串大蒜。

宋美龄给张学良送来了收音机。当时台湾竹东山区。除了山地居民原始耕作外，与外界多无联系，交通尚不通畅，更谈不上电及电话，晚上多靠油灯照明，国外友人或朋友送来的小电器，张戏称“多为废物”。宋美龄送来收音机时交代“我已装了电池，你打开就能收听……我希望它带给你乐趣”。

这是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唯一能使用的“家用电器”，也使他后来养成听收音机的习惯。张学良因油灯熬夜，几近失明，根本无法看清收音机上的波段，他在卧



宋美龄曾找来明史专家来井上温泉“伴读”，但待不长久，真正作为张学良的“伴读”者，应该说是赵一荻，始终陪伴着。

室摆放了好几台，请人分别固定好波段，这样他想听什么电台的节目一打开就可以了。通过收音机得以了解外界的变化，但刘乙光时时会“警告”张学良，不能收听“共匪之广播”。

早七点，毛局长来寓所探视，言对余身体问题深为挂怀，兹嘱黄所长负责详密检查，以便确明是何原因，小谈辞去。蒋夫人送来年礼四包。复函谢，并告安抵士林，体稍感衰弱，但精神安好。

1955年1月23日

下午来了两大夫，肠胃专家李医师承泌、营养专家田医生可高，为我检查。李医师说我是慢性胃炎和精神性肠病。田医师说我缺乏维他命B₂，应该食物合理化，因而谈到伙食问题。我则言此非余力能做得到，请向袁大夫讲，由他向黄所长讲。后来余同袁大夫谈到我们的伙食情况，事后，我觉为失言。黄所长送来炖鸡一只。

1955年2月3日

Edith（赵一荻）两天来又犯尿血并腰痛，今早同老刘商量去台北医治，由彼向台北商请。下午老刘来告，于伯材由台北电话云，已报告接洽妥当，定十五日来车接Edith（赵一荻）先住医务所。

1955年8月13日

老刘今午回来，我把写给Edith（赵一荻）的信交他转寄，告述（诉）她因连日大雨，山路崩坏，须（需）要廿天以后，方能通车，叫她安心镶牙罢。

1955年9月6日

一月廿五日

也刘亦来伊阙源寄给他的信一帛，并赠我垣经一册。余复钞古诗两首，并相厅两张。

一月卅一日

也刘由台北返，带来蒋夫人年赐五色。复画厅。

二月十八日

陈醇修当选为副总统候选人，余书一贺画，亦刘封政。

二月廿四日

也刘由台北返，言见过陈醇修，陈甚愧，并赠水果一筐并干两盒。伊阙源手书一帛复书则赠相厅。

三月十四日

上蒋夫人贺寿笺，附王石谷画一轴。

四月十二日

也刘由台北返，带来药水药厅等，作因余胃病，毛局长所赠者，即复画厅及谢忱。

六月三日

蒋夫人送来节礼七色。即复画厅。

九月八日

友芬送来中秋节赠四色。即复画厅。

九月十六日

也刘封来，莫柳地节礼（火腿、月饼、干菜、酒），即复画厅，亦刘，他言待机封交。

十月三日

也刘告述我，他将去草山受训。查问到他房向长谈，致张岳军一出，由他亲转。

在张学良的记忆中，1955年1月12日，是他到台湾以来所遇到的最冷的一天。

晨起，“满院小草上都是冰霜，温度为零下一度，桧山上积雪可望”，抬头望去“天朗气清，恰有北方气候的风味，不觉有思乡之感”。在寒冷、寂静的井上温泉，山顶的积雪，让张学良想起东北老家，少小离家，老大却不能归。转念一想，“大丈夫四海为家，何必恋于故土乎”？



张学良身上穿的衣服，似乎是赵一荻自己动手做的。可以看出“裁缝”的疏忽，下摆扣上则太紧，两口袋的下角不统一，加上没有熨烫，衣服皱巴巴的。“山中无裁缝”，能把布料变为衣服就不错了。反正“自我欣赏”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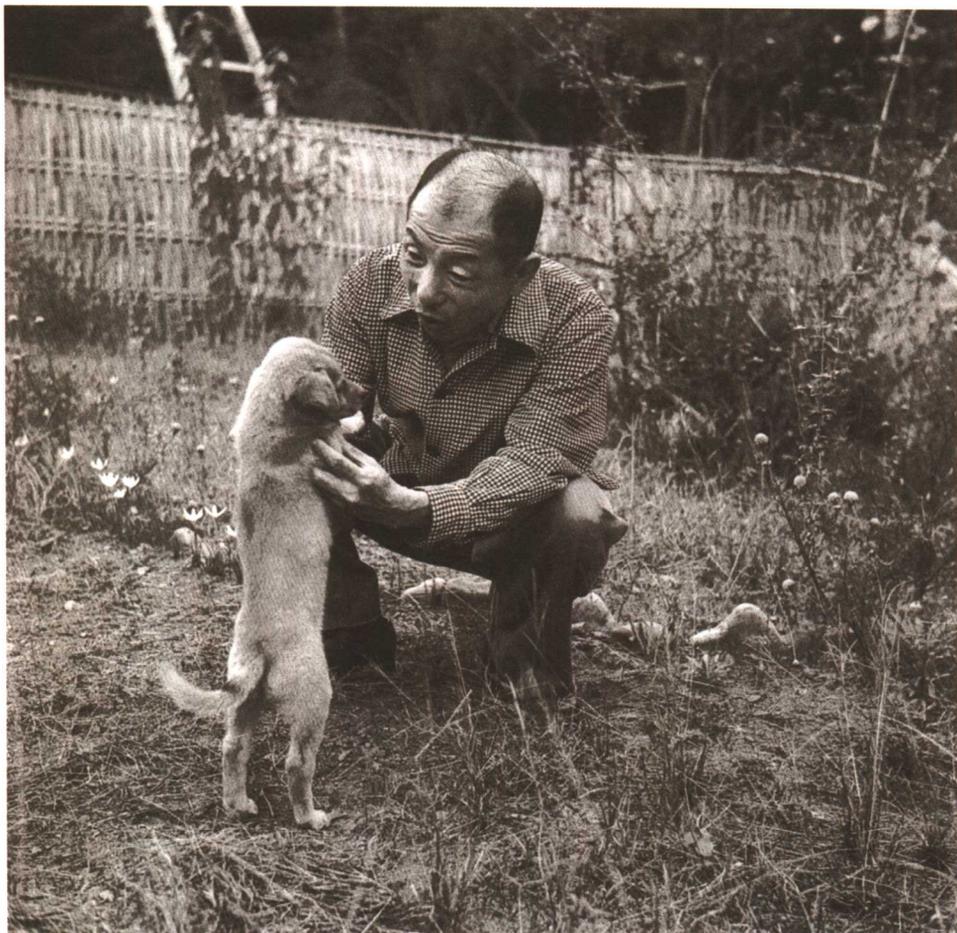
冬去春来，“人面桃花相映红”。赵一荻穿着自己织的毛衣，精美的图案则是勤学苦练得来的。可以看出50年代毛衣的风格及样式。

1955年的春节，毛人凤将张学良、赵一荻接到台北过节。

1月22日，带上换替的冬衣，下午一点动身下山，乘车到竹东。换了轿车，经过桃园奔台北市，六点到士林，住进“国防部”保密局的医院。

第二天，毛人凤来探视，希望张学良、赵一荻在这里待上一段，顺便检查一下两人的身体。并说留下汽车给他们备用，可以乘车四处看看。

刘乙光去年奉命到台北草山将官班接受培训，听说张学良、赵一荻来台北过



也许是孩子均不在身边，张学良对身边的小动物倾注了更多的关爱。宋美龄亦了解这一点，曾来信寄了几张小狗的照片，并言她养的狗生了一窝可爱的小狗，问“要不要送来几只作伴”。逗玩小狗站立，张学良的目光中流露出的更多是对小狗的关爱与呵护。

年，亦带着女儿携年礼来探视。希望明天在家中宴请张、赵，张学良辞谢了。

除夕之夜，台北市爆竹声声，不绝于耳，在寂静山中待惯了，这彻夜的喜庆爆竹声，让张学良无法成眠。在日记本上记下一首诗。

万姓不减故乡心，除夕来个爆竹声。

村佬入城眠不稳，梦中疑觉成金门。

当时，人民解放军炮轰金门，海峡两岸炮声隆隆，这爆竹声后，硝烟浓烈，



书架上的照片，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宝贝”张闾琳。自1940年送往美国，除了书信照片往来，孩子的成长、教育，一直让张学良、赵一荻牵挂。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

竟让张学良疑为身在金门，这大概是潜藏在张学良身上的军人性格吧。

毕竟年岁不饶人，长年的迁移囚禁、山居生活加之缺乏医药与基本保健，张学良与赵一荻的身心健康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害。医务所开假后，来了几位大夫，为他们做全面的检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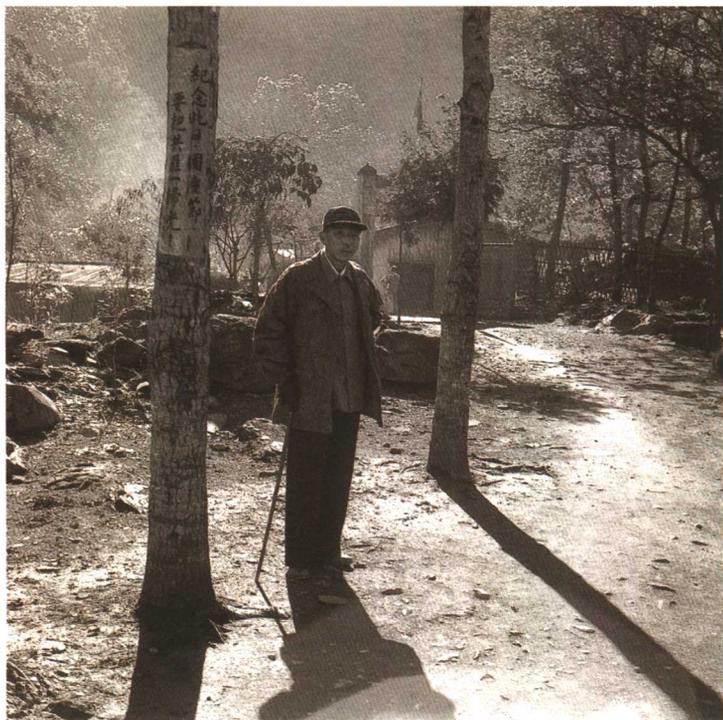
抽血、拍片、钡餐查胃……张学良的视力急剧下降，又有散光，要配两副眼镜，肩上有一肉瘤要割去。右耳听力几乎没有，需配助听器，胃肠检查发现患有



“自己在室内听收音机”。冬天室外冷，只能待在屋里。这台收音机当时在台湾算是“奢侈品”了，也是井上温泉张学良唯一可使用干电池的“家用电器”。宋美龄送收音机时，专门交代要配上几节电池。有了收音机，在大山中的张学良得以了解世界的变化。

慢性胃炎与肠炎，其余部分尚“无重大毛病”。

张学良检查完后，忽然想起跟着他们一同到台湾的吴妈。这位原本是清华的女校工，丈夫去世后独自拉扯两个孩子，经人介绍给了赵一荻。从那时起，吴妈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一直跟随张学良、赵一荻，从贵州、重庆到台北、新竹、井上，悉心照顾“少帅”与赵一荻，常年相伴在身边，一同度过了无数患难与共的时光。张学良急忙通知井上，把吴妈接来台北，趁此机会也检查一下身体。





井上温泉的周围，有散居的台湾原住民（即高山族），他们与外界很少往来，以原始农耕维持生计。张学良、赵一荻在井上温泉住了十余年，了解原住民的困难，张学良曾于1951年5月就改善高山族同胞的现状上书宋美龄。这是1954年赵一荻与高山族妇女孩子的合影。高山族妇女小孩皆赤脚，冬日靠土布裹外以御寒。刘乙光的女儿（左一）的衣着与之形成鲜明的对比。

“Edith（赵一荻）穿方格大衣于门口”。赵一荻这身打扮，似乎给人感觉是出门访友归来，实际上，只是为了照相不时换上新衣服或手袋，摆摆样子而已。在大山之中，这样着“正装”，唯一欣赏的人是张学良。（左上图）

1954年11月摄于井上温泉。背景是驻井上的国民党看守人员住所（即派出所）。这一年，张学良受胃肠疾病的折磨，神情疲惫。初冬时节，大衣裹身。树上看守人员贴的庆祝“双十节”的标语依旧醒目。山中夕阳，老者沉思……张学良在照片上题“自己穿短大衣，持手杖立于林间”。（左下图）

张学良配了两副眼镜，拔了两颗大牙，割去了肩上的肉瘤。吴妈也补了牙，并配了眼镜。赵一荻原本就一口假牙，经检查磨损严重，需重新配一副。并因痔疮需动手术，遂化名“曹一帆”住进第一总医院（也就是后来的荣民医院），由吴妈相伴着。

在台北，正逢宋美龄的生日（农历2月12日），张学良与赵一荻买了一篮白色康乃馨交人送至官邸。乘此机会，大家还一同去了淡水。乘车到了位于淡水河、基隆河之间的福安里洲游玩。在1955年2月27日游玩归来后，张学良这一天的日记中悄悄记下了两个地址，其一是五弟张学森一家在台北的地址——中仑光复路58巷34号，其二是张学森一家曾经住过的地址。张学良已知晓亲友兄弟就在台北，但未经允许仍不得相见。

原定3月13日返回井上，因毛人凤挽留又多住了一天。赵一荻因喉部还需动手术，便留在台北。14日下午四点，张学良独自返回井上温泉，这是张学良与赵一荻到台湾后第一次分居两地，彼此间只能靠书信来往，张学良将赵一荻的来信一一标上序号。两人之间，原本朝夕相处，一旦分开，书信便成了相互牵挂思念的红线。4月26日，赵一荻手术痊愈与吴妈一同返回。

为了避免旅途劳顿之苦，有些小病痛，张学良与赵一荻一般就到新竹医院就诊，这样早上下山，晚上就可以回到井上温泉。

6月23日中午，突然接到新竹医院的电话，说赵一荻与吴妈去新竹医院途中，解手时发现尿中有血，到医院经医生检查要求住院。刘乙光问张学良：“怎么办？”“那就住院吧！”随后赵一荻送回纸条要东西，张学良只能将东西送去并在家等消息。6月25日，张学良要了车急忙赶到新竹医院，听医生介绍，初诊为“膀胱结石”，还要进一步检查。“送不送去台北治疗？”刘乙光先去台北请示“上峰”。但张学良的原则是“非不得已，原则不去台北”。

几天的住院检查，虽未查出病因，赵一荻烧退了，尿血没了，刘乙光从台北来电告之上边的意思，赵一荻“可到台北中心诊所，恐时间太长，有误事”。张学良让熊仲青电告“病已大见好，虽然不能察（查）出毛病，但无须乎去台北”。

6月30日，张学良又赶到新竹医院，为赵一荻办了出院手续，一路颠簸，四点钟回到家。



赵一荻与高山族妇人合影。张学良、赵一荻自1946年迁移井上，幽禁之处是不允许外人靠近的。到1954年，已稍有缓和。张学良曾将高山族妇人织的土布作为送给宋美龄的生日礼物。宋美龄在回信中说：“我特别喜欢其亲和的颜色。”

可是到了8月中旬，赵一荻又出现连续尿血，并伴有腰疼。这次，张学良不敢怠慢，请刘乙光赶紧联系台北诊所，准备住院就医。赵一荻行前，张学良帮忙收拾东西，还致函毛人凤，并送去四只自己养的土鸡，“谢其对Edith（赵一荻）病的关怀注意”。

原定8月15日九点出发，早起，赵一荻忽觉四肢冰冷并颤抖，一查体温，烧



抗战胜利后“军统”撤销，成立国防部保密局，毛人凤（前左）从办公室主任升至保密局局长，并负责“管束”张学良。1954年10月，毛人凤到井上温泉探视张学良。刘乙光（后左）已接到去草山将官班培训的命令。

至39.5℃。经过吃药、打针，才勉强上路了。张学良心中牵挂不下，一路电话询问，直到赵一荻安抵台北士林才放下心来。

空旷的井上温泉，张学良除了安排好自己的起居，收拾花园菜园，每天在日记中记下赵一荻的情况。

“8月19日，老刘由台北返回，带来Edith（赵一荻）的信……知Edith（赵

一荻)已入中心诊所,病是膀胱炎或者肾盂炎,仍在检查中,病况已大见好……”

“8月27日,Edith(赵一荻)来了三封信,告诉我她的病况等。”

“8月30日,老刘交来Edith(赵一荻)第七号的信,报告她的病况,说大概明(31日)日可以出院,先回士林医牙。”

“9月5日……交来Edith(赵一荻)信两封……说她3日才出院,在医务所镶牙得用十几天功(工)夫。”

9月上旬的连续几场大雨,使井上温泉通往竹东的路,出现大面积滑坡,造成山路崩坏,交通阻绝,据说要二十余天后才能修好通车,张学良只好去信赵一荻“叫她安心镶牙罢”。

这真是坐守愁“城”,加之温热相袭,胃肠失调泻肚,张学良身心俱疲,独自闷坐看词书。累了,仰卧躺椅上,口占歌一曲:“行年五十五,不愿再度臣仆,富贵荣华如浮云,但愿苍生脱苦。”夕阳西下,已是黄昏独自愁,一声叹息,苦海何时是尽头呢?

台北、井上依旧“两地书”,公路仍未通,快到中秋节了,宋美龄送来的节礼,只能搁在竹东镇。中秋之夜,井上观月,风清月朗,张学良与看守们炒了几样菜,一同度过这个难忘的夜晚。心中充满了惆怅,喝了一杯酒就回屋继续给赵一荻写信,这封信断断续续写了三天……

10月15日,历经两个月的分别,赵一荻回家了。看到“女主人”平安归来,张学良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患病期间,赵一荻托人带回的信共有27封。

井上温泉因“女主人”的归来,又恢复了往日的作息规律与几许久别重逢的“热闹”。

宋美龄一直关注着张学良、赵一荻的情况。3月份,她收到张学良的信并回信说,“我很高兴得知你的体检报告一切都好。”但从现存的图片资料看,张学良已呈老态,目光无神,总是一副病恹恹的神态。由于井上温泉远离城镇,蔬菜、肉类采购困难,经常吃不着肉,还要靠自己种点青菜、养些鸡鸭才得以维持,严重的营养不良使身体的素质下降。这几年张学良的听力、视力大为减退,读书兴趣也大减。心中积存有太多想说的话,环顾四周,无人可聊,只能逗玩小猫,或看着鸡雏长大,让时间如山涧清澈的溪水静静流逝。

早晨祭了忠魂碑，以偿心愿也。大禹子明、李唐兴在中山室结婚，各送100元。余同咪咪（赵一荻）二人，对吃喜酒，别有风味，不可不记。

1956年1月1日

昨夜十点多了，老刘来说，友芳来了。在竹东，因为侯楨祥下午去官邸，夫人告述（诉）他，现在有使人去美国，叫他关照我，可以带信。老刘希望我有信明早能够送出，友芳可以即日返回，当天可以呈上。我早六点半就起来，八点一刻把信写完了，只写给凤至一封长信，附去相片十七张，并叫她买维克咳嗽糖，还有一本书《每日生活在古代》。并叫她谢蒋夫人对我们之关切。

1956年8月23日

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请尽在今日送到。

1956年12月6日

Date Novemb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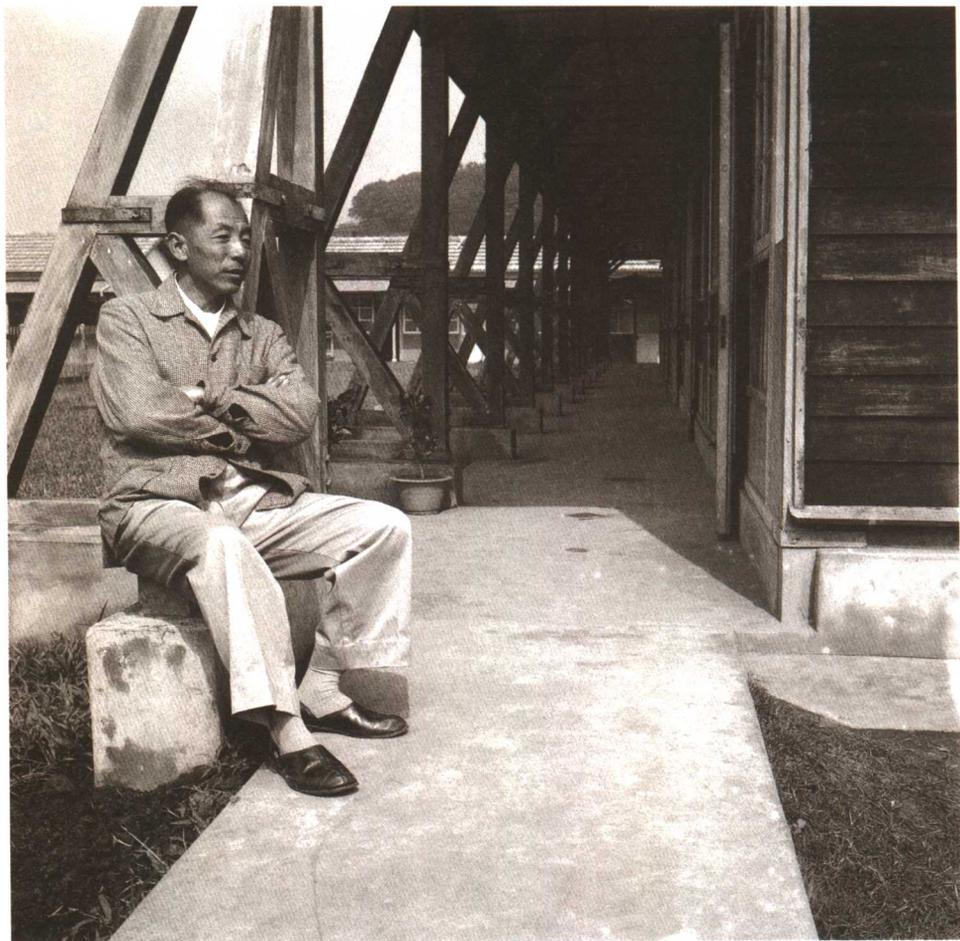


七刘由台北返，晚飯散步后，特来余書房告我说：蒋总统曾于十三日单独召见他，面告他二事，不准收听中共的廣播，不许我向華僑人員接近。並問及我讀書、身体等事，又詢及我之年齡，並囑着蒋經國寫的一本什末書（書尚未到）。余夜中反覆思惟，深自反省，當痛下一番功夫，方不愧对斯人也。

Date November



早飯后，到七刘室中，彼有事，畢彼来余書房。兩人又再詳談，問訊明白，余决心作一番自勵功夫，不要欺人欺己，作一个顶天立地大丈夫，亟裡求生，改头換面，作一番復活功夫！主要的在（行）在（恒）。今天是十一月十日，由此起！永誓勿忘。



1955年，接毛人凤通知，张学良、赵一荻可到台北过年，顺便检查一下身体。张学良、赵一荻1月22日下山，住进台北士林保密局医务所。

不论在井上或外出游玩，张学良手中的相机镜头常常是对准赵一荻。在屋里拍照时，他会让赵一荻不停地变化角度或变换服装。外出游玩时，赵一荻身边总有诸多的看守人员，与赵一荻合影的，有吴妈，这位忠心耿耿的“亲人”，但更多的是与刘乙光的夫人、孩子。张学良、赵一荻在井上温泉是看着刘乙光的子女长大的。有趣的是，刘乙光夫妇从湖南——贵州——台湾一路走来，共生有七个儿女，而张学良与赵一荻仅生有的闫琳，于1940年送往美国后，就再没有生育。



偌大的医务所，只剩下张学良与赵一荻。春节前，医务所的大夫也放假了，空荡荡的廊道……

1955年的张学良。图片中的张学良一副老态，目光无神，身心疲惫，步履蹒跚。长期的山中幽禁，肠炎及营养不良，严重损害了张学良的健康，视力、听力均出现了问题。（右上图）

水塘边的赵一荻，一袭旗袍，娴静沉稳，气质优雅，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唯有高山溪水见证。（右下图）





从静静的大山到台北过年，除夕夜，不绝于耳的爆竹声让张学良无法入眠，谄诗云：“万姓不减故乡心，除夕来个爆竹声。村佬入城眠不稳，梦中疑觉成金门。”

刘乙光一家约在1954年搬到台北(?)，张学良、赵一荻每到台北，刘乙光及夫人总会过来坐坐聊天，或大家一起吃个饭。井上温泉由于伯材、熊仲青队副等人负责，但一切事情仍是刘乙光做主。刘乙光经常往返于井上与台北。

有宋美龄的时时关照，刘乙光有时在“张副司令”面前像是少将“勤务兵”，充当信使或安排出游、解决出现的问题，闲来无事也陪“副司令”聊天解闷。但刘乙光执行蒋介石的“管束”命令时，又会以职业看守的面孔出现，要求“副司令”必须这么做，去完成“上峰”的指令。

刘乙光知晓张学良是“通天人物”，这几年，经济状况稍好，他也会拿“家事”来“烦”张学良。1956年5月23日，刘乙光收到儿子的来信，准备去美国留学，家中缺钱，要父亲想办法。刘乙光拿着信找张学良商量，说他想给“总统”写信，请求支助3400美金，希望张学良提点意见。张学良提醒说，“为人得要忠，我尽我的心”。“3400美金，虽然在上峰不算多，但是要为‘总统’处境想，部下太多……如你的请求不准，其他人为你帮忙，就有点为难了。”实际上，张学良已准备资助两万，刘乙光婉谢了，希望张学良借他两万存单做出国抵押。9月，刘乙光孩子出国前，应刘之托，还给美国友人写了介绍函。尽管他不喜欢刘的为人，但为孩子的前途，还是伸出援手。可在张学良的日记中，似乎找不到刘乙光表示过一丝心存感激的字句。

1956年12月是西安事变20周年，蒋介石似乎又想起张学良了，接连召见刘乙光。

11月15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专门到张学良屋内，表情冷漠。“蒋总统曾于13日单独召见他，面告二事：不准我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我同警卫人员接近。”11月17日，刘乙光又连夜赶回台北，仍是蒋介石召见。刘乙光20日回到井上，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一篇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事实。再三嘱咐要真实写来，并说此为历史上一重大事件”。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20年了！蒋介石仍没有忘掉这件事。而张学良“已数年从不再忆这个问题”。这天晚上，张学良躺在床上，“前思后想，反覆（复）追思”，“真不知由何下笔”，一夜未能睡好。

既然是奉命之作，张学良决定“不计个人利害，详述前因后果”。除了写家信，张学良很少写“大作”，为了完成此“重任”，整整埋头写了十天。初稿是给刘乙光看，刘乙光看后说蒋先生要求“写至离陕时为止”，但他“认为缺乏事变后详细述说”，建议加上这一段。张学良回答“关于那时之事总统知之详矣”。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余实不忍再回忆录写。如‘总统’指示，余当详为述写单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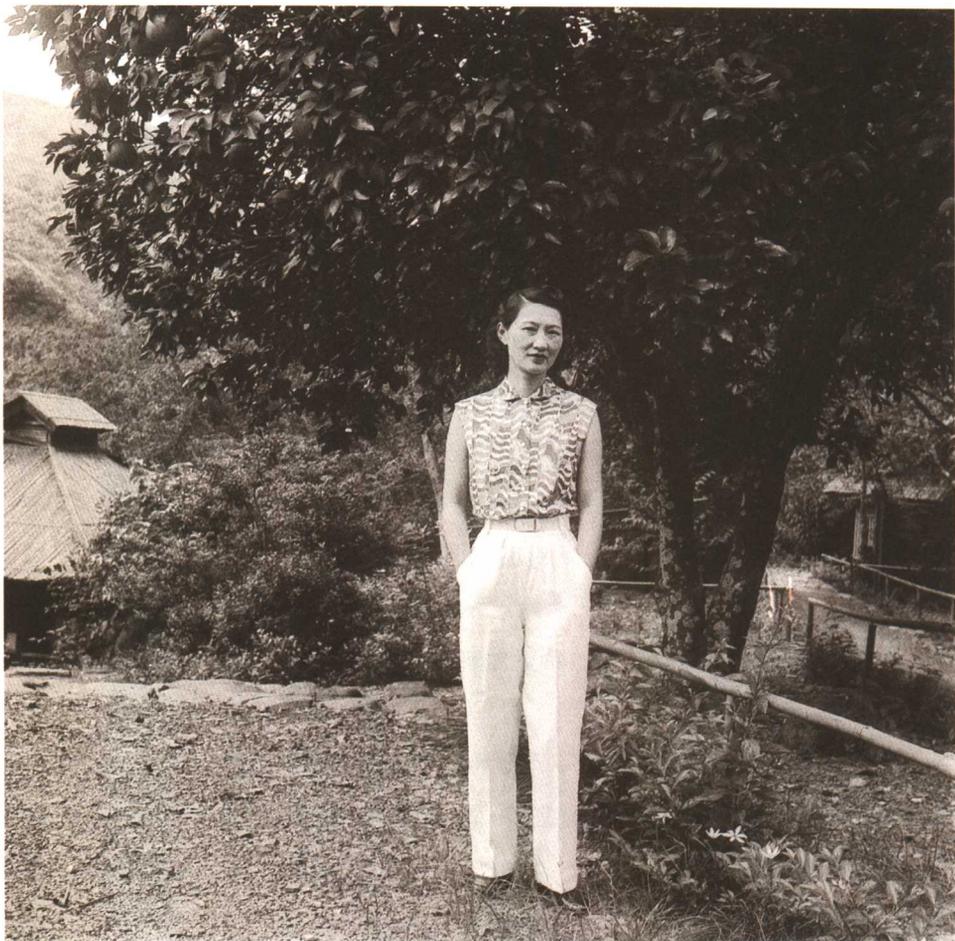
12月5日晚，张学良连夜修改抄写初稿，12月6日“将上蒋总统之回忆书，连日夜缮就，今午交熊仲青给老刘送至台北……”



张学良在台北期间，配了两副眼镜，拔了两颗大牙，割去肩上肉瘤。他也知道五弟张学森一家就在台北，他在日记中写了两个地址。虽近在咫尺，却不得相见。

这是一篇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作为西安事变当事人必须完成的“命题作文”，尽管张学良曾“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回想”。但身在囚笼之中，又不得不写。

刘乙光带着张学良的回忆文章去了台北，没想到，蒋介石不在台北，只见到了蒋经国。蒋经国交代要将“西安事变”一段续上，所以刘又将原件带回让张学良补充。“余真不知如何下笔，不能不写真实，又不能不为长者讳。夜中未得好



1955年春，赵一荻因咽部动手术，化名“曹一枫”住院治疗，于4月26日返回井上温泉。而张学良早在3月13日就返回井上了。这是他们第一次短暂“分居”。

睡，再四思量，已得写法，真而可讳也。”这是当时张学良无奈和烦恼心情的真实写照！

12月17日刘乙光接到蒋经国通知，要他第二天到台北，便催张学良赶快“将信件写好交他，他明早五点即去台北”。

12月20日，刘乙光从台北返回，说信件已呈“蒋总统”留阅。同时又带回另一篇蒋介石的“命题作文”，说今天早上“蒋总统”把他召去，“交他一件郭增

恺所写的西安事变感言，嘱我（张学良）针对着他驳之，加入回忆文中”。刘乙光还转告了“总统”对张学良的“表扬”，说张学良：“对共产党已有进步，我（总统）甚安慰，他（张学良）将来对革命还可以有贡献。这篇东西（指郭文）对我们俩都有关系，必须有所辟明以示后人。”

“总统”的“表扬”，张学良却高兴不起来，一封信被一再地要求修改。张学良在日记中写道：“郭为何人，余已忘记，要把他插入，甚难写，弄的（得）不三不四。”刘乙光坚持要张学良增改信件并坐等着，张学良只好“修改两小段，另写一张（封）信和一驳文”。刘乙光第二天将信送去台北，24日回到井上温泉。晚饭后，刘乙光来到张学良屋里，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礼物”，一是《解决共产主义思想与方法的根本问题》；二是民国46年日记本。刘乙光还传达了“总统”两句重要的话：“共产党必败”，“对反共抗俄余有贡献处”。

这封上书蒋介石的信，按“上峰”意见几番修改，终于交至蒋介石手中。张学良借此机会，与刘乙光商量，希望他转告“总统”，给自己一个参加“国民党将官班培训”的机会。

刘乙光12月26日去台北，27日返回。说到台北当天晚上九点“总统”即召见。“问他有什么事，彼即将信呈阅，又说出愿受训事，‘总统’立刻应允说好的，刘追问一句何时乎？‘总统’则答，容须布置布置。”刘乙光听了满心欢喜离去。计划27日早上返回井上。

可是27日一早，尚未起床，即接到“总统”召见。十点半到蒋介石官邸，“总统”言，受训事，因恐外间之人有些不谅解，贸然从事，万一引起误会，甚或引起风潮，或有人对我侮辱，反而坏事，须先有步趋。叫我先写一本书，把我的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的观感，对外发表。变换外间观感，然后方可进行”。

张学良是领教过蒋介石的出尔反尔的，原想借“受训”之机离开井上温泉，这一个月的“文字”之苦刚解脱，又“令我写书”。“心中十分难过，一夜未能成眠。”

写书对于军人出身的张学良来说，真是“赶鸭子上架”，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折磨，焦虑、烦躁、怨气，终于使张学良脾气爆发，28日一早“蠢性又发，在老刘处，大发牢骚。回来胡写信……”见张学良情绪失控，赵一荻只能婉言相劝，



1955年6月，赵一荻出现了尿血、腰疼，送新竹医院诊断为“膀胱结石”。到8月，又犯病，急送台北就医。此后，张学良一人待在井上温泉，靠“两地书”互相慰藉，历经了两个月的分别。

刘乙光见状不好也急忙苦苦劝说，这才使张学良慢慢平静下来。

平静下来的张学良，在1956年岁末，写下这么一句诗：“昨夜一阵潇潇雨，狂风吹去满天云。”

帮助 Edith (赵一荻) 做年菜, 又看她们糊窗户, 一天就这样白白过去了。夜间想来这是不应该的, “一日闲过可惜”! 余当勉之, 余之最大毛病, 沉不下心, 缺乏经常的“经”字。我写述的东西, 已经耽误了两天, 不要自己放假把(吧)!

1957年1月27日

老刘下午六时许由台北归来。饭后谈彼于五日下午五点总统召见, 言所写的《杂感》有价值、有贡献, 因为乃系历史重要文件, 叫我亲笔写一份。又郑重说, 如不到台湾, 无此文, 言外感慨! 又说前日我上之函, 加以编整, 令我亲笔抄写, 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

1957年5月10日

老刘下午返回, 彼云《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已交给蒋经国, 仅云放在那里, 未说下文。包医生复函云: 肺部如常, 头晕可能是眼睛看东西距离太近或过累的关系, 偶尔吐一点血, 如不再有, 恐系鼻后腔小出血, 无关系。

1957年8月26日

早起散步, 同老刘谈搬家等事, 决定将老杜留清泉, 看照东西。我告他, 我决心守儒家, 研读儒家。

1957年10月16日

早四点半起床。七点欠五分由清泉动身出发, 到了竹东附近改乘轿车, 九点欠五分过新竹。十一点许过大甲, 停了一停, 买了点水果, 我买了几本什(杂)志。即走, 十一时四十五分过西螺大桥, 照了好些相片, 一点四十五到了嘉义, 在铁道餐厅吃了饭, 二点四十五由嘉义动身, 六时许抵高雄。

1957年10月24日

早四点半起床。七
九点欠五分由汴梁动身出发，到
了竹东附近改乘轿车，九点欠五分过新竹。十一
点过太甲，停了一停，买了点水果，买了几本什锦，即
走，十一点四十分，过西耀大桥，照了好些相片，
一点四十分到了嘉义，在铁道旁吃了饭，二点
四十分由嘉义动身，六点半抵高雄。

寓于西子湾，房屋宽阔环境幽美，为廿七年来
最舒适的处所，只修过一次，共去廿伍万，当以
时光，我今日的身份，思来反感不爽。德统的厚，余
又不愿矫情，惟有自虐自勉，期不负见人家之慷慨，
忙了一天，亲自教习课书，分类古书稿等。



张学良独自在寓所外散步时，总会想起宋美龄劝他要“仰头振作”。尽管有那么多的“磨难”，东北汉子的血性与豁达支撑着张学良一路走来。

在张学良的桌上，摆放着一本深蓝色的日记本。这是去年刘乙光从台北带回，说是蒋“总统”亲手交来的。蒋先生如何知道自己有记日记的习惯？为何送日记本？是否将来日记也要送阅？总之，从1957年始，在同一年，张学良的日记出现了两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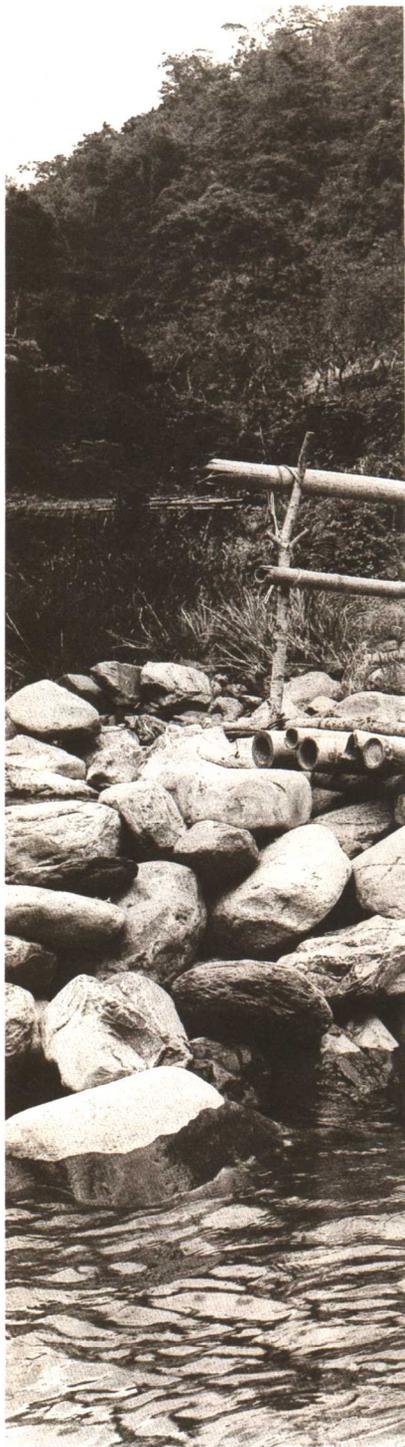
张学良在蒋送来的日记本的首页上写道：“蒋总统亲手交与刘乙光转来者，毅庵谨志，45（1956）年12月24日于清泉。奉命写一本《杂忆随感漫录》送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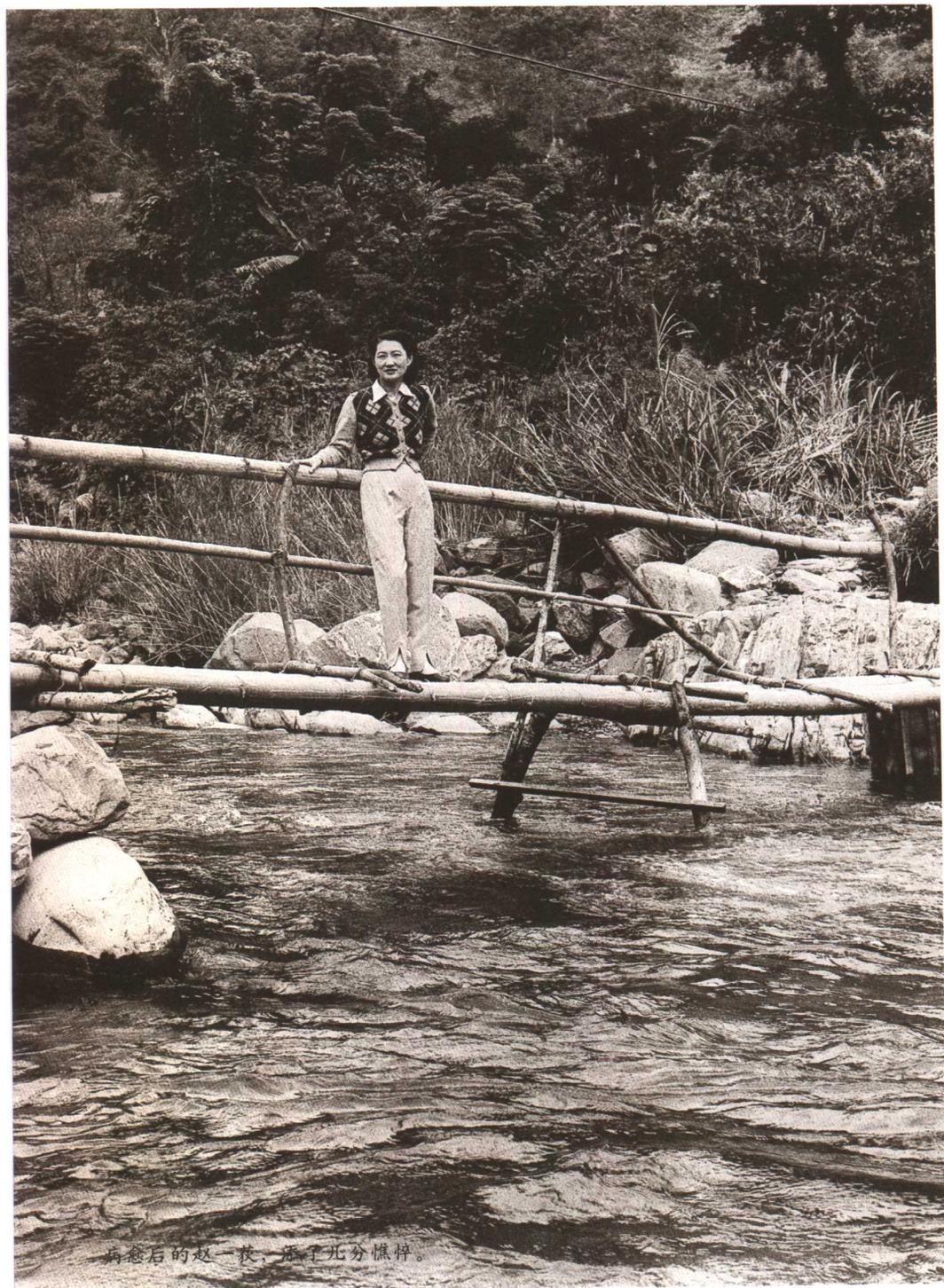
阅。”按张学良以往的习惯，有事则记，无事就跳过去。而1957年的这本日记则每天皆录，“感言”甚多，有读报后的感想；有读王阳明书的体会；有些“感言”似乎是自勉，又似乎准备给别人看的……这本日记还出现更多的是“无事可记”。

要完成蒋先生交代的“任务”，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张学良决定“专心写那一本小册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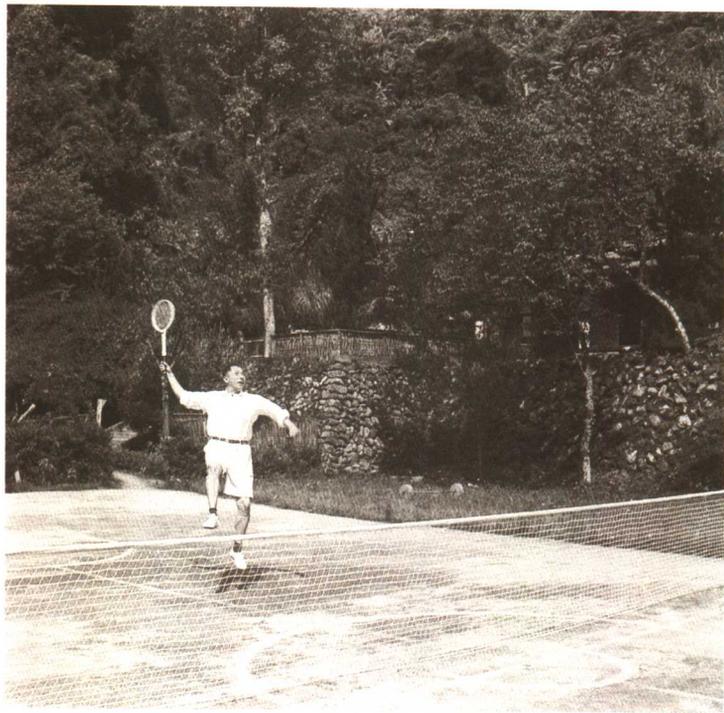
往事不堪回首，“查阅一些零碎文字，以为我的写作参考，使我十分伤感，真是不愿想这些过去的事”。张学良以每天两三千字的速度写作，写着写着，有时就感慨万千：“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尤其是关于他老人家的死难经过，现在大仇已报，就是我孝道不全耳，心有愧焉！”1月9日：“‘我的父亲和我的家世’一章，初稿已写完，约八千字。”1月19日：“‘少年时代’已经写完未缮。这个星期一定要把其次一章写完，如能写两章更妙。”为了加快进度，旧历新年都过不踏实：“这个月的预期工作，未能如意完成，又循过年，荒废时光，心中总觉不大自在……须竭力写述，期将早日完成为是。”有时写着写着，“写到我父子情深，以及张辅忱对我之提携，不觉泪下，念当年年幼无知，今日报图无由矣”！想到自己到台湾都十年了，沉浸往事，故乡入梦……“客舍台湾已十霜，忧心日夜忆辽阳。何当共渡桑田水，痛饮黄龙践故乡。”豪情未减，英雄老去，春秋家国梦。

1957年4月12日，“蒋总统所命写述之件，已脱稿缮就，命名为《杂忆随感漫录》，装订完竣。”这份自述的“杂忆”，张学良写了整整四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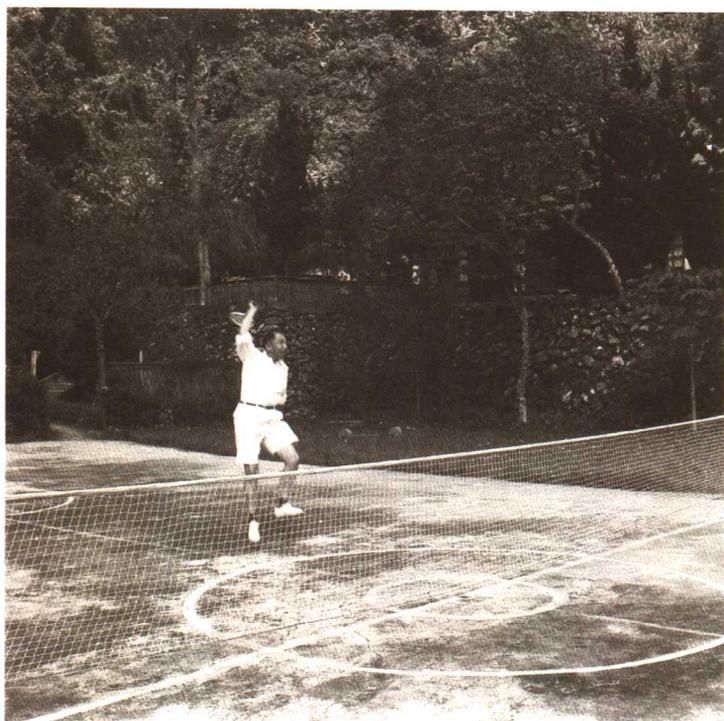




病愈后的赵一荻，添了几分憔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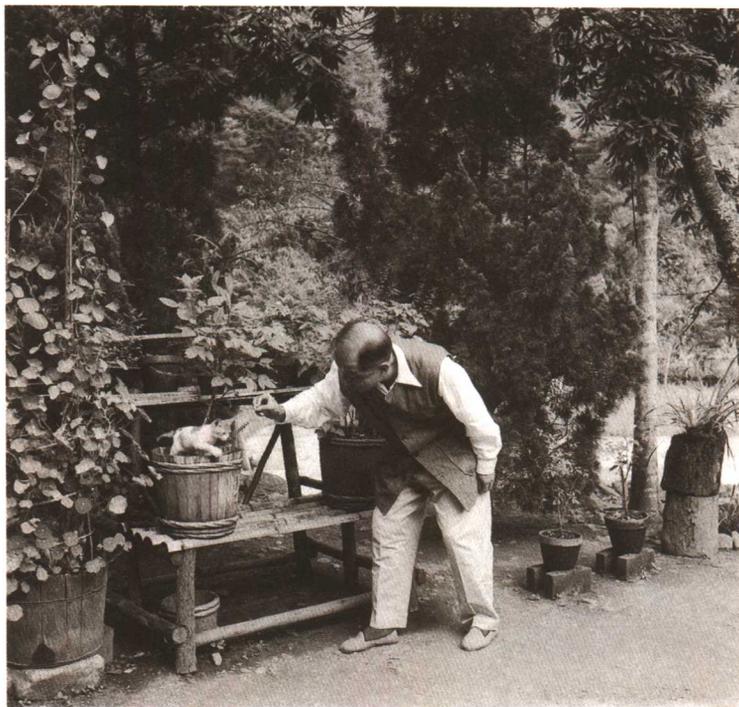


体育锻炼可以健身强体，打网球在50年代的台湾尚少见，也是一种“贵族化”的运动，被宋美龄称为“绅士”的张学良终其一生喜好网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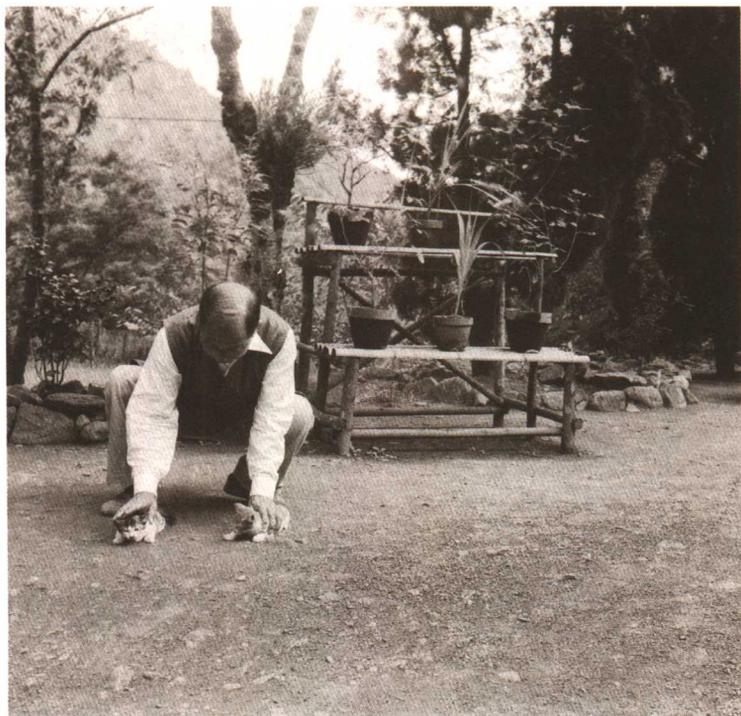


在球场上，张学良挥拍扣杀的情形。

小猫小狗都是张学良的“宠物”，闲暇之时，拿根鸡毛逗小猫玩，也是一种乐趣。



“乖乖别打架！”小猫玩闹，张学良按着一只，轻抚一只……本是一母生，“相煎何太急”。可以想见，如果没有这些小生命相伴，张学良的幽禁生活该是多单调。





着夏装的赵一荻，总能依靠自己的巧手，缝制出让张学良眼前一亮的衣裙。

月，其间，前列腺发炎、发烧……张学良都未停笔。“此乃我从来没写这么多的东西，虽然不完美满意，但我竭尽心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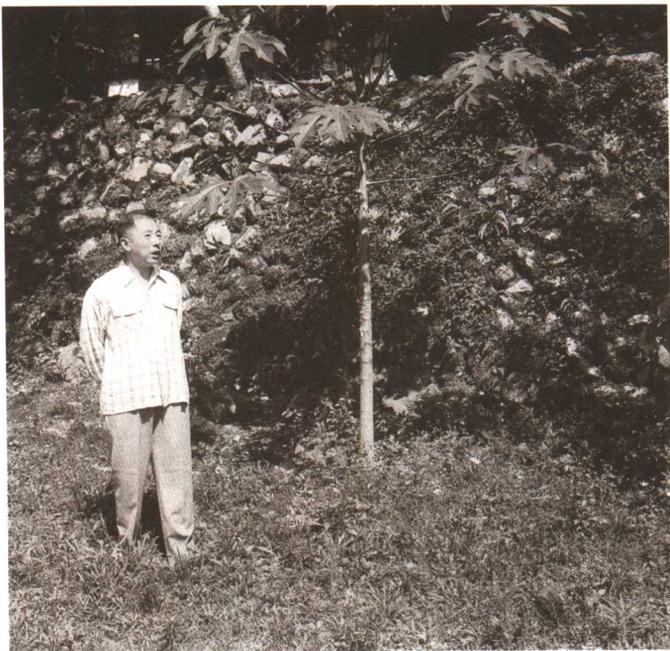
刘乙光将《杂忆随感漫录》及张学良的信，送台北交蒋经国。

5月10日，刘乙光从台北带回“总统”的意见：一是要张学良将《杂忆随感漫录》重新抄一遍；二是要求张学良将“去年12月17日上蒋‘总统’西安事变的复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嘱我亲笔抄写”。并言“拟给诸高级将领参考”。刘乙光再三交代，“二事皆‘总统’亲告彼者”。抄写这两份材料，张学良整整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刘乙光将张学良缮写的“反省录”送至蒋介石，“总统”说：“留下我研究研究。”并交代说准备将张学良迁至“较近之处”，“但未言明地点，何日期”。这份原本是张学良奉蒋介石之令撰写的西安事变之经过，是作为私人信函交蒋介石的，现在被蒋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手再抄写一遍。（这份材料后来流传外间，变为《西安事变忏悔录》。）

8月12日，蒋介石、蒋经国又给张学良“布置”任务，要求张学良写读《苏

1956年，蒋介石命令张学良写“西安事变同共产党勾结经过”的文章，这让张学良“前思后想”，不知由何下笔。



俄在中国》之读后感，并“把西安事加进去，”以便公开发表。《苏俄在中国》一书是蒋介石著的。

8月初，张学良发现自己咳嗽痰中有血。“照X光，看了内科和眼科大夫。”从8月14日至8月18日，张学良花了五天时间写完了《恭读〈苏俄在中国〉书后记》。

8月26日，刘乙光将该文送交蒋经国，得到的答复是先“放在那里吧”！

这一连串的“奉命之作”，总算都交卷了。张学良身心俱疲，想好好休息一下。搬迁之命早已下达，只因高雄西子湾的住所正在修缮，先要将行李整理好，陆续运走。一想到将要告别井上温泉了，离开这里熟悉的一草一木，熟悉的山间小道、静静流淌的小溪……中秋之夜，“在球场上赏月，唱留声机，过了中夜方入寝”。毕竟张学良、赵一荻在这里住了十年了！

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赵一荻离开井上温泉，重迁到高雄。“早四点起床，中午到嘉义，晚六点抵高雄，寓于西子湾的石为开的宅子。”相较前次迁高雄，居住条件好多了。“房屋宽阔，环境幽美，为二十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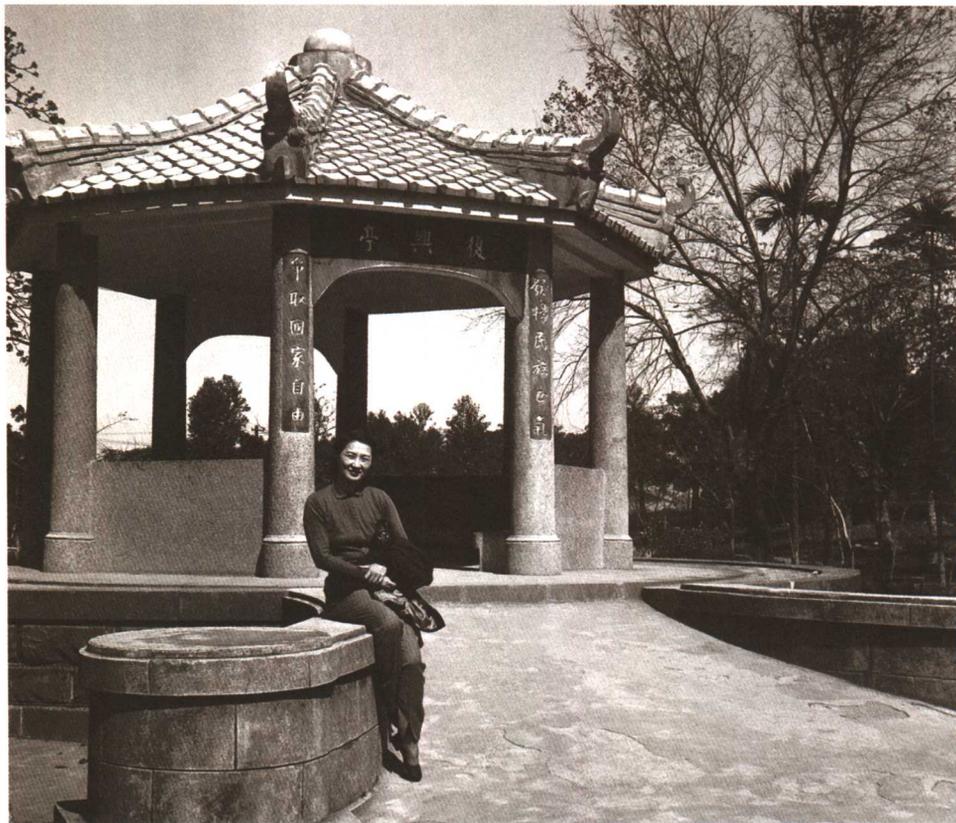


1956年，张学良在大溪公园复兴亭前留影，相距不远就是蒋家的别墅。张学良曾托人想见蒋介石一面，却无下文。

蒋夫人派专人送来了家信及礼物，伊雅格送来的相机、电唱机、电熨斗、电被等，这些家用电器，在高雄可以派上用场了。

终于可以让自已稍稍轻松些，在西子湾散散步，或将礼品回赠友人，寄照片给远在美国的子女。一年多来，忙于写材料，前些年，莫德惠“中风”经抢救后已恢复，张学良常与之互赠礼品与书信来往……因一年未见张的信，来信表示深为挂念。现在得以喘息，朋友的信一一回复。山中岁月已成往事，举目观海，诗兴顿发：“沧海在望，莫测高深；涛怒岳撼，静浪如茵；轮航万里，筏济渔人；鱼龙凭跃，江汉归心。”

圣诞节到了，张学良与赵一荻围坐在宋美龄送来的圣诞树前，发出了这样的



Edith（赵一荻）在大溪公园。

感叹：“寂静的圣诞夜过去了，虽然有那样美的圣诞树，而孩子们不能同聚，不觉歉然！”平安之夜，思念无限。

还有一件事，让张学良心神不定。听刘乙光说，蒋介石、蒋经国曾于11月27日为检阅大演习到高雄西子湾，原说两星期内来看张学良，后来迟迟未能得到“召见”的音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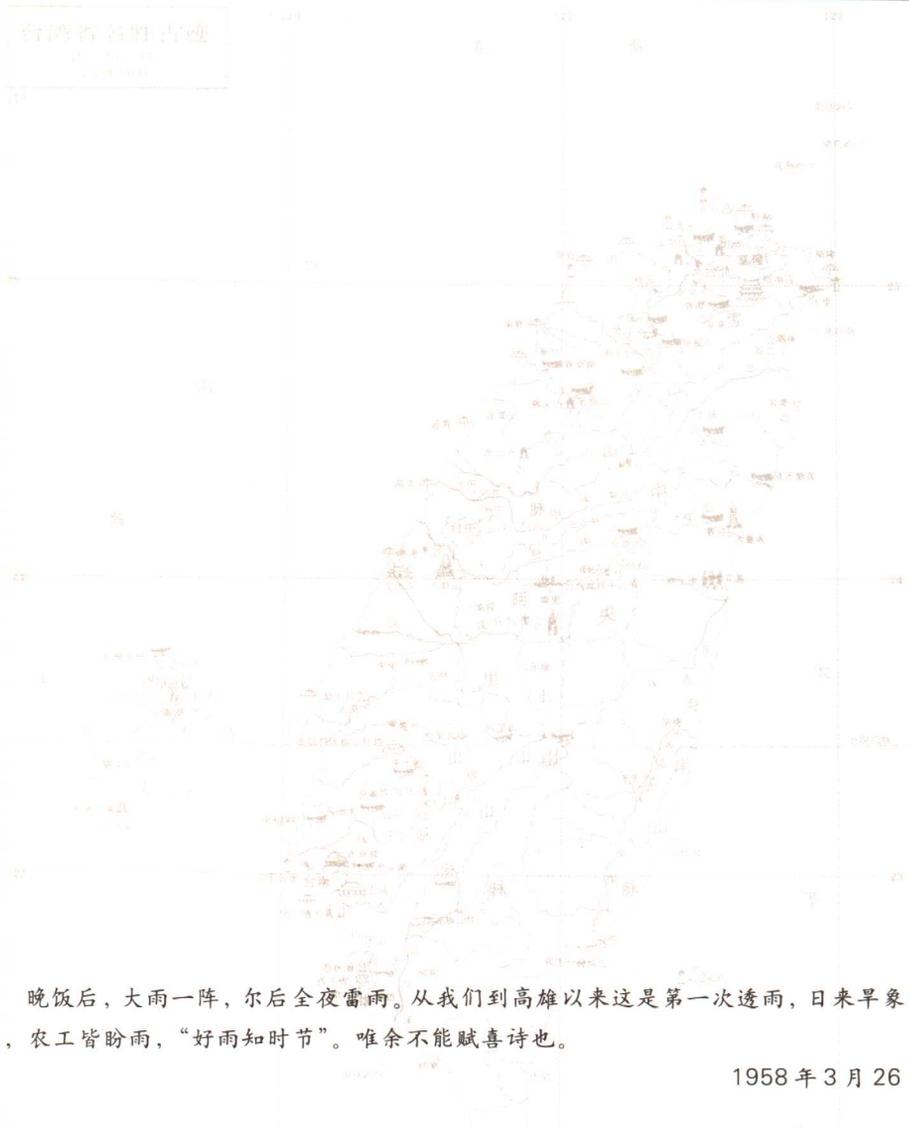
是祸，是福？见了面又能说些什么呢？最终得到消息，蒋未安排见面，已返回台北！

“这一年，又是这样的过去了！白发增，岁月短，嬉性不改，自惭，自惭，看明年如何？”

十三

“总统”召见 “管束”依旧

台湾省名胜古迹



晚饭后，大雨一阵，尔后全夜雷雨。从我们到高雄以来这是第一次透雨，日来旱象已成，农工皆盼雨，“好雨知时节”。唯余不能赋喜诗也。

1958年3月26日

早七点五分，由西子湾出发，在彰化八卦山招待所午餐，下午六时许抵台北寓于北投（阳明山，中心里）幽雅招待所。连日Edith（赵一荻）性情拘滞，放不下，大为气忿（愤），叫她休息，不听。收拾行李，布置房间，闹个不休，尔后因眼痛未作记。

1958年9月4日

初 Date October



同蔣經國會見，早九

點蔣經國來寓迎訪，

相談之下，甚為歡暢，余向他
多方的突擊，並道及余很
想望一望 戈先生以幾多年
的想念，並說明余之志學，富
貴於余為浮雲，惟一抱丹一錢
故土耳。彼頻問到起居飲
食，我答以比今前之居處，已使
我十分不安，並能矯情，乃現
在的余，不充享此優榮也。彼

Date Oct.



又談到必感寂寞，可以出
去遊玩之，並要派電影
來賞閱，余力辭。約在十點左右，
大家同攝敬相片而去。

西子湾的日出日落是美丽的，辉映着日渐衰老的张学良，他常常漫无目的地到海边观潮涨潮落，静静地谛听……

1958年5月17日，宋美龄突然来到西子湾张学良住所，张学良毫无思想准备，显得有些措手不及。急忙召赵一荻与之相见，这是宋美龄第一次见到赵一荻。自张学良迁台后，宋美龄始终与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可在信函中只提“凤姐姐”及子女事，几乎未提及赵一荻。大家寒暄之后，宋美龄巡视了各房间，送了糖果及鲜花，并告诉张她将去美国，赶紧写家信。两人谈了约半小时。张学良讲述了



1957年上半年，张学良每天都忙于写作。呈上“蒋总统”信被命改为《西安事变反省录》，还要求张学良亲笔重抄一遍。紧接着又是《杂忆随感漫录》和《苏俄在中国》的读后感。这些“奉命之作”让张学良几度情绪失控，刘乙光便安排外出游玩。这是张学良游青草湖时的留影。



张学良在不停地“写作”，许多章节都是赵一荻帮忙缮写。出游青草湖，让赵一荻也得到放松的机会。

自己的想法：“对于名禄无所希求，但仍愿为人类和国家，在有限的余生，再有所贡献……”并提出想见见“总统”。“今天看见夫人，我十分快活，但又悲伤。”宋美龄说：“你从来是一爽直之人，你的话，我一定转达。”

宋美龄的到访，使张学良心绪渐渐平静，与赵一荻一同游览了美浓中正湖、旗山中山公园……

7月的高雄，正值盛夏，海边消暑，游人如织，张学良游玩归来后，发现自己眼睛一连好几天看不清东西，尤其左眼看物变形且有黑点移动，经检查为“中心性网膜炎”。

宋美龄去美国了，托“蒋夫人”转达的“求见”，没有动静。8月2日，张学良在报上看见一篇周鲸文的谈话后，找刘乙光商量，想请刘乙光到蒋经国处探听一下高峰的意旨并请个人帮忙，“打算写一篇东西”。这是张学良第一次“主动”提出写迎合高峰的文章，“听说老先生要南来，想趁老先生在西子湾呈上去”。刘乙光听罢，自然很高兴，说：“如果能写的话，那早就是高峰的意愿，不必探询，一定赞许的，不过高峰不愿出诸命令而已。”



1957年初，刘乙光奉蒋介石之命，要张学良撰写回忆录（即《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每天“写两三千字，回忆往事，真的不好受”。2月2日，天气晴朗，张学良、赵一荻与刘乙光一家游新竹青草湖，在福严精舍“小坐并午餐”。演培和尚等人相陪，张学良为大家拍了合影。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刘乙光及家人站在前排，赵一荻（后右三）、吴妈（后右六）都立于后排。“主仆”界限，何等分明。



1957年7月，张学良的大作《杂忆随感漫录》写完后，由刘乙光送台北。难得偷闲时光，张学良为赵一荻在清泉第二号吊桥前拍照，40多岁的赵一荻已略显“发福”。

张学良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让“老先生”看到他的思想已“有所改变”。这篇文章定名为《坦述西安事变痛苦的教训敬告世人》，交刘乙光28日送往台北，同时给台北包医生去信，讲述自己眼疾治疗的情况。

9月2日，刘乙光从台北归来，告诉张学良他见了蒋经国，将信件送上。并向蒋经国汇报了张学良的“转变”。张学良对自己过去写的东西不满意，因为过去对“共匪”的认识未到时候，最近又看到了周鲸文的谈话，自己决心写了这篇



1957年的张学良一直忙于应付他无法忍受、没完没了的“奉命之作”，但他也在思考如何让蒋介石认识到自己“有所转变”，这样可以得到更多的“自由”。吊桥下的张学良可能正在思索“路在何方”。

东西，“但在文词上仍不满意，如加以修正，是所希望”。并汇报了张学良的眼病。

“已在高雄医院医治了一个多月，未见进步。”蒋经国看完这篇文章后，召见刘乙光，告之“所写的东西，他已看过，甚为感动！已呈老先生矣”。张学良从不愿意写回忆文章到“主动请战”，在蒋经国看来是“大有进步”。经上报“总统”同意，令张学良“移台北医治眼疾”。

1958年9月4日，张学良、赵一荻驱车纵贯台岛迁回台北，晚六点住进北投

幽雅招待所。因眼疾无法写东西，这让张学良解脱了。看病之余，由赵一荻或刘乙光家人陪着四处走走看看，游观音山、金山、鲤鱼山、碧潭，拍了许多照片。

中秋节将至，台北的友人纷纷送来礼品，在众多的礼品中有蒋经国夫妇送的“红葡萄酒两瓶，月饼两盒”。

10月17日，在北投幽雅招待所，迎来了一位客人——蒋经国。这是张学良与蒋经国的初次见面，过去互相都不陌生，但“无缘”见面。在日记中，张学良记下：“早九点蒋经国来寓过访，相谈之下，甚为欢畅……并道及我很想望一望老先生，以慰多年的想念，并说明我之志望，富贵于我如浮云，唯一想再一践故土耳。”

蒋经国并未正面回答，“频频问到起居”，说“如感寂寞，可以出去游玩，并要派电影来赏阅”。但张学良“力辞”。分手时，大家一起合影数张。

也许是宋美龄、蒋经国均将张学良求见的“要求”转告了“总统”，但更重要的是，张学良送来的文章已表明张学良的思想“大有转变”。

蒋介石终于答应安排时间见张学良。

11月23日，刘乙光通知张学良，下午五点，“总统”在大溪召见。“三点一刻，蒋经国派其车来接”。张学良与刘乙光同行，约四点多到大溪，等了10分钟，由蒋经国、刘乙光陪同进入“总统”行辕客厅，相见之下，敬礼之后，一同进入小书斋。

“总统你老了！”“你头秃了。”两人“相对小为沉默”。两人再次相见，一晃20多年过去了，经年累月的“管束”，往事如烟，恩仇纠缠……此情此景，非笔墨所能形容。

张学良先是“忏悔”了一番，表明自己认识的“提高”，接着谈了自己的读书计划，希望老先生推荐“应该看些什么书”，并能请教“有道之士”一同读书，蒋介石推荐了“《大学》和《阳明传习录》很好”。谈话中，蒋介石仍不时提到“西安之事，对于国家损失太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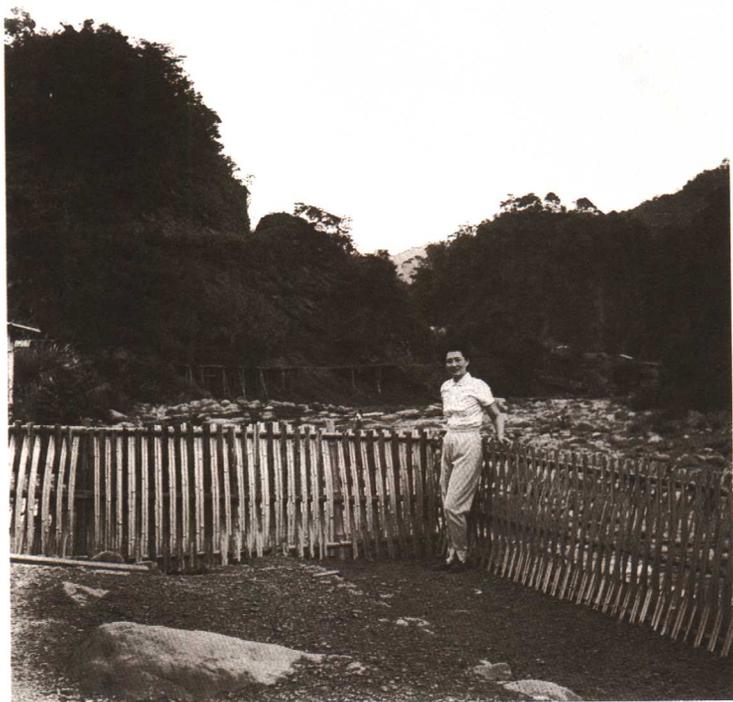
张学良“闻之甚为难过，低头不能仰视”。看来蒋介石一辈子也不会忘记“西安事变”，即便张学良已付出二十余年的“管束”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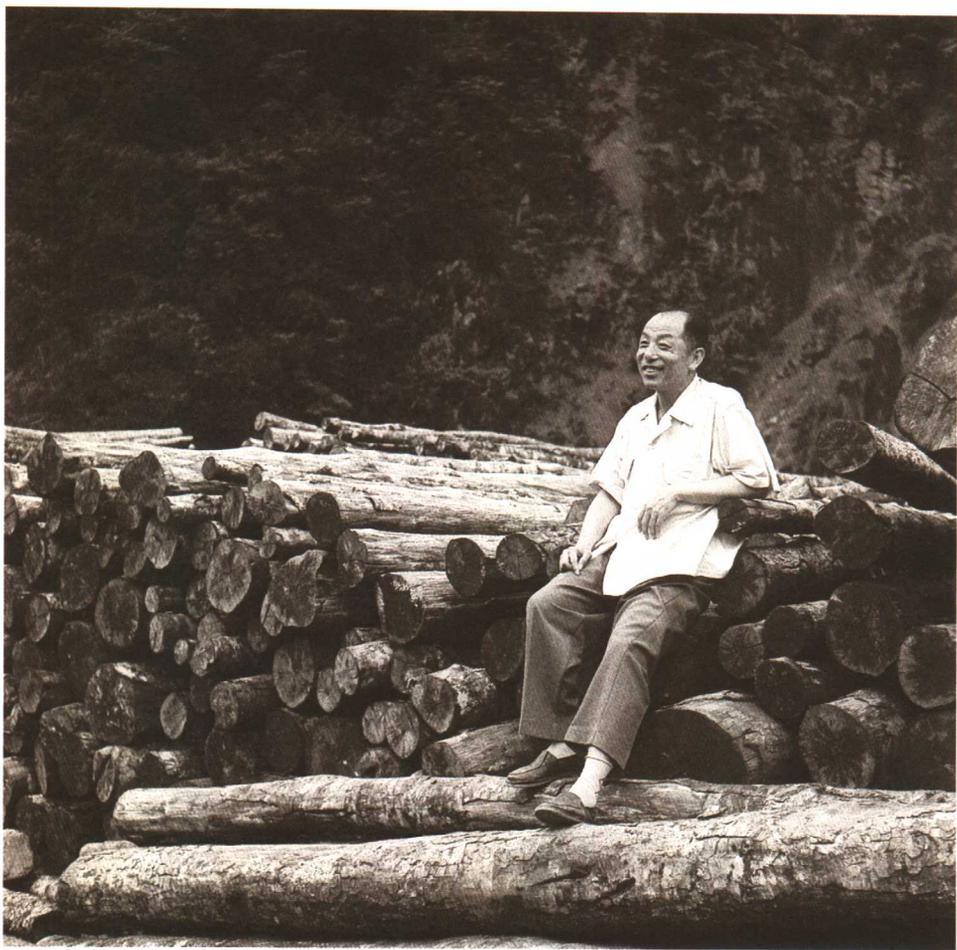
两人谈话仅半小时，大多是张学良陈述自己的想法，蒋介石仅简答之。蒋希

游玩的轻松心情，
让张学良暂时忘却
了写作的痛苦回忆。



赵一荻与张学良的
“默契”，在于同一
场景，两人取景角
度相同，每个景点
大致是一人一张。





这是张学良难得的一张笑脸，也许是“奉命之作”都已完成，已接到命令，准备迁往台南高雄。张学良的脸上刻满了时光的年轮。他已成为山中的一棵“老树”。

望张学良“好好读些书反（返）回大陆，你对于国家，还能有重大的贡献”。丝毫未提关于“解禁”或“恢复自由”的字句。

蒋介石的“召见”，只是想听张学良的想法，“管束”生活依旧。张学良可以感受到的是，这一段，蒋经国频频召见刘乙光询问情况，“此番召见，乃是他的从中力量”。……看来“子承父业”，自己要接受经国老弟的“管束”了。



赵一荻在贮木场。现在已很少能见到如此大的树木，这让人想起当年台湾森林蓄材量之大。

圣诞节前，蒋经国派专人送来圣诞贺卡及酒与香水各一瓶，张学良回赠一部蜀刻（明版）的陈寿《三国志》及女睡衣一套。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12月24日下午七点，收到由情报局转来“蒋夫人由美来的家信、照片等”。为了能让张学良在节日里看到家信，情报局的人说：“蒋夫人曾有电报限该件必须在圣诞节时送到。”

十四

安排家事 “夫人”操心

早，蒋经国来寓所，表示饯行，称彼将出行，特来致候，十分客气。并嘱返高雄，可外出游玩游玩以遣闷。并言到高雄将再来看我。

1959年3月17日

昨夜台北专人送来蒋夫人信一件，附家信、伊雅格信和照片，灯一架、糖一盒、英文杂志十五本。老刘今晨交来，我立即回信；致蒋夫人谢信，问候欠安。致家信附相片和孩子们的小物品，伊雅格购物信，交来人带回。

1959年7月4日

早，于伯材交来蒋夫人节赏；夹克、寒暑表、放大镜、糖果、圣诞树。蒋经国夫妇送电剃刀、香水、糖果两盒、张局信一件、洋酒两瓶。余上蒋夫人谢函一件附老刘函寄台北。

1959年12月24日

Date July


 早七点依论车一辆，在鄂能
 寿山公园大门处上车，十一
 半到新化，在康典楼午餐，十二点半由
 新化动身，下午五时许到北投，仍
 寓出社招待所。抵建不久，蒋经
 国即将戈刘唤去，戈刘返来告
 知明早伊雅格来会。

Date July


 早九点蒋夫人的秘书游建
 昭偕同伊雅格 Mr. Choate 来
 寓，游秘书即辞去，伊雅格单独同
 系谈话，其同 Choate 之来，为 Choate
 不图他合作，按额外用款，Choate
 不加许可，彼希望系给他拨款十
 万或十多万 US 元。系立即答给他
 卅万 US 元，彼甚欢喜，同时告他
 Edw 钱事，将 Choate 唤来，Choate
 仅将 Edw 款的信照余意打好，
 对伊雅格款彼不答，并说：

经过台北医院的治疗，张学良的眼疾已基本痊愈，重新配了眼镜。遂决定返回高雄西子湾。1959年3月17日，蒋经国前来送行，谈了半小时离去。3月21日，张学良动身南返，晚四点半抵西子湾寓所。

远离台北，张学良的心境稍好些，眼疾仍时好时犯，“只看到0.2，但是用中距离的眼镜可以看到1.0”。“连日眼疾复发，不能读书，闷！”更大的郁闷是，无期限的“管束”，一想起这些，张学良卧床难眠，便“胡乱谄诗”：“愿起高楼铸晓钟，力不逮兮眼朦胧。泪坠涛中空自去，如何流得到辽东。”台北的林大夫



山清水秀，静默无语，张学良的内心并不平静。“上峰”有交代：“不准收听中共的广播，不许同警卫人员接近。”张学良在日记中写下“寡言，读书，默思”。



散步时带着书，走累了，坐下看一会儿书。这是张学良的习惯。在日记中又将自己所思记下：“不忧不惧，不嫉不恨，乐天知命，海阔天空。”

托人寄来了药品，并告之多服用维他命丸，张学良的眼疾才有所好转。5月，蒋介石与蒋经国同来高雄，他们的住处与张学良寓所相距约200米。蒋经国派人送了一辆车，并说“此行可能不来看”张学良。

张学良从报上得悉，宋美龄6月下旬已从美国归来。久等不见“蒋夫人信件”，以为无家信来，便去信于凤至“责其蒋夫人回国，不写信来”。殊不知，宋美龄回台时，在浴室不慎摔伤，故迟迟未来函。



在张学良身边，赵一荻不仅担任了“秘书”角色，还学会了“打针”。张学良生病时，赵一荻总是寸步不离守护着，医生诊病离去后，“打针”就交赵一荻办。张学良在日记中有“今早由 Edith（赵一荻）给我打了一针，打的（得）很好。烧是完全没有了”。

7月4日，张学良收到从台北寄来的东西。宋美龄听说张学良视力不好，专门从国外带回了一种可调各种角度的台灯。信中说：“这种台灯，我在美国也有一个，非常好用……”

宋美龄这次美国之行，见了于凤至三次，还到了于凤至在美国的家，参观了花园。“我也见到你的孙儿、孙女，他们聪明有礼。”“临行前，我们在子安家吃晚饭，凤姐姐和闰玗也在座。”并告之伊雅格两周后会来台湾。张学良高兴之余，



赵一荻在教堂门前。赵一荻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她内心深处，最祈盼的是：福音降临，家人团聚，她祈祷着，默默等待着……



“上峰”令张学良写回忆录，张学良“十分伤感，真是不愿想这些过去的事”，“奉命之作”又不能不完成，真动手写作时，张学良慨叹：“提笔忘字，书到用时方恨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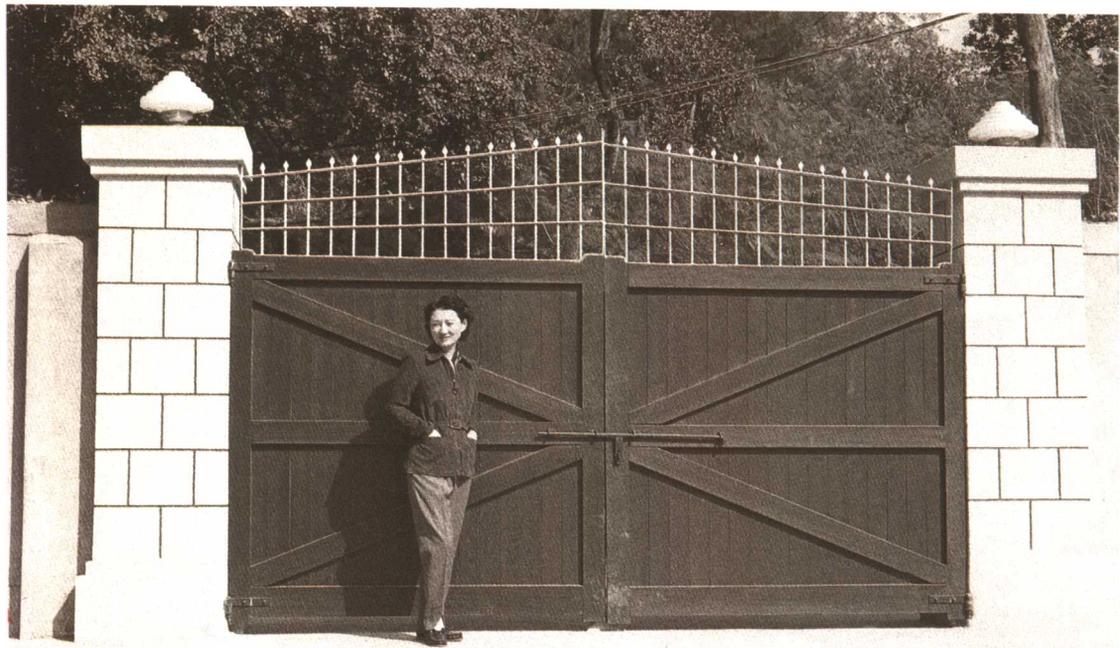




离开了井上温泉，赵一荻的脸上多了些笑颜。摄于1957年10月24日赴高雄途中。

这一年10月，张学良、赵一荻离开井上温泉，驱车台南高雄。完成了“总统”的“奉命之作”，虽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但搬到海边居住，还是让张学良心情舒畅。这是途经西螺大桥时留的影。西螺大桥四个字是陈诚题写的。（左上图）

赵一荻在西螺大桥碑记前。微风轻抚，一路走来，赵一荻有些累了。（左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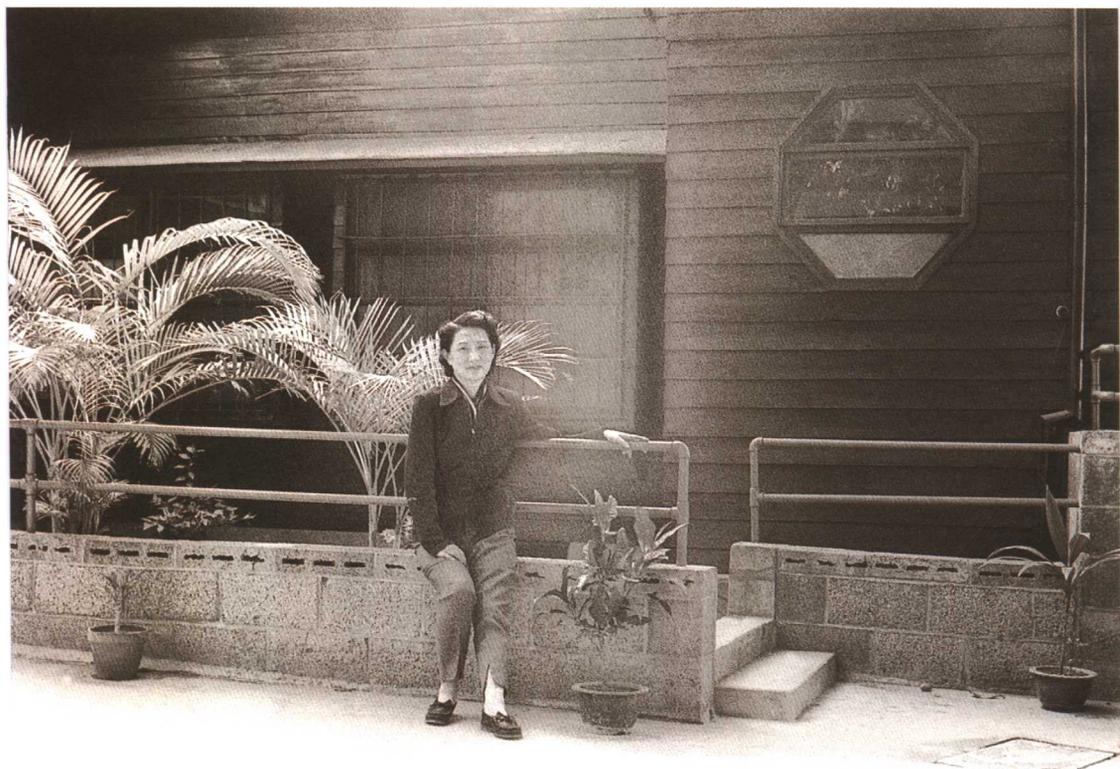
赵一荻在西子湾住所院门前。

忽想起前信责备于凤至，赶紧又书一封向于凤至道歉的信，立刻托人寄台北转。

7月19日接到台北电话，说伊雅格到台北，让张学良、赵一荻同行北上。21日上午，由宋美龄的秘书陪同伊雅格等人到北投幽雅招待所，主要商谈张学良在美的钱款事。

25日上午九点，宋美龄派车将张学良接到阳明山官邸，两人作了一次长谈。“谈到金子事；闫瑛回国事，吴妈老杜事。”还问张“在美有多少存款”。宋美龄询问的都是张学良的家事及钱款的安排。临行前，宋美龄看着张学良，好一阵才说：“你的问题，时间还要久哪！要有忍耐，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

什么时候能让张学良恢复“自由”？宋美龄准备让“上帝”做出安排！现在，她只能从生活上尽力提供帮助，她劝张学良“多做祷告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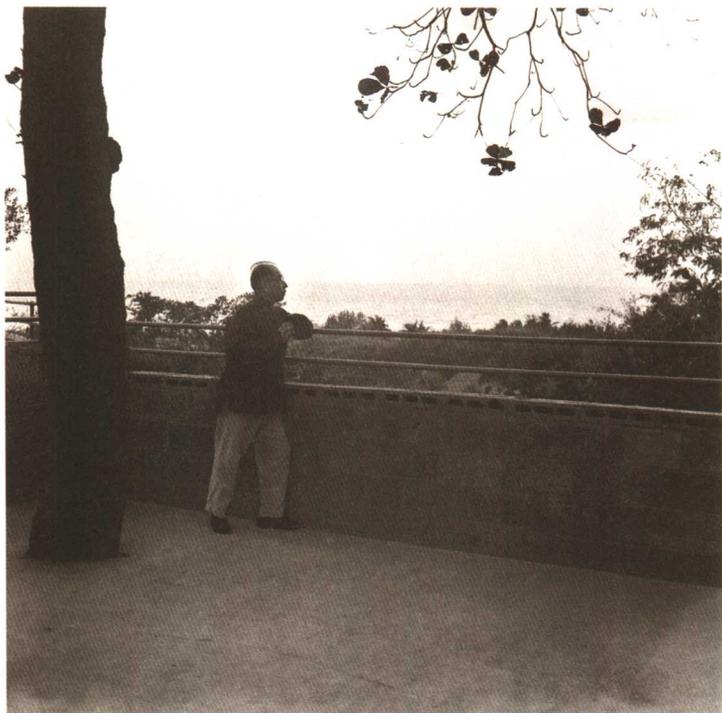
张学良、赵一荻在高雄西子湾的新居。条件比过去好多了。房屋宽阔，环境优美，但一扇厚重的大门仍将他们与外边的世界隔开。

但上帝是否能告诉张学良究竟要被“管束”多久呢？

8月26日，张学良、赵一荻返回高雄。

这一年间，张学良来回奔波于台湾南北，该见的人都见到了。虽然他的生活条件日渐改善，“自由”的程度也日渐扩大，游览的地点也日渐增多，但他渴望“自由”的念头，永远被挤压着。无论他走到哪里，看似“前呼后拥”，实际上是一张无形的网将他牢牢罩着……

所有的抗争，似乎都找不到对手，他只能用忍耐豁达、苦中作乐的心态来应对。宋美龄的关心让他得到安慰，宋美龄的坦言，使他更加迷茫。宋美龄指点他走出人生的“苦海”，是到基督上帝那里寻找心灵的归宿。过了很长时间，张学良已成为虔诚的基督徒，才明白这也是“蒋夫人”的精心“安排”。



张学良在西子湾寓所前，举目观海，诗兴顿发：“沧海在望，莫测高深；涛怒岳撼，静浪如茵；轮航万里，筏济渔人；鱼龙凭跃，江汉归心。”



宋美龄派人送来了圣诞礼包及圣诞树，树上挂满了圣诞饰品。盘腿而坐的张学良在树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寂静的圣诞夜过去了，虽然有那样美的圣诞树，而孩子们不能同聚，不觉歉然！

对于远在大洋彼岸的亲人，思念之情如圣诞树上的彩带，扯不断，理还乱。团聚之梦始终萦绕在母亲赵一荻的心头。



吴妈是张学良与赵一荻身边唯一的“亲人”。这位当年清华的女校工，丈夫早年去世，留下两个儿子，为了养家，经人介绍给赵一荻，帮助照顾“宝贝”閻琳。从那时起，就一直跟随、陪伴着张学良、赵一荻从贵州到台湾，忠心伺候、生死相随，患难与共。



十五

信奉基督 教堂“亮相”

早六点由高雄动身，十二点抵彰化，在铁路饭店午餐，下午五点廿分抵北投，仍寓幽雅招待所。

1960年4月8日

早九点四十五分，同Edith（赵一荻）及刘氏夫妇到董大使寓所。Edith（赵一荻）、刘太太、老刘同董夫人到荣民医院做礼拜。十点五十分我同董大使到士林礼拜堂做礼拜，由卢牧师祺沃讲马太福音16、13，说明磐石和钥匙之真谛。十一点卅分讲礼拜毕，总统返出时，夫人特向余个人握手，使得众人注目……

1960年6月5日

中午十二点半，经国来寓共餐，关于盖房问题交换意见。请老刘约张炳华，彼谈尚未奉到，不便会谈，日内得到指示，即来我处。

1960年6月28日

夜十点，夫人差游秘书上（送）来圣诞卡，余与Edith（赵一荻），并两人的礼物。余致游秘书圣诞礼一包，面交给他。

1960年12月16日

Date June



早九点四十五分，同Edith及刘氏夫妇到董大使寓所。Edith, 刘太太, 及刘同董夫人到荣民医院作礼拜。十点五十分我同董大使到士林礼拜堂作礼拜，由灵牧师祝沃讲马太福音16:13，说明磐石和钥匙之真谛。十一点半分作礼拜毕，捲统返出时 夫人特向余个人握手，使得众人注目。捲统去後，余向岳军敬之握手致意。董大使向我介绍周台藻，余耳聾听不明何人，并



张学良、赵一荻于1957年搬至高雄西子湾，因眼疾到台北就医，北投幽雅招待所是他们的临时住所。这个招待所属于安全局。眼疾复发，不能读书，张学良只得谑诗自慰：“愿起高楼铸晓钟，力不逮兮眼朦胧。泪坠涛中空自去，如何流得到辽东。”

宋美龄在告知张学良“自由”无期限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并安排张学良的“家事”。

1960年1月17日，宋美龄陪南越“总统”吴庭艳来高雄参观之机，到西子湾张学良家中，一同商量一件件“家事”：在美的存款如何管理，请谁来陪读，有关赵一荻与凤至的事……宋美龄推荐董显光来陪读。





赵一荻在台南安平港。张学良游览此地后，大为感叹：“不觉有沧海桑田之感，昔日小島，今日陆地矣。”

已是人到中年的赵一荻，在幽静如画的风景中，更衬托出她的优雅与娴静。（左上图）

1958年2月，张学良在台南游孔庙。在日记中写道：“规模在台湾论可称不小，犹其意义宏深，其形势建筑，比之内地，小巫见大巫也。”随后拜谒郑成功祠，写下吊诗两首：

（一）孽子孤臣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二）上告素王去儒巾，国难家仇萃一身。若使苍天多假寿，管教历史另翻新。（左下图）



高雄市一军事要塞，赵一荻的边上就是水泥的碉堡。

2月2日，这位曾任国民党驻美“大使”的董显光带着夫人、女儿一同来到高雄。张学良设宴招待，“相见之下，欢悲交映，彼此同感”。董显光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其学识、英文水平、外交才干深得宋美龄赏识，同时也是宋美龄派来的“精神”教师，引导张学良信奉基督……

张学良在2月9日的日记中写下：“今晨开始祷告。我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扫除我的怀疑，我求基督耶稣帮助我来坚定信心。”从研读明史到研究佛学，从不读《圣经》到“求上帝坚定我的信心”，仅用“走错了路”就能解释吗？最主要的因素是，宋美龄信基督教。

董显光的到来，使张学良的“伴读”生活，增添不少内容，研读《圣经》，学习英文，探讨研究教义感想，对张学良来说，一是有了可聊天的伴，二是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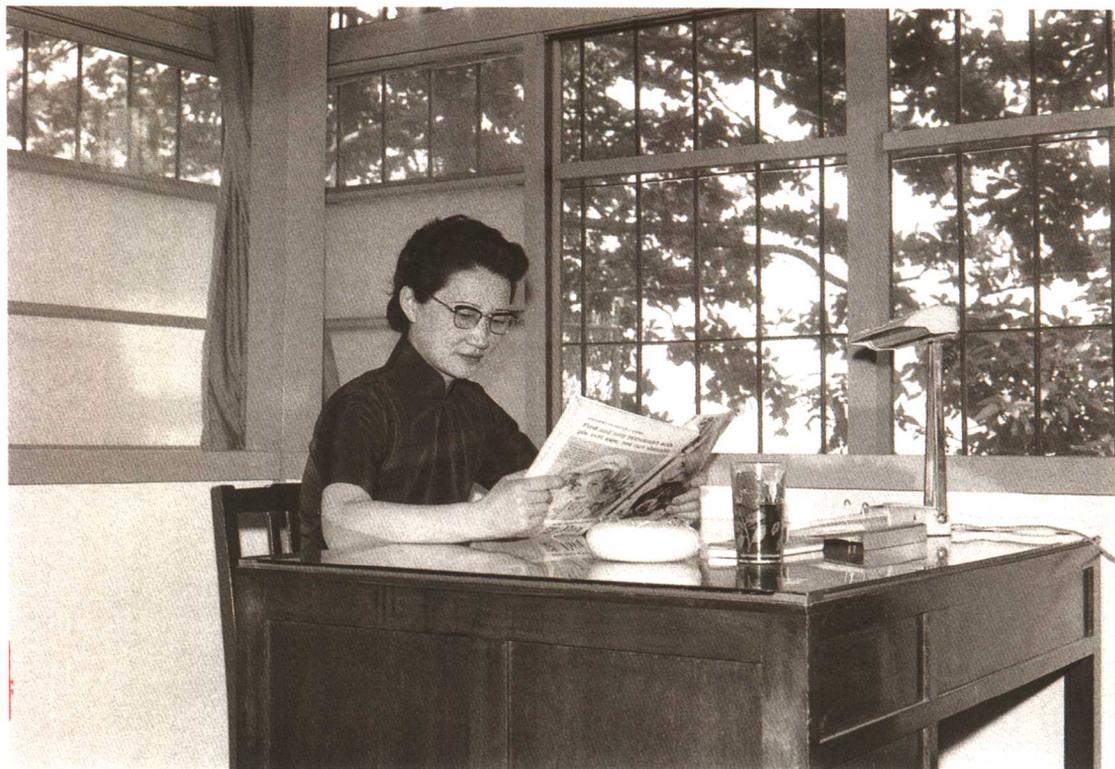
无论搬到何处,张学良总是将他栽花种草的习惯带到那里,这是张学良在西子湾的院子里浇花。

一条与宋美龄联系的途径,董显光是可以直接见到宋美龄的。

4月3日,董显光从台北回到高雄,夜里到张学良寓所,送来宋美龄的信与书,转达宋美龄的意思,有意让张学良搬到台北,说“她对我(张学良)甚为关心”。

很快,刘乙光通知张学良,“奉蒋(经国)副秘书长命余迁居台北,说明系蒋夫人的意思。言多带东西,不能再返高雄”。刘乙光仍是以命令的口吻:“即刻开始整理行装,定8日起程。”

1960年的4月8日,带上所有的行李,大包小包,一行人早六点动身,下午五点到达台北,“仍寓于幽雅招待所”。在张学良即将60岁之际,终于搬迁到台北了。从井上到高雄再到台北,整整14年的来回奔波。如果是一个性格内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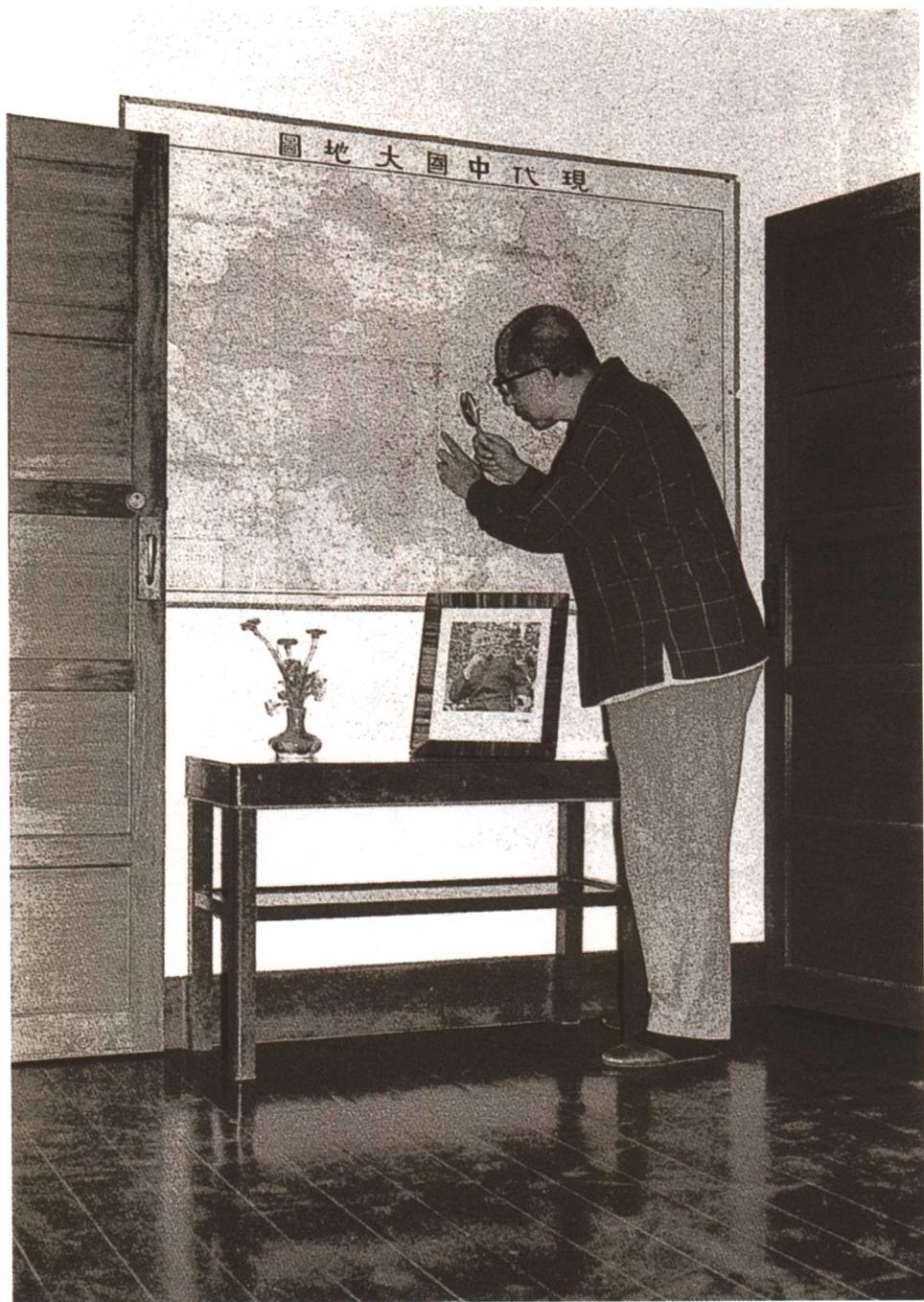


赵一荻在高雄西子湾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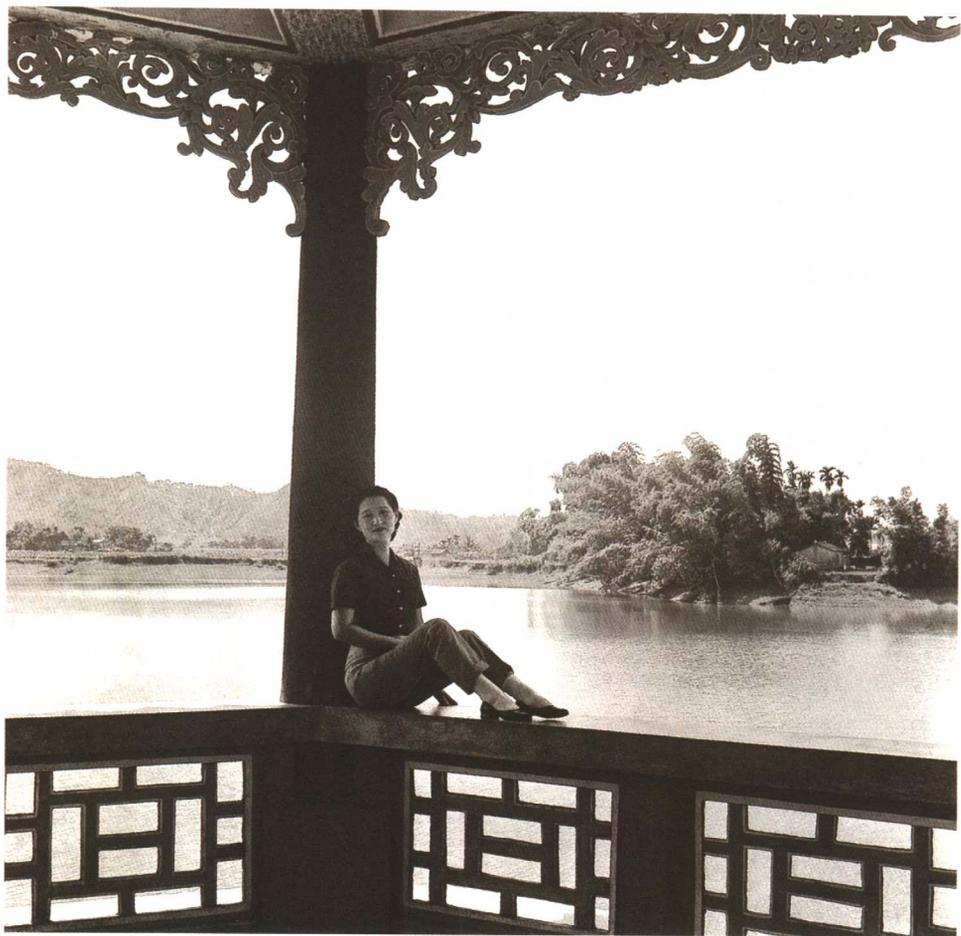
心胸狭窄、神经脆弱的人，恐怕早垮了，而生性好动、喜欢热闹的张学良能在苦中寻找乐趣，依旧活得硬硬朗朗。

5月30日下午四点，宋美龄再次突然光临，张学良“仓皇出迎”。“夫人再三询问寓所如何，并至卧室小坐。”宋美龄要张到“其私人礼拜堂去做礼拜，并令Edith（赵一荻）也同董夫人将至另一礼拜堂去做礼拜。”将两人分开到不同的教堂做礼拜，后来，张学良才明白宋美龄的用意。

第二天，就是张学良六十大寿。5月31日晚十点半“蒋经国老弟（互约称兄弟）同董大使夫妇来为我设筵祝寿”，下午就收到宋美龄送来的生日蛋糕，晚上又收到这么多的礼物，张学良眼含泪花，祷告之后，表示“不应受寿及谢他们的好意”。饭后，又一同去参观蒋经国的别墅，“十二点方返寓所告别”。



西子湾家中，墙上挂着“现代中国大地图”，茶几搁着蒋介石半身像，是宋美龄送的。从张学良查看地图的位置，似乎是在找西安？



1958年6月，张学良、赵一荻游旗山和美浓，“在美浓中正湖亭子上吃野餐”。餐后为赵一荻留下这张“人在画中”的照片。

几天之后，台北士林礼拜堂的一幕，让张学良永生难忘。他终于回到众人的视线之中……

1960年6月5日，通知张学良、赵一荻做礼拜，按照宋美龄的吩咐，张学良与董显光到士林礼拜堂。这栋礼拜堂是蒋宋夫妇时常光临的，被外界称为“私人礼拜堂”。每逢做礼拜，这里总是汇聚了众多国民党上层人物及元老。每次做礼拜，都是所有的人先到齐坐下，等着蒋、宋到来后，讲台上的牧师即开始布道。张学良与董显光是等前排的人都坐齐了，约10点50分才进入，悄悄坐在最后一

张学良在彰化八卦山招待所前。



赵一荻在台北北投幽雅招待所前留影。



张学良往返台北—高雄的途中，在彰化八卦山招待所午餐后的留影。身后是国民党军人，正在交头接耳，好奇地看着这位“传奇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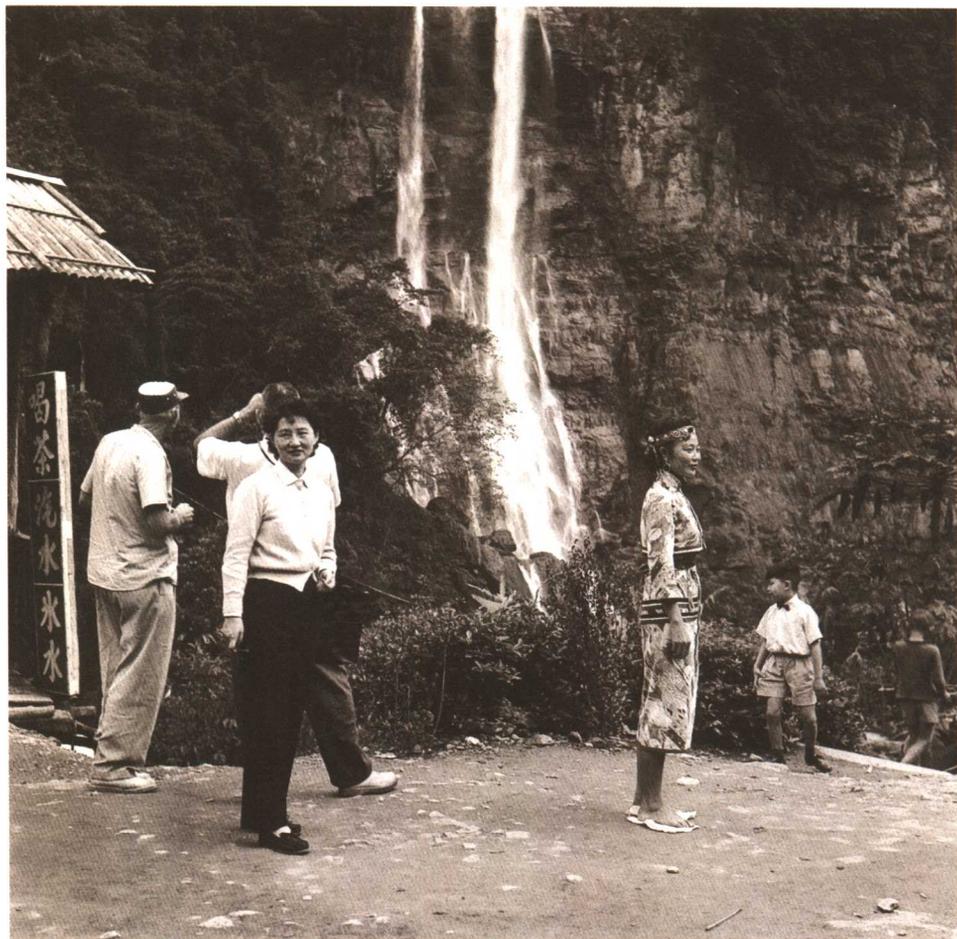


金山位于台北市北面，当年的公路如此简陋，公路两边是村民民居与田地。张学良已搬至台北市郊，田园风光及民居让张学良感到如此熟悉亲切。

1958年10月，张学良与蒋经国在台北初次见面，蒋经国对张学良说：“如感寂寞，可以出去游玩。”10月19日，“雇了一辆旅行车游金山，经阳明山、七星山到金山”。这张照片摄于金山标牌前，左起刘乙光、吴妈、刘乙光夫人、赵一荻、刘淑慈（刘乙光女儿）。（右图）







张学良、赵一荻一行游碧潭、乌来。这是赵一荻在乌来风景区的留影。乌来游人较多，边上的女孩是着山地居民的服装，背景是乌来瀑布，左边小茶舍，有卖茶水、汽水、冰水。

张学良在金山观海。只要有机会，张学良总喜欢到海边远眺，海之尽头天作岸，海的东边有他的儿女，海的西边是他的老家。心潮逐浪，牵挂无限。（左上图）

赵一荻在金山海滨。随后一行又到了台湾的最北端石门。在石门野餐后，沿海滨路返回。途经富贵角时到水女中参观摄影。（左下图）



1958年11月9日，张学良、赵一荻、吴妈与刘乙光一家游台北碧潭。大家乘船游览了碧潭，船上午餐后在桥头一起合影。赵一荻的左边为吴妈，右边为刘乙光夫妇，余为刘乙光的孩子们。

排。11点30分礼拜毕，蒋、宋起身一同先缓步退出，宋美龄边走边与众人打招呼，走到最后一排时，忽然向张学良伸出手，这一举动，让所有在场的人将惊讶的目光投向——张学良将军，与夫人握手的是张学良！“失踪”多年的张学良第一次出现在众多老朋友的面前，让所有的人“惊呼热中肠”。

蒋、宋离去后，张群、何应钦等纷纷上前祝贺，有的老朋友报上名字，张学良左右端详竟不认识，再一细看，“惊已容改，非言不识矣”。

后来，张学良体悟到宋美龄的用意，信奉基督，以做礼拜的方式，顺理成章地让张学良“露面”，在公开的场合，以握手的方式将张学良推到众人的面前。

“夫人深情，岳军（张群）之谊……使我没齿难忘。”去礼拜堂做祷告，听布道，能让张学良感悟上帝无所不在，同时也使张学良愉悦。每次做完礼拜，都会碰到许多老朋友，畅叙旧谊，从大家的关心问候中，张学良感到严密的樊篱在一点一点松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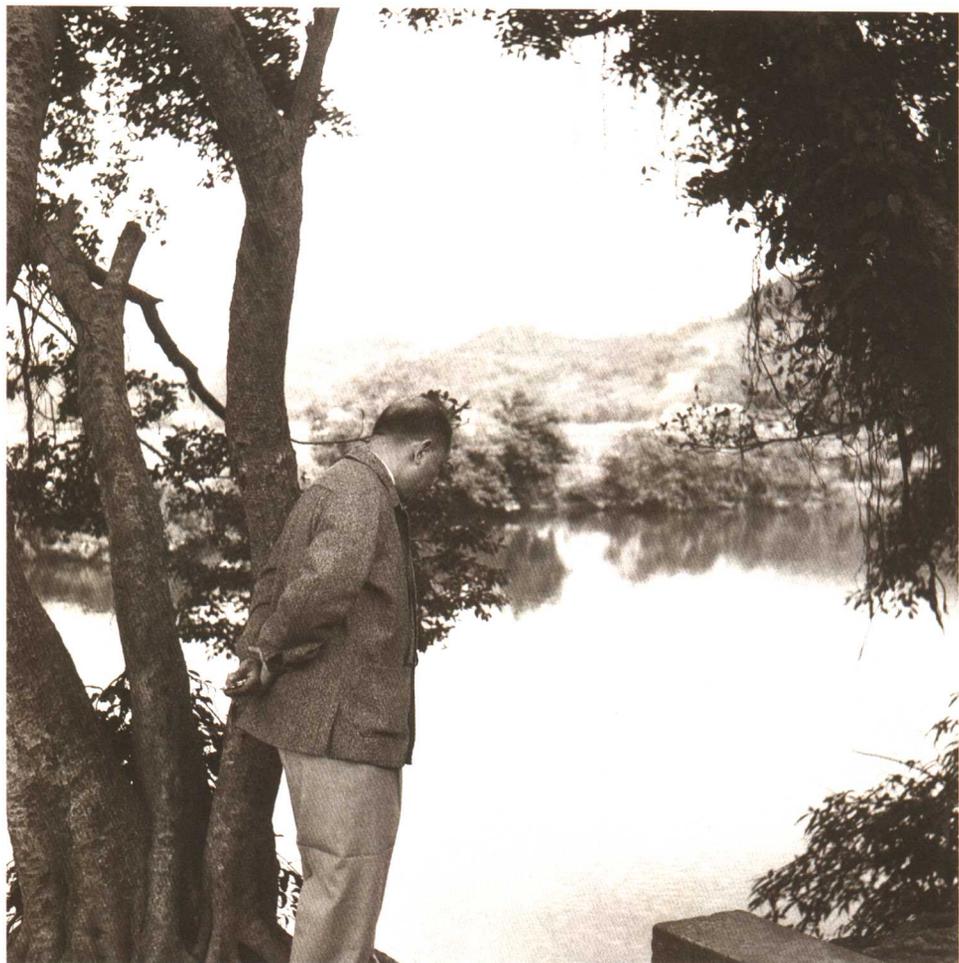
诸多的老朋友，似乎也体悟到了这一点点的变化。伊雅格可以时常到家中商谈，王新衡夫妇常来拜访及一同进餐，有时在王新衡家中请客，蒋经国亦携孝文夫妇参加。莫德惠闻讯也来拜访，“畅谈至11点半离去”。他们俩保持了近30年的交往，在张学良最困难时，莫德惠不辞辛劳，前去探视，往事依依，不堪回首，大家为能再见面而庆哉幸哉！

张学良、赵一荻一直住在台北幽雅招待所，来往客人一多，总不是长久之计。

6月27日，宋美龄派游秘书请张学良到阳明后山官邸。宋美龄一见面就说，你要自己选一块地，自己建房，这是你自己的事，大房小房皆可，地点台中、大溪、角板山皆可。宋美龄的用意是，买地建房，这样就有了属于张学良自己的家。

张学良说，想在阳明山区居住。宋美龄认为“阳明山区太潮湿，宜夏不宜冬，可另选他地”。在台北买地建房，对于张学良来说不知从何着手，便问这事“可否同经国一谈”。宋答“可以”。张学良返回后立即将消息告之董显光，皆大欢喜，董显光催促这事要“立即进行”。

张学良第二天见到蒋经国，商议此事，因两人均无准备，商议半天无结果。“让我自己来处理吧！”张学良决定先在“天后宫山上，购民宅，小为改建居住”。正准备去看地形时，遭到刘乙光的激烈反对，并责备张学良为何此事不让



1958年11月，蒋介石召见了张学良，认为他已有“转变”，准备让他从高雄迁往台北。此后，有关张学良的事情都由蒋经国负责。这一段时间，张学良经常四处走走，“管束”稍稍放松了。这是张学良在碧潭前观看，似乎想知道潭水究竟有多深？

蒋经国去办。言外之意，看什么地，必须请示蒋经国。这把张学良弄糊涂了，因为刘乙光刚见过蒋经国，这件事张学良自己是不能做主的！

没办法，只好告之蒋经国一起重新挑选地点。

台北的7月，湿热蒸人，张学良不时约人同去看地，直到7月23日，“看了——奇岩山地和洪兰友原宅”比较满意，再请蒋经国看后，“决定购地建房”。



张学良与赵一荻一同到汐止静修庵谒慈航墓。赵一荻在庵门前的石板上留影。

8月31日，经测量土地，为1200余坪（相当于4000平方米），“地价十分公道”，报告蒋经国后，“同意该地，嘱余进行”。交了地价款，请来了陆根记的工程师设计图纸。这是张学良、赵一荻在台北属于自己的第一个家，建筑图纸自然倾注了张学良的心血。

一切就绪，预付了30万的支票，11月4日，星期五，“复兴路的房子今日动工”。

十六

台北购地 营造“新居”

中（下）午一点半，经国先生来寓，董显光同来共午餐后，同去看建地。下午三点，刘家同陆根记谈好，星期四房子开工。

1960年11月1日

写给蒋夫人的谢信并述圣诞夜的感怀，交老刘送官邸。

1960年12月26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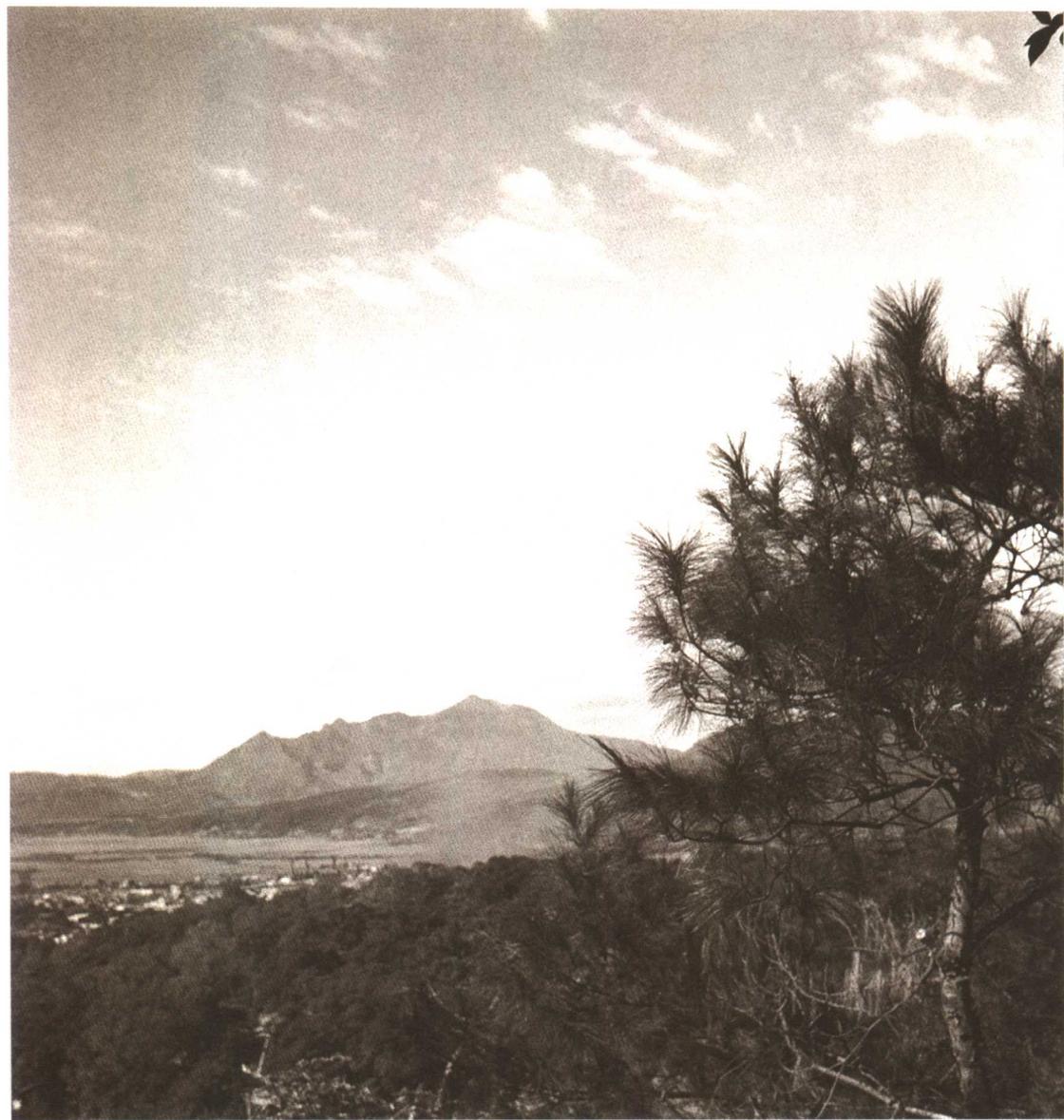
整个不认识他了。进去礼
拜堂，余等上车待行，见何敬
之已去，岳军在园中，余随下车与岳军
再握谈，彼此惊讶。周台宾自言我
是Elephant我才想起，言已容改，非
言不谓矣。友人深性，岳军之真，
Hallston之杰，使我没齿难忘。中
午在麓宅便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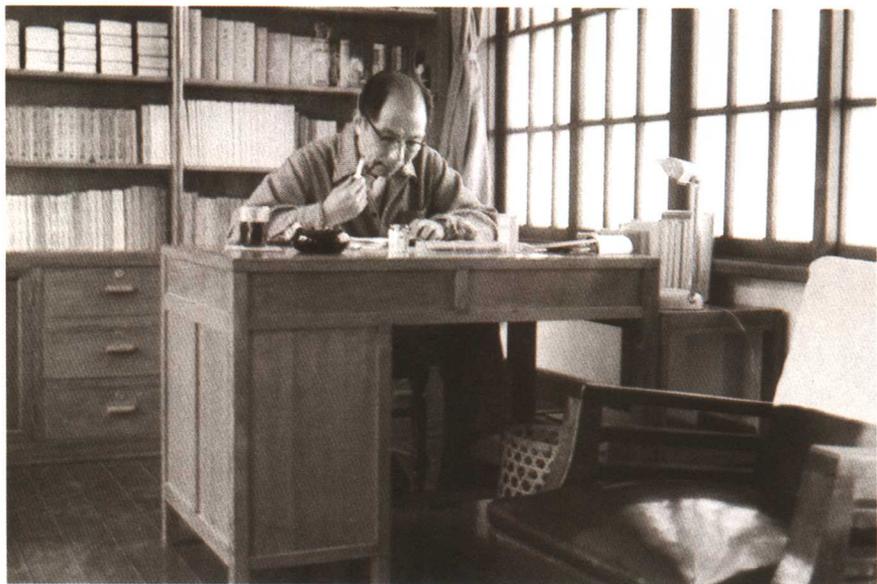
经历了20余年“幽禁”的张学良，从青年到壮年又步入老年。就像身后这棵大树，树干斑驳，枝桠众多，顽强生长着……

回到台北定居，礼拜堂的公开“亮相”，老朋友的络绎造访，宋美龄的不时召见，蒋经国为之祝寿，买地建房……接踵而来的“好事”，使原本除了读书就无所事事的张学良一时间忙得团团转……

这让“管束”他半辈子的刘乙光，心里极不平衡也很不痛快。过去有好些事必须通过他或“请示”他才行，现在张学良可以通过别的渠道直接得到宋美龄的帮助，刘乙光无法像过去那样随便训斥“副座”了。一旦走出大山，猴子就当不



1958年，张学良、赵一荻移住台北幽雅招待所。从北投张学良的住所可以远眺观音山，宛如睡观音，这是张学良拍摄的台湾风景之一。



张学良在西子湾寓中的书房。(上图)

张学良将拍摄的照片制作成幻灯片，这样欣赏时就很方便。这也使大量的照片得以保存。



书架上的图书记录了赵一荻的“伴读”时光。



赵一荻在西子湾的书房。赵一荻也老了，看书时也离不开老花镜了。



镜中人在日渐老去，爱美之心犹存。



一针一线总是情，儿子的照片总是伴随着赵一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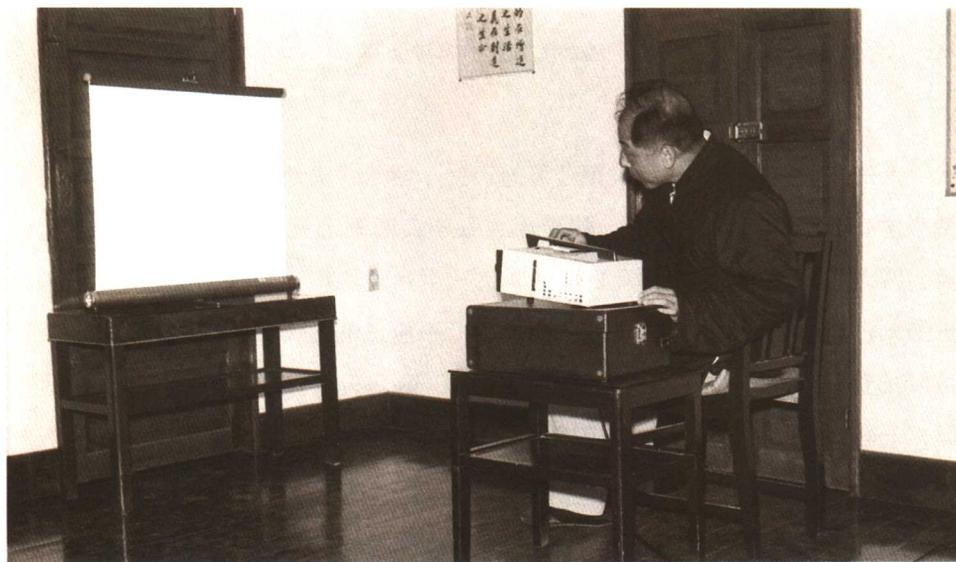
赵一荻的家居生活，镜前梳妆，编织毛衣。相比井上温泉，生活条件及环境大有改善。

了“大王”了，刘乙光的“失落”可想而知，便借“买地建房”事发难。先是斥责张学良看地不经过蒋经国，接着因为张学良叫刘乙光部下去办事，刘大为不满，两人口角不止。11月26日，张学良一早到建房地，看看施工的情况，因未告知刘乙光，晚上，刘乙光大发脾气，说“不应该乱出去，我有话对你讲，你不可以把我们看成你的副官”。张学良没想到，前几天刚去刘乙光家，祝贺刘过生日，一转脸就变“桀骜的（地）指责我如同他的仆役”。早在9月时，刘乙光就警告张学良，“今后有人谈话和送信，必须经他的手，不可由董显光或王新衡”。

张学良生气归生气，除了在日记中记下刘乙光“大长脾气”或向老朋友讲述“余数年不愉快之经过”并“大发牢骚”外，逢年过节，依旧送礼相待，“大人不计小人过”。还有太多的事要办，复兴岗的房屋，将是张学良为自己与赵一荻安



晨起，先打一套八段锦，这是张学良养成的习惯，他在日记中写道：“假如阳明先生、总理能多享寿数十年，他们给人类的贡献，一定比现在还大的（得）多了。所以我们为了个人的享受，多活几年，少活几年，那是没有多大关系。如果以生民立命，继往开来之诚志，那么对养生延寿，亦不可忽视。”



小小的幕布、幻灯机，将张学良所拍摄的照片一一呈现，宛如时光倒流，记录了张学良如何走过这难熬的黑暗日子。在井上温泉时，除了收音机，小电器“几成废物”。



张学良喜欢开车，开快车。尤其喜欢这种美制军用软篷吉普。当年在北京时，一次驾车去天津，路上一辆卡车总在前面挡道。张学良急了，抽出手枪照卡车后轮给了两枪。卡车司机不知怎么回事，他的吉普车便超过去……眼前这辆吉普车，自然会勾起“少帅”诸多往事，并跃跃欲试。

享晚年而营造的“温馨”的新家，只要有空闲，他总会去看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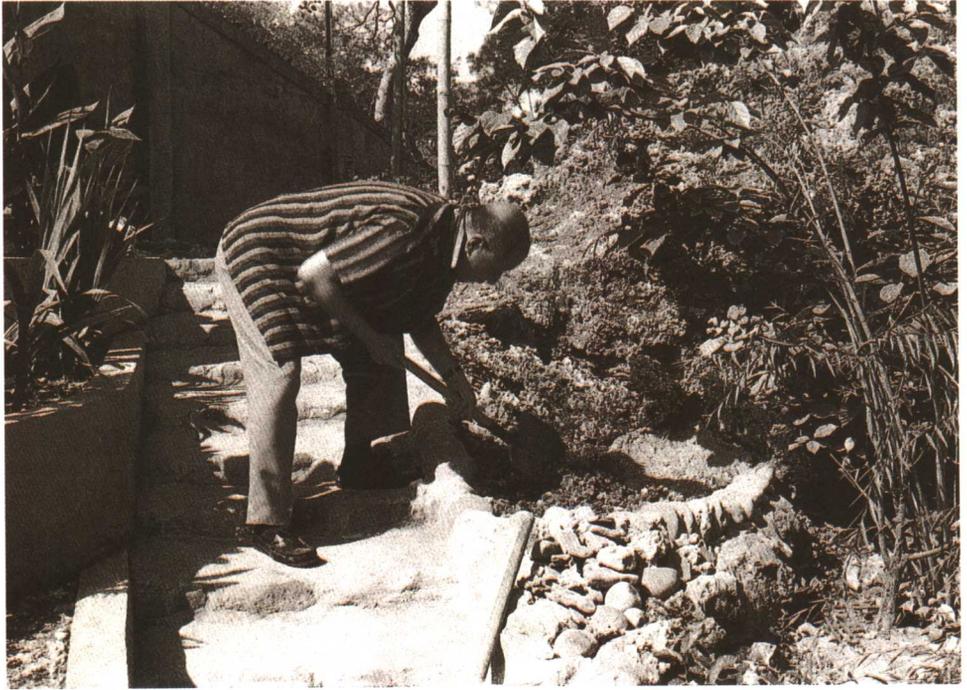
转眼间，1960年的圣诞节快到了。

12月16日夜里10点，宋美龄“差游秘书送来圣诞卡两封，余和Edith（赵一荻），并二人的礼物”。

12月21日，蒋孝文“亲送来C、C、K（蒋经国）的节礼及本人礼，新衡夫妇差转送来节礼两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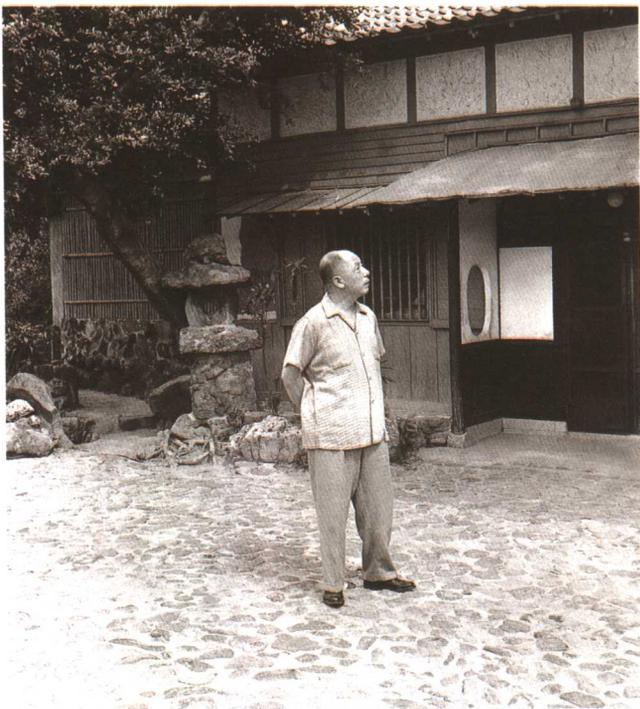


赵一荻在西子湾散步。



西子湾院里的空地，都被张学良种上了花草。

1958—1959年，张学良、赵一荻多次往返于台北与高雄。1960年，宋美龄派董显光作为张学良的“伴读”研读《圣经》。原先一直研究明史、儒学的张学良，后来体悟到宋美龄让他信仰基督的“良苦用心”。1960年4月，“奉蒋秘书长命余等迁居台北……系夫人的意思，言多带东西，不能再返高雄”。



12月24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到董显光家与其家人共进圣诞晚餐，当新年快乐的音乐响起时，张学良装成圣诞老人在欢乐中一一分发礼物给大家。“九点半到凯歌堂做礼拜”，见到了陈诚、王亮畴夫人、王叔铭、彭孟缉等人。“十一点半归来，宋美龄送来自手书一件，食品多种。”

12月31日，张学良与赵一荻、董显光夫妇、刘乙光全家一同到建房地山上野餐。站在那里，能看到张学良、赵一荻将来的“新居”，山谷的风轻轻拂过稀疏的头发，草木的气息让张学良想起了那一段段与世隔绝的山居岁月……

明天，新的一年又将来临。

2006年8月16日 完稿

2006年8月28日 改毕

(陈海滨)





1959年张学良拿到彩色胶卷后，在北投幽雅招待所兴致勃勃地为赵一荻拍下的一组照片。可惜的是，不知是早期彩卷的质量问题，还是保管不善，张学良拍摄的这些底片受损较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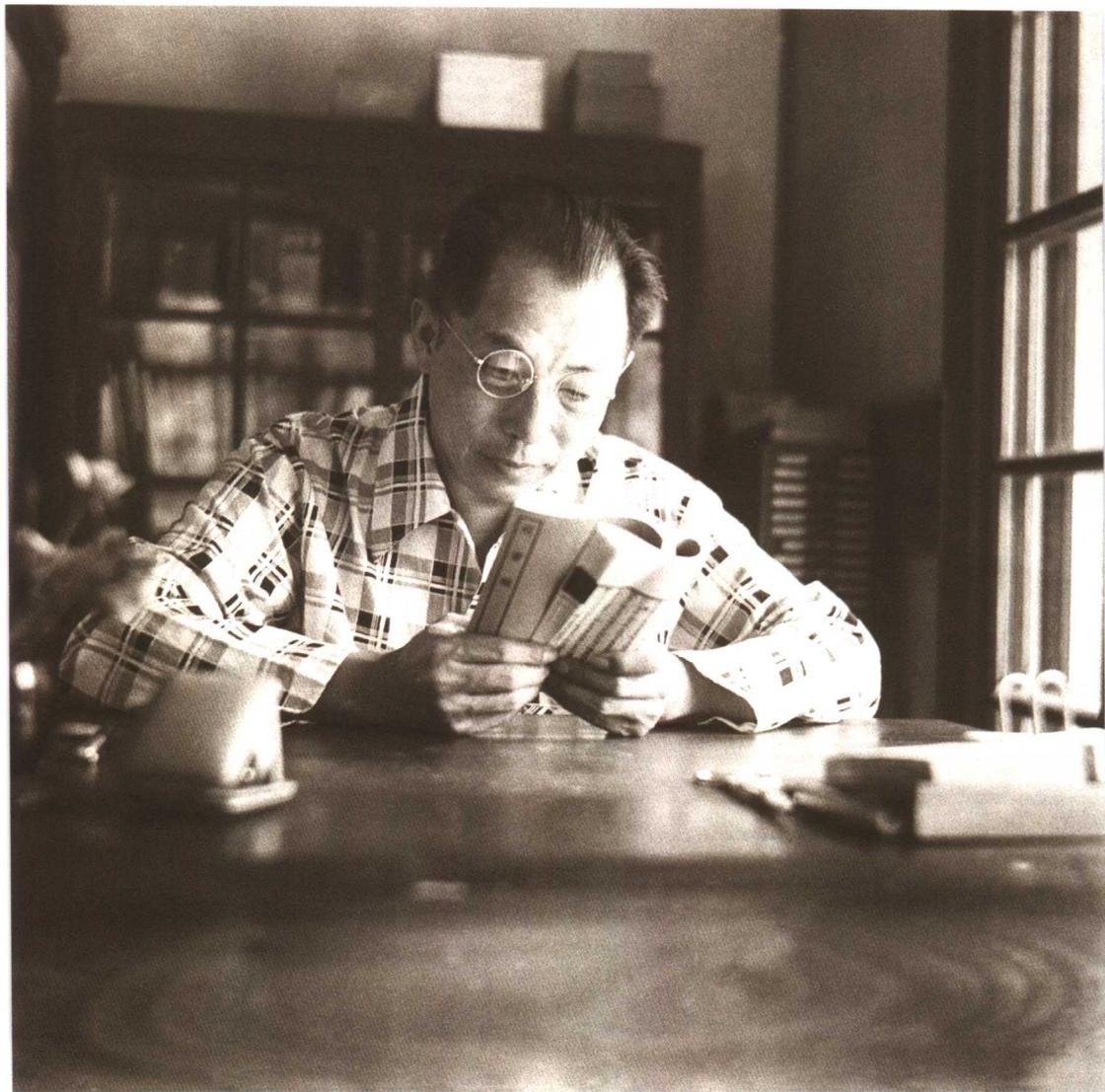
张学良台湾幽禁期间读书影相



张学良在幽禁期间以“读书”为最快乐的事，尤其在台湾新竹井上温泉期间，不再如抗战时的颠沛流离，能安安静静地读书，感到欣慰。正如其日记形容：“一日吃睡之外，得安静看书，快哉！”



虽然欣慰能多读书，张学良未能参加抗日战争，只能读书。感慨之言见于其1939年9月27日日记：“人家都在那里打仗，咱‘国难家仇’的人，静坐塘边来钓鱼，‘戎马半生’已竟二十年了！年近四十，再干一干‘蠹书虫儿’。”



每年元旦，张学良启用一本新的日记本记下该年的读书计划。1948年元旦的一首诗道出无奈与悲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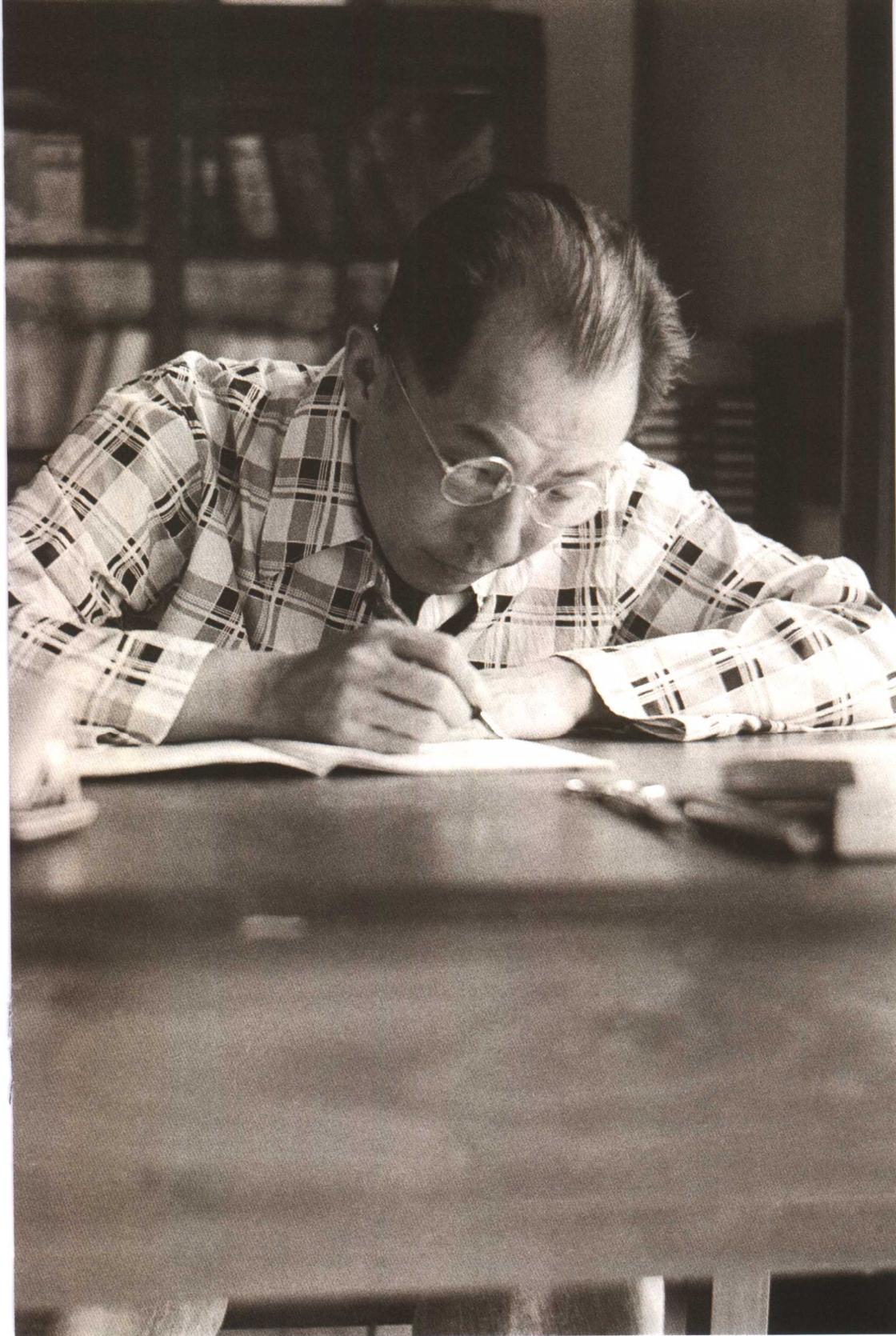
“大众那块、冰天雪地，我这里、风暖花开；
大众那块、饥寒交迫，我这里、丰衣足食；
大众那块、炮火连天，我这里、悠然高卧；
两相对照、心情交织，我也不知、是悲是喜。
来一首可以臭倒墙的诗，权当作我的新近试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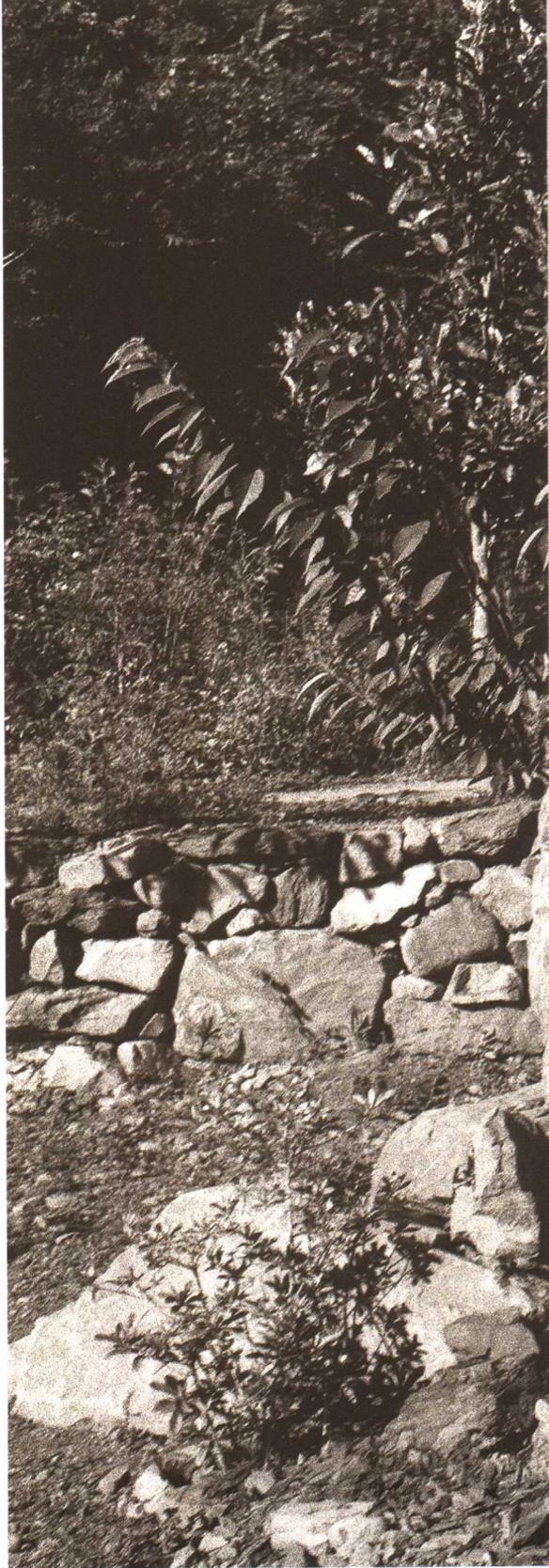
与世隔绝，居于深山中的张学良仍在思考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及人类问题。1955年7月15日其日记如下：“今后的半个世纪，社会问题如经济制度、风俗、思想、道德标准等等必将有急剧的变动。吾人真得如林肯所说的‘必须有新的想法和新的行动，我们必须解放自己，然后将能拯救我们的国家’。吾人得敢面对现实，清晰的（地）认识现实，才能够不跟现实脱节。固步自封，空中阁楼，那都是解放不了自己的，也就说不到拯救国家。我在这里想：核子战争之惨，灭亡人类。自然的，人类就决（绝）不敢玩火自焚，也许冷战是不会停顿的，可是热战是不会发生的了。这个问题，要再看一看，想一想。我记在这里以便追证。”

1957年初张学良奉命赶写《杂忆随感漫录》及抄缮经过批改的信函等，必须日日埋头于书桌前，回想往事令其感伤。所幸在书中找到乐趣。5月份交稿后，张学良在日记上写着：“对于道心、人心，多年误解。最近始明道心，有人欲蔽障，就为人心；人心克净人欲，即是道心，非二也。余明此，真是手舞足蹈之乐。”





读书后的咀嚼其味无穷，坦诚的自我剖析尤属难得。张学良认识儒、释、道的过程中，如稚子般地将心得感言表达于1957年6月3日其日记中：“儒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佛曰‘菩提萨埵……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这都是生死大关，我们把生死大义看得明白，惧是比较容易没有，可是忧惑、梦想总是时时要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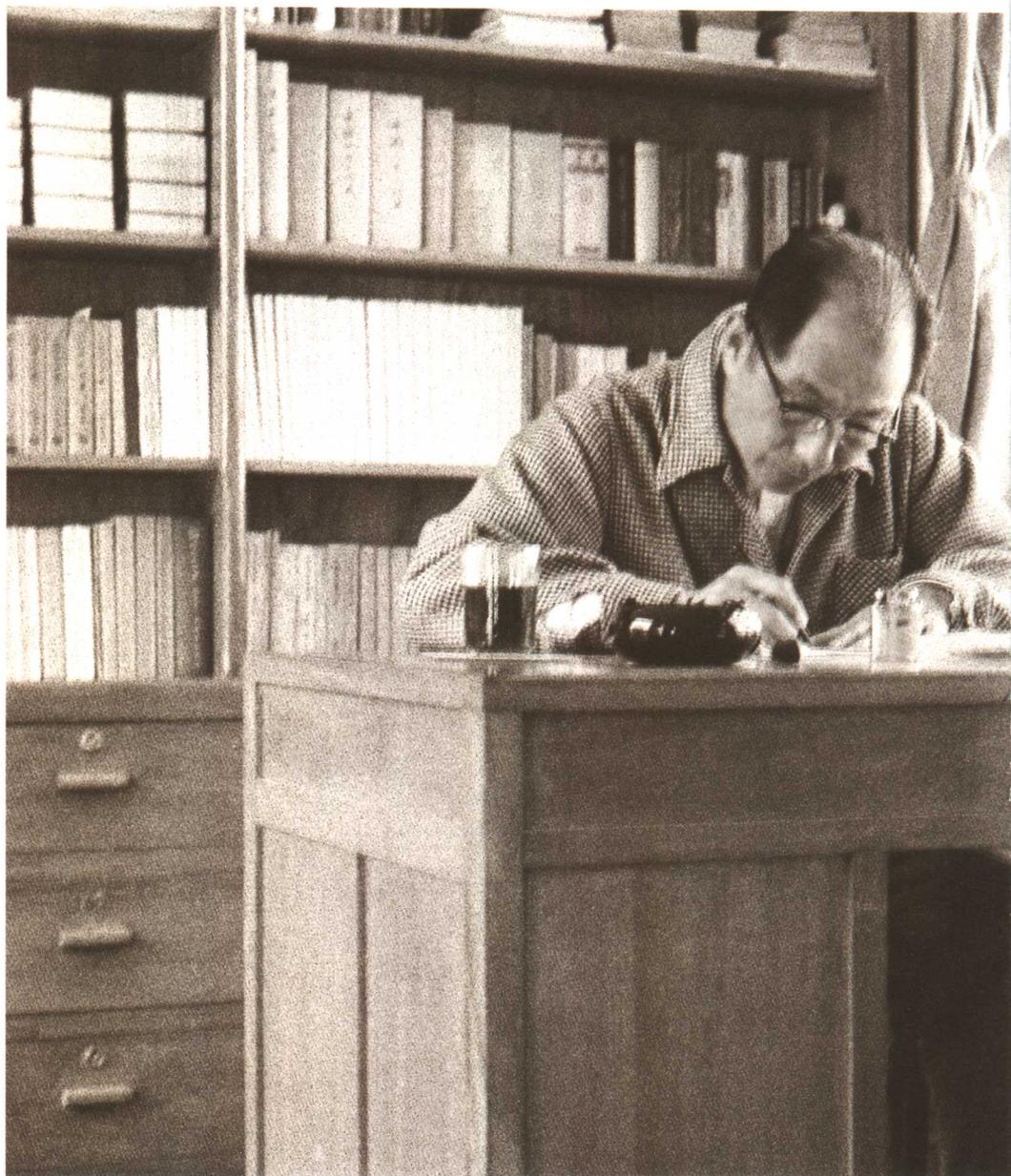




张学良将其藏书后来全部捐给了台中的东海大学。书籍包括中外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宗教学及经济学等。从1957年6月5日及6月6日张学良日记中反映了他对看书的反省：“昨日看了一篇小说，尔后对于那无益文字，决（绝）不再阅看。”“业精于勤，荒于嬉，我对勤总不如嬉，年将六十，仍如童年，自虽知而不能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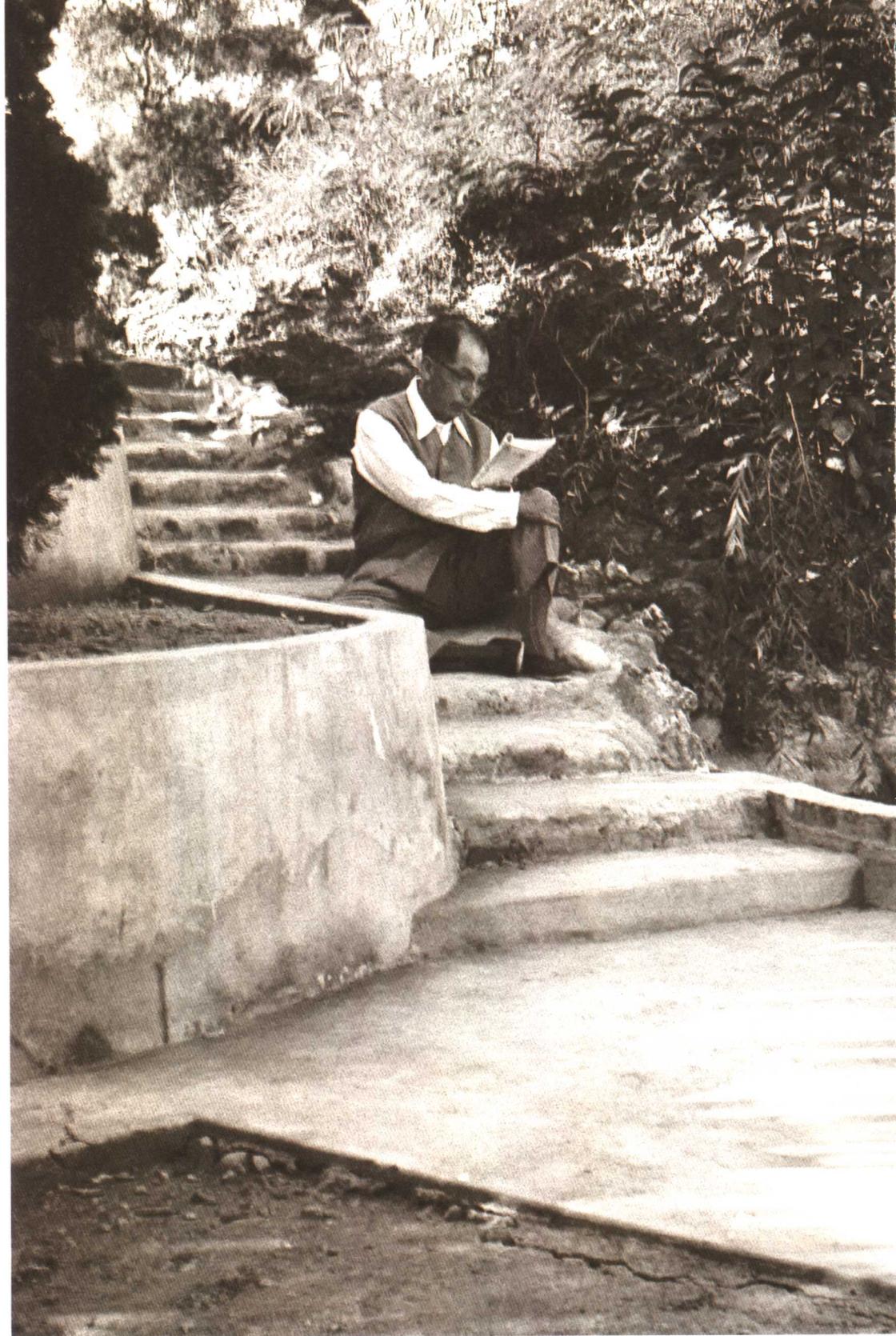
1957年10月24日，张学良自新竹井上温泉搬住高雄西子湾，在当天日记中形容西子湾房屋宽濶、环境幽美，为廿余年来最舒适的处所。第二天忙了一整天，亲自整理书房，分类书籍等。

次年1月1日元旦张学良在书房中写的日记如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儒家的修身，非是自私，乃是“修己”以安人，而君子亦绝不是为了安人而修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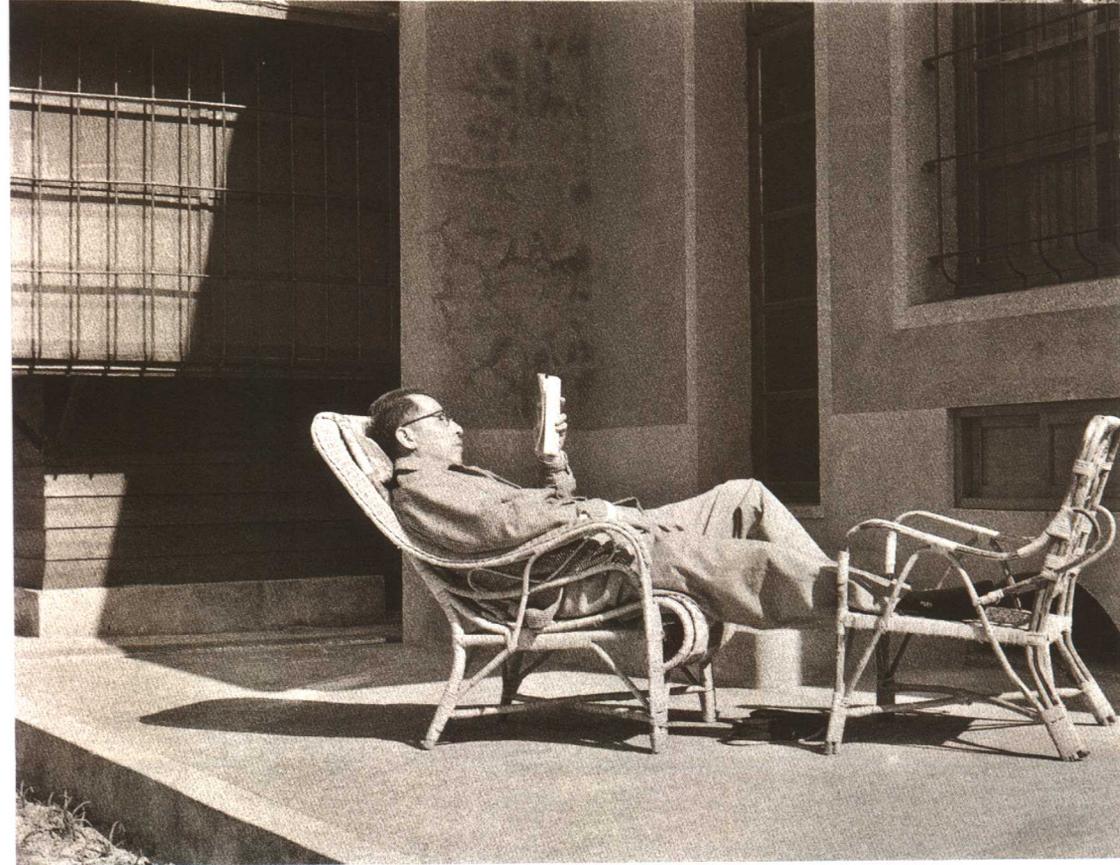
“达则兼善天下，独则自善其身”。

“我今感悟，‘知易行难’乃是指‘尊德性’内修的‘行’；‘知难行易’乃是指‘道学问’，求科学知识上的‘行’。譬如使用收音机，你能知道它的用法就可以了，不必一定研究它无线电学的原理。内修的‘行’，在实行上，实在是有点难。”



张学良于高雄西子湾居住时可瞭望大海。1957年11月25日抵西子湾一个月后，在日记上写着：“晨坐望海，忽然悟到，海，不管洋船、木舟、竹筏，只要遵循它的法则，它就载，否则它就覆。天命之谓性。道、教不可离者，此中可寻出端倪。‘天道无私’，亦在此也。”







高雄西子湾地处亚热带，幽静的庭院中，张学良享受着冬天的阳光。对于“心”、“性”问题，张学良反复思考，感想记于1958年1月10日的日记：“今晨，我关于‘心’、‘性’问题，反复思考，我觉着性是附丽于心，也就是说心好似冠在性之上，‘明心见性’。就推想到‘天命之谓性’这句，夫子不是明明的（地）说，‘食色性也’，这也就是说食色之性，是由天生而来。因此我觉得，‘率’字当另解，不完全照朱子原注。说文上说：‘古率帅同，通用。率，领也’，左传，率师以来，惟敌是求，秦时有‘卫率’，主领兵卒，以卫东宫。辞源‘率’一定之限制曰率，孟子曰，‘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假如说‘遵循’性是道，那么说戒慎恐惧，不睹不闻，我认为有点勉强。我要说，我所想的，那么是不是‘性善’说了。孙总理说：‘人性中含有兽性’。这是对的。天命食色之性，这里面有贪，有人欲，我认为（现阶段）性中含有人欲和贪，假如不节制之，那就是人欲横流，也就是兽性发展。节制之道就是‘仁’、‘礼’，仁是人人相处相伴之道，忠（诚）恕而已，所以必须不睹不闻上用功（工）夫，所以才要戒慎恐惧，否则，‘人心惟危’，稍一不慎，就又到人欲那方面，就会发展兽性了。‘道不远人’，我解作，道不能离开人的——仁者人也。下句说‘人之为道而选人，不可以为道’。这不是说吗，道是人为的，人之去为道，如果离开了人，那就不可以为道了。这两段，我不敢自认是完全正确，因为想到，姑志此，以待自己再研讨。以待请教高明通儒。”